

上海娼妓改造史话

杨洁曾
贺宛男
编著

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娼妓 改造史话

杨洁曾 编著
贺宛男



特约编辑：钱志光

封面设计：桑吉芳

上海娼妓改造史话

杨洁曾 贺宛南 著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上海分店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吴县光福印刷厂印刷

1988年3月第1版

1988年3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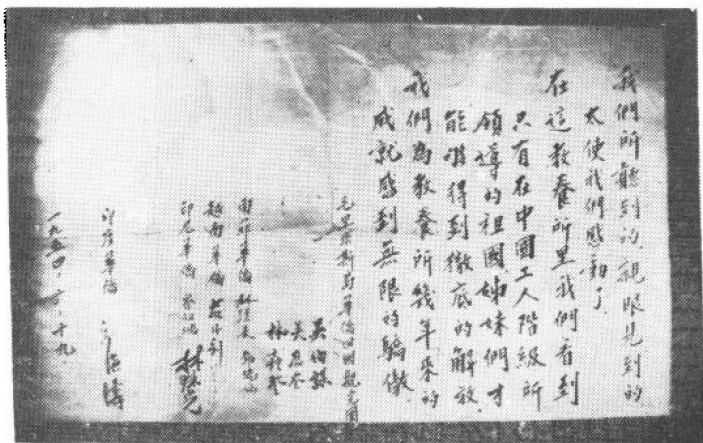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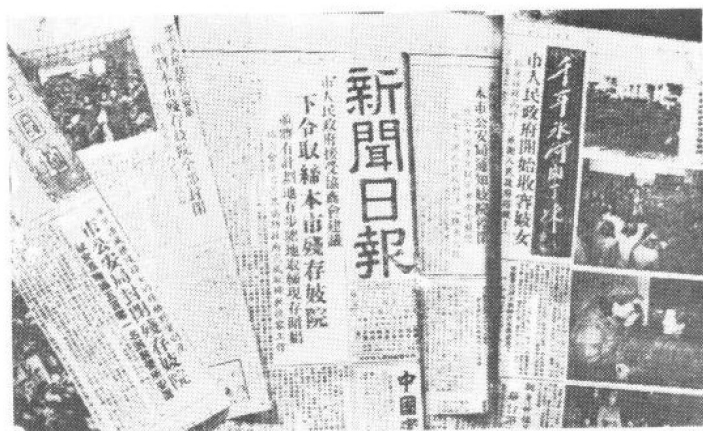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7.5 插页：6 字数：160,000

印数：1—25,000

ISBN 7-5426-0033-3/K·9

定价：2.30元



(上)1951年11月23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下令取締殘存妓院。

当时的《解放日报》、《新闻日报》等各大报纸陆续刊发了政府法令及收容妓女的报道。

(下)1951年6月19日,毛里求斯岛华侨回国观光团参观上海妇女教养所后留下的题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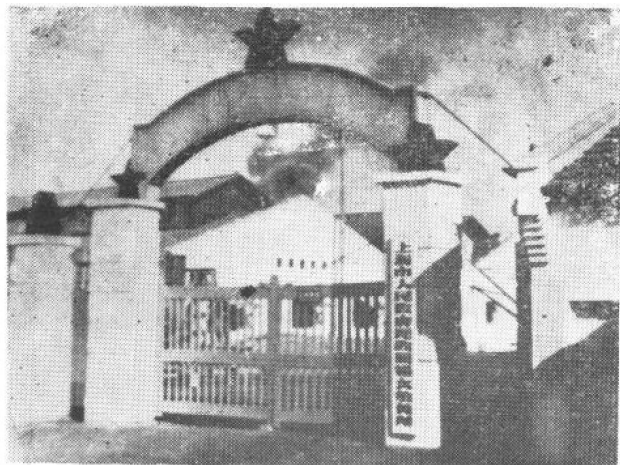
(上)1951年11月26日，上海市公安局老闸分局查封夜都会妓院。

(下)一批残酷压迫剥削妓女的妓院主，于1951年11月27日被依法逮捕。



(上)1951年11月27日，在夜总会妓院门前，里弄居民热烈欢送跳出火坑的翻身姐妹。

(下)教养所工作人员和被收容的姐妹亲切交谈。(1951年11月27日摄)



1951年上海市政府所办的妇女教养所(通州路418号)早已完成其历史使命，现在成了上海轮椅厂和上海柴油汽车厂修理一车间。

(上)昔日妇女教养所门口。

(下)今日工厂场景。



(上)翻身姐妹们在教养所里开始了新的生活。每晨六时起床，迎接新的一天。

(下)早餐后姐妹们列队去大礼堂上课。

(1951年12月2日摄)



(上)妇女教等干部在为翻身姐妹上课。

(下)被收容的姐妹在学习动员会上呼口号，决心接受改造。



(上)被收容的姐妹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

(下)性病防治所医生到妇女教养所为患病的姐妹治疗。



(上)参加“五一”游行的妇女教养所队伍(1953年5月1日摄)

(下)妇女教养所结业大会一景。

本书所用图照,除翻拍部份由浦静中提供外,均为郭天中拍摄。

前 言

在人类的阶级社会中，娼妓制度是一种最残酷、最野蛮的制度。妓女的悲惨命运，为人类社会的文明史写下了可怖而又可耻的一页。对于这个特殊的社会问题，推究它的起源，考察它的演变，以及指出它趋于消灭的途径，是社会学家的使命，也是革命家的任务。但，对马列主义者来说，根据革命导师的教导，我们并不把它看作是一个孤立的社会现象，而是与当时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密切相关的。只有改变了打倒了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娼妓——这个棘手的问题，才会迎刃而解，并使之永远消失，不再存在。

这本书讲的，就是消灭娼妓制度的问题。

现在，让我们先回顾一下历史。

我国的娼妓制度，已有三千年左右的历史。大概肇始于夏、商、周三代，立于汉，而盛于唐。“娼”这个字在许慎的《说文解字》里是没有的，《说文》中收的是“倡”，“倡”通“唱”，可知古代的倡女与音乐有关，是指的那些能歌善舞的女子。那时候，社会上还有不少以演出百戏杂耍为业的人，称“优”。由于行业的性质相近，因此常常倡优并提。而且不仅女的叫“倡”，男的也可从事这个行业，也叫“倡”。至于娼妓的妓字，《说文》解为：“妇人小物也”，与妓女根本不搭界。汉代，虽已有强迫卖身的“营妓”，但汉以后文字中说的“女妓”，大多还是

指述能歌善舞的女子。要到唐代，文人的著作里才出现那个“女”字旁的“娼”字。我们读唐人诗，从他们的唱和之作以及有些诗的题解中，可以知道当时不少达官贵人、文人学士是家中既养着“家妓”，而又放荡于北里的。唐代官妓之盛，且为历代所无。所以，到了唐代，那才算有真正的近代式的“娼妓”了。其后，宋元明清以至民国，社会经济有所发展，工商业逐步兴起，娼妓制度始终维系不替，千百年来，吞噬了无数青年妇女的生命。

说娼妓制度不变，是指“制度”的本质。在形式上，历代不完全相同，名称也不相同的。在中国娼妓史上，如汉称“营妓”，唐名“官妓”，明代叫“教坊乐户”，说的都是官府管辖下的妓女和妓院。生活在那里的妓女，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女奴隶。没有入籍（乐籍）的妓女是不多的。唐以后虽民间亦有，但不能与官妓相比。到了清代，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于顺治十六年（1660年）废京师教坊司，随后康熙、雍正各朝均曾诏命解散各省的教坊乐籍等“贱民”。这样，官奴性质的娼妓没有了，而代之以私人公开开设的妓院。妓女的苦难生涯则依然继续着不变。

历代也有“禁娼”的，但无实效。这与妓女的来源有关。在古代，上文所说的“倡”女，有逐渐沦落为“娼”的。还有，古代统治者对犯罪的妇女，有迫使为“娼”以为惩罚的，这始于管仲的“女鬻”，其后汉唐以至明代，沿用不变。明代朱棣（永乐帝）把违忤他意旨的臣子，惨加杀戮，并将他们的妻女发往“教坊”，更是显著的一例。再有一个来源是：生活在旧社会中的劳动人民，经不起天灾人祸的打击，就常有被迫卖身为娼的事情发生。因此，不论封建社会或者资本主义社会，只

要有剥削和压迫，就会出现娼妓。娼妓制度正是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本身的必然产物。

鸦片战争之后，我国已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呻吟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压迫之下，生活十分痛苦，毫无保障，各大城市妓院林立，妓女人数也有明显增加。有人统计，就清末民初记载娼妓的有关书籍，仅仅记述上海一地的，就有三十八种之多。能出这么多的书，能有那么多的东西可写，这就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当时上海的繁华，是建筑在苦难人民身上的。

1949年10月1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废除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荡涤着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污泥浊水。罪恶的娼妓制度也终于得到了彻底的清算。经过周详的调查研究，制订了妥善的各项政策，人民政府一声令下，全国各地先后相继禁娼，对妓女进行了改造，收到了极好的效果。有关上海的这方面的详细情况，读者可以从本书中得到了解。

序

上海娼妓改造是一件具有国际意义的大事。今年美国哈佛大学有个研究娼妓问题的社会学教授来访问我，她调查比较了世界上几十个城市，又在上海住了一段时间，考查了解了五十年代上海改造娼妓的全部过程，最后她对我说，像上海这样解决娼妓问题，全世界没有先例。这位女教授认为，上海娼妓改造的最大成功之处有两点：一是改造彻底。上海曾是世界各大都市中娼妓人数最多的一个城市，解放后只经过七年时间，从公娼、暗娼到各种变相卖淫全面彻底地消灭了。二是工作扎实。世界上也有一些城市提出和实施过取缔娼妓的法令，但取缔后妓女出路何在，如何使她们成家立业，变成社会的生产力，从而最终根绝娼妓，这个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中国解决了，而上海做得最好。上海妇女劳动教养所收容的7500多名妓女和各种变相卖淫者，除了极少数屡教不改分子以外，全部改造成了自食其力的新人。

确实，上海娼妓改造是一件值得大书特书的历史事件。当年我是在陈毅同志领导下，和市公安局李士英局长、杨帆副局长直接主持下参加这项工作的，从妓女进入教养所后治愈性病到从事改造教养，主要由我负责。早在上海解放前夕的1949年5月初，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和上海市人民政府的领导机构已在江苏丹阳组成。我是上海军管会政

务接管委员会副主任，并出任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兼民政局长。我们政务接管委员会的牌子就挂在民政局。我们在接管中碰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主要遇到了三个问题：其一是对以杜月笙、黄金荣为头子的青洪帮两大流氓集团；其二是对在他们的羽翼下的各种社会腐败组织；其三是构成冒险家乐园的各种集团性的社会黑势力，包括娼妓、职业乞丐、舞女、偷盗扒手等等。这些都是有领导、有训练、有固定活动场所的集团性的社会势力。对每个组织每种势力的首脑人物（包括去了香港等地和留在上海的）都要采取不同的方针和对策，对他们中的全体分子都要制订相应的政策措施，分期分批地、全面彻底地进行社会改造。而三大问题中最复杂最困难的则是对娼妓的改造。

娼妓的存在是个世界性的现象，尽管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法律条文规定过娼妓之存在为社会之必须，尽管从封建的开明君主到资产阶级的不少政治家都相继提出过禁娼，可是没有一个国家取得成功。娼妓改造之所以特别困难、特别复杂，那是因为：一方面，娼妓是压在社会最底层苦难最深的阶层，在旧中国，她们不仅要像所有妇女那样受神权、政权、族权、夫权四大绳索的捆绑，而且要忍受作为一个人最不堪忍受的凌辱和摧残。另一方面，妓女身上又集中了人世间最腐败、最无耻、最恶劣的种种习性，妓院是恶势力泛滥的场所。在妓女身上，集中表现了最值得世人同情又最为世人厌恶的双重品质，她们既是灾难深重的弱女，又是堕落成性的游民。是的，妓女是游民，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阶级分析的科学方法，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开始，就把妓女的阶级成分定为游民，她们不是工人农民那样的劳动者，而是依附旧社会黑势力

生存的寄生虫，但这不是她们自身的罪过，是万恶的旧社会强加给她们的。

正是妓女的这种双重身份，使我们确定了改造娼妓的政策基点，在指导思想明确妓女是需要极大同情的对象，在改造方法上却要借助强制执行的某些特殊手段。我们不是用慈善家的善心来解决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肮脏问题，而是用强制改造的手段，达到既彻底清除一切污泥浊水，又能最终解放一切改造对象（包括妓女在内）的目的。我认为这就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人道主义。

既然如此，为什么在上海这样娼妓为害甚烈的大都市，不是一解放就立即取缔，相反还准许妓院开业，政府收税，直至1951年11月25日，在上海解放两年半以后，才明文下令禁娼呢？还在丹阳训练接管上海的干部时，就多次讨论这个问题。有一部分同志认为，对如此丑恶的社会现象，一天也不能容忍，主张一解放就明令禁娼。我当时找了党内党外的许多同志（包括上海地下党的同志、情报系统的工作同志，以及对妓院情况及其背景较熟悉的同志），开了多次的座谈会。绝大部分同志主张不能马上取缔，因为上海这样的十里洋场，万恶渊藪，百废待兴，如果我们一解放就取缔娼妓，既没有足够的医疗条件为她们医治性病，更没有专项的经费为她们安置就业，其结果只能把她们从妓院推到社会上去，使她们流离失所，暗中卖淫，这就会造成比公开挂牌更惨的悲剧。我们既然收容了妓女，就要对她们的出路和新生负全部的责任，而决不允许出现这样的悲剧。陈毅同志综合大家的意见最后决定说：“刚进去（指进上海）恐怕还不能马上解决妓女问题，只好让她们再吃几天苦吧，不过，一定会很快解决的，将来在中国的语词中，

‘妓女’这个词必将成为一个历史名称！”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在丹阳秘密通知地下党上海市委，告诉他们，熟悉妓院情况同妓院打过交道的同志不要分散，全部集中在公安系统，准备不久的将来作为收容改造的骨干力量使用。

经过两年半的准备工作，这一天终于来到了。共产党的认真负责体现在收容改造妓女的每一个环节。治疗妓女的性病急需配尼西林，当时我们既不会生产，由于帝国主义的封锁，也无法进口。我们手中只剩下了从国民党反动派手中缴获的，从美国进口的数量不多的配尼西林，那是留给负重伤的志愿军战士用的。为了给妓女治病，陈毅同志亲笔手令各个解放军纵队后勤卫生部，把这些配尼西林药物集中起来，先供妇女教养所使用。当时少数妓女听信谣言，坚决拒绝打针，医务人员硬是给她们注射。后来，妓女要安置就业了，一个方案是，少花点钱，就地安置在上海工商企业中，但考虑到不脱离上海这个环境，不少人还难以彻底改造。于是，下决心用了联合国救济总署留下来的一批救济物资，相继开辟了苏北、皖南、新疆、甘肃、宁夏等安置基地，办工厂，建农场，帮助她们成家立业。对改造妓女，我们自始至终坚持三条：一是治愈性病，二是安置就业，三是解决婚姻。正是靠了这三条，世界娼妓最为严重的上海娼妓终于绝迹，全世界都为为之叹服。

这段历史今天已经成为过去了。本书作者收集了很多材料，访问了许多当事人（包括改造者和被改造者），以翔实的史料和生动通俗的笔调，再现了当年的历史。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这不仅对认识我们的社会和社会变革很有价值，而且对研究全世界都未能解决的这个社会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启

示。读了这段历史，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个中国妇女，理应感到自豪。当然，这本书还没有来得及对解决娼妓问题作理论上的探讨，这个问题确实大可研究，我期待着更有深度更有见解的学术专著问世。

曹漫之

1987、6、5

内 容 简 介

五十年代初，上海市人民政府有计划有步骤地把七千多名妓女改造成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这是一件举世瞩目的大事。诚如一位国际著名学者所说：“像上海这样解决娼妓问题，全世界没有先例。”本书作者收集了大量材料，访问了许多当事人，以翔实的史料和生动的笔调再现了这段社会改革的历史。全书分四个部分：一是介绍林林总总的旧上海妓院及其社会历史背景；二是上海禁娼经过的回顾，包括战略规划、战役进程和政策界限等等；三是对不同对象进行艰苦深入的教育改造工作；四是通过十名苦难姐妹的典型事例看改造成果。书末附一篇《会乐里今昔》，这是“新旧社会两重天”的有力见证。

当年在陈毅同志领导下直接主持此项工作的曹漫之同志为本书作序。曹老认为，如何禁娼在世界范围内尚属难题，上海改造娼妓这段历史，对进一步探讨解决这一严重社会问题的途径将能提供有益的启示。

目 录

序·····	曹漫之(1)
--------	--------

前 言·····	(1)
----------	-----

一 灾难深重的上海娼妓

旧上海娼妓多 触目惊心·····	(1)
------------------	-----

四马路——旧上海娼妓总汇·····	(4)
-------------------	-----

长三、么二、咸肉庄——旧上海妓院名堂百出·····	(8)
---------------------------	-----

断账、拆账、赎身钿——妓院主手段毒辣·····	(14)
-------------------------	------

流氓、帮会、老头子——旧上海妓院的靠山·····	(16)
--------------------------	------

二 封闭妓院 收容妓女

京、津、宁、杭等大中城市相继禁娼·····	(22)
-----------------------	------

上海禁娼前周密准备·····	(27)
----------------	------

筹建上海妇女劳动教养所·····	(34)
------------------	------

主战役打响——上海禁娼·····	(37)
------------------	------

第二次大收容·····	(46)
-------------	------

收容妓女的政策界限·····	(54)
----------------	------

三 荡污涤垢 走向新生

“她们是一群可怜的妇人”·····	(60)
-------------------	------

控诉非人生活 洗涤心灵污垢·····	(65)
良医良药治恶疾 共产党恩情比海深·····	(72)
妇女教养所生活种种·····	(81)
自尊 自新 自立·····	(93)
改造女流氓·····	(109)
戴上大红花 走出教养所·····	(122)
国际友人谈上海娼妓改造·····	(138)

四 十个苦难姐妹的辛酸泪

律师之女的沦落和新生·····	(145)
一位女大夫的遭遇·····	(153)
“舞国皇后”的今与昔·····	(157)
大汉奸之妾自述身世·····	(164)
从暗娼到保育员·····	(169)
她为什么四次自杀·····	(174)
沉沦四十载 老妓庆新生·····	(183)
她使马小彦堕落 又随马小彦奋起·····	(192)
逃跑十二次 一朝喜回头·····	(199)
再苦再累 决不重操旧业·····	(206)

附：会乐里今昔·····	(213)
--------------	---------

后 记

贺宛男(222)

一 灾难深重的上海娼妓

旧上海娼妓多 触目惊心

1917年,英国有个叫甘博耳(S.D.Gamble)的社会学家,曾对世界八大都市的公娼人数和城市总人口的比率作了一个调查。调查结果是:

城市	公娼与城市总人口的比例
伦敦	1:906 ^①
柏林	1:582
巴黎	1:481
芝加哥	1:437
名古屋	1:314
东京	1:277
北平	1:259
上海	1:137

这就是说,在世界八大都市中,公娼人数与城市总人口的比例,以中国的两大城市为高,其中尤以上海为最高。甘博耳调查时,北平的公娼人数是 3,135 人,城市总人口为 811,556

① 参见鲍祖宝的《娼妓问题》一书,上海女子书店 1935 年出版。

人^①；对上海他没有提供绝对数字，根据他调查的比率推算，当时上海人口约为250万—260万人，那么公开挂牌营业的公娼就有近2万人^②。这个调查虽然未必精确，但毕竟反映了上海娼妓之多，加上私娼，数字就更惊人。鲍祖宝在1935年出版的《娼妓问题》一书中提到，据他当时的调查，上海的公娼和私娼相加约在6万至10万人之间（因私娼流动性大，且很难确切统计，故上下幅度较大），当时上海全市人口约在360万人，其中女性约150万人左右^③。也就是说，20名左右的上海女子中，就有一个是娼妓。而如果剔除十几岁以下的幼女和五十多岁以上的老年妇女，娼妓所占比例就更高了。

上海的娼妓之所以在世界都市中比例这么高，根本原因在于帝国主义侵略下上海半殖民地都市经济的畸形发展。鸦片战争后，上海首批开埠，各国帝国主义竞相来到上海抢占租界，数年之间，高楼林立，人口骤增，随着都市的日益繁华，为“冒险家”“淘金者”服务的淫乐事业，也就急性膨胀。周围农村的迅速破产，促使贫苦女孩纷纷逃来上海谋生，很多人不得不陷入火坑。这个数字，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以后，社会经济的凋零和道德的沦丧，反映了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妇女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压迫下所蒙受的巨大耻辱。

上海公开的娼妓，始于清朝道光年间，盛于同治光绪两朝。国民党反动派“保护”并发展了娼妓制度，而日寇侵占上

① 参见鲍祖宝《娼妓问题》一书。

② 据1948年元月出版的《上海市大观》提供的统计资料，民国19年（1930年）上海人口为308万人，该书估计，第一次世界大战几年后，上海人口约增加了40—50万人。据此推算，1917年约为250万—260万人。

③ 参见1948年元月出版的《上海市大观》。

海后，娼妓更是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1948年元月出版的《上海市大观》上有这样一段记述：“……沪滨风月，天下艳称，青楼妙姬，韶颜稚齿，烟视而媚行者，不可计数……海上自逊清同光而后，女闾之盛，殆甲江南，大道青楼，珠帘琐院，清歌一曲，粉头十千，养成一时佚荡之风，酿为今日奢靡之习。”

旧上海的反动统治者之所以保护并支持娼妓制度，一方面是为了满足他们荒淫无耻的生活，腐蚀人民的反抗意志；另一方面，他们可以从妓院获得大笔收益，所谓“花捐”“花税”是历代统治者的主要税源之一。据上海市工部局1940年刊印的《年报》中载，当年“花捐”收入即合值梗米3,200石，面粉12124包^①。对妓院的捐税名目繁多，有“花捐”“堂捐”“轿捐”各种名目，连坐轿也得纳捐。因为轿子是上等人坐的，妓女没有资格坐，要坐就得纳捐。一些高等妓女被人呼唤出堂差，往往坐着“飞轿”（轻快之轿），晚上轿后挑着“××书寓”的明灯，来来往往。后来，租界当局对妓女纳轿捐加倍。有一名妓女叫陆兰芬，为了表示反抗，便让年幼妓女坐在龟奴的肩头，上面铺一条白毛巾由龟奴捐着，招摇过市，人称“捐车”。开始坐“捐车”只限于雏妓（幼年妓女，称“清倌人”），以后十八九岁以至廿二三岁的妓女，也都坐在龟奴肩头。后来包车盛行，“捐车”才逐渐消失。

妓院就这样成为反动统治阶级榨取妇女血泪的“一本万利”的“合法”事业。日寇侵入“租界”后，据侵略者当局1942年《年报》所载，该年上海妓院（公娼）数目增至3,900余

^① 参见1951年11月27日《解放日报》方庆立所写的《摧毁旧社会遗留的娼妓制度》一文。

家^①。1945年日寇投降后，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无耻地满足美国主子 and 战争爆发户的兽欲，一本正经地提出要对娼妓加强管理^②，当时的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冠冕堂皇地提出了一个“化私为公，化繁为简，化零为整”的娼妓管理计划，要把私娼变为公娼，对公娼进行“身体检查”，把变相的卖淫场所变为公开合法的妓院，把四散的卖淫活动集中为大规模的“人肉市场”。警察局长宣铁吾在1946年3月“临时参政会”的报告中宣布：“拟以虹口提篮桥分局辖境划为娼妓集中的‘风化区’”，还计划扩大所谓“风化区”。正因为如此，直到1949年1月上海临近解放时，尽管国民党达官贵人纷纷逃离上海，和反动势力关系密切的许多上等妓院大批解散，当时登记的妓院还有八百多家，妓女四千多人。实际上，据租界巡捕房的不完全统计，上海靠卖淫为生的妇女约有三万人左右^③。

四马路——旧上海娼妓总汇

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以后，侵略中国的外国兵舰，经常停泊在黄浦江上。帝国主义者雇佣了一帮洋奴西崽，将浓妆艳抹的中国女子载在小船上，驶近兵舰，供其消遣玩乐。由于这种小船的船肚子一般都漆上白漆，上海人民痛恨他们的无耻勾当，愤怒地称之为“白肚皮”。

① 参见1951年11月27日《解放日报》方庆立所写的《摧毁旧社会遗留的娼妓制度》一文。

② 当时有一个美国兵在上海嫖妓得了花柳病，回国后专门写信给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大骂上海娼妓管理不善。参见1951年11月28日《新闻日报》“千年冰河解了冻”一文。

③ 参见1951年11月23日上海《文汇报》。

自从有了“白肚皮”，上海的娼妓就跟着帝国主义“少爷兵”的踪迹蔓延开来。开始，上海的租界是在城区以外，沿着黄浦江岸，从小东门十六铺开始，逐渐延伸到提篮桥汇山码头一带，娼妓的据点也就沿着这条线而伸展。后来，租界发展到南京路至公馆马路（今金陵东路）一带，娼妓也就蔓延到这里，尤其以二马路（九江路）、三马路（汉口路）、四马路（福州路）、五马路（广东路）和大世界、八仙桥等地最为集中。解放前夕，有人在晚间沿着西藏路从四马路走到爱多亚路（延安东路），换句话说，就是从今天的人民广场大道走到大世界，看到有不少拉客的娼妓，他作为有心人，认真地数了数，短短一段路上竟达 764 名之多^①。

福州路是妓女最集中的地方。这条灯红酒绿之街，却是藏垢纳污之地。鳞次栉比的什么院、什么阁，好似一张张血盆大口，不知吞噬了多少中国妇女的青春和生命。早在光绪年间，现在的福州路云南路口有一家“华众会”茶馆（后改名为“青莲阁”），是当时福州路上最大的一家茶馆。楼上一面设茶座，附设西式食品，一面卖烟（鸦片），一张张红木烟榻并列两厢，有女堂倌和专门装鸦片烟的伙计听候使唤；楼下是个游乐场，什么西洋镜、小电影、打弹子等玩意，应有尽有。游乐场周围四壁陈列花卉虫鸟，以供观赏。当时有个叫陆昭容的妓女，经常带着女儿到华众会喝茶装烟，引逗游客，有时也装束登场，弹唱表演。以后众妓女相率仿效，每到夜晚，青莲阁周围一片乌烟瘴气，靡靡之音不绝于耳。后来便发展到由老鸨监管着公开拉客，妓女一个个搽着厚厚的白粉，伸出白得可怖

^① 参见《一个人和一个城市》一书第 200 页。

的手，尖声尖气地强拉硬拖。这一带不但娼妓麇集，还有人公开兜售春宫画照和各种淫秽物品，不知害了多少青年！福州路上有一条弄堂名“会乐里”，这里百分之九十五都是娼家。前面新会乐里开设着一百多家上等妓院，后面老会乐里则遍布向导社、咸水妹等下等妓院。敌伪时期，这里的嫖客，几乎都是日伪军大小头目，抗战胜利以后，又成了国民党接收大员寻欢作乐的所在。据《时事新报》1946年1月17日一篇报道记载，“那时节，会乐里大弄口耸立着巨型彩牌，蒋主席大幅画像的四周，装有无数的电灯，光耀夺目，与弄内‘红’‘玉’‘香’‘琴’之类的艳名广告灯互相争辉。吉普车与流线型汽车代替了过去弄堂的三轮车与自备包车，取以前的投机商人和日伪头目而代之的是大批公务人员与武装‘同志’，他们呼么喝六，狂赌痛饮之余，口口声声嚷着：‘上海真是个好天堂，既好玩，又便宜！’”

汉口路在清末还荒凉得很，没有什么市面。当时有一个名妓女艺名叫“蓝桥”，在人迹稀少的汉口路上建了一幢“蓝桥别墅”，一时间王孙公子趋之若鹜。正是在无数苦难姐妹的白骨堆上，建立起“三马路”的繁荣“天堂”。到辛亥革命前后，汉口路上，望衡对宇，几乎多是妓院，原来冷清清的小路，竟成了热闹场所。这条路上还出了一个“娼阀”，名叫“惜春老四”，因她家几代开妓院，人们沿袭“军阀”“学阀”之称，呼之为“娼阀”。

九江路成为妓院集中地，则和赛金花有关。赛金花原名傅彩云，十三岁起就在上海当妓女。光绪年间，清末状元洪钧以重金为她赎身，后随洪钧出使英、德、奥、俄诸国。洪钧死后，她回到上海，住在九江路彦丰里内。她领了两名妓女，一

名月娟，一名素娟，由两“娟”出面挂牌，自己化名曹梦兰，仍操旧业。慢慢地，一些好事的小报记者隐隐透露出曹梦兰就是洪钧的小老婆，那些报界老板深知这是十里洋场的好题材，便抓住大肆渲染，弄得寻欢作乐之徒，竞相登门，九江路从此成了风月之场。过了数年，她迁往天津，在津市开设妓院“金花班”，这时才改名赛金花。不久八国联军入侵，赛金花与联军司令瓦德西的一段故事是人们所熟知的。

五马路(广东路)上有个群玉坊，弄内开着十几家妓院。六马路(北海路)格致中学旁的“陶公馆”，有三百多名妓女。日伪时期侵略军中小头目，卖国求荣的汉奸麇集此地，伪上海警备队队长张拱辰，整日在四马路会乐里和六马路一带的妓院里狂嫖滥赌，调职离开上海时还带了六马路上一个名叫嫣红的妓女同行。这个妓女跟张混了两年多，抗战胜利后，张成了囚犯，嫣红又改换名字，在上海重操旧业。

解放前，从南京路到公馆马路这一大片租界，既是帝国主义冒险家和达官贵人的销金窟，更是无数受难妇女的葬身场。多少年来，上海这块最繁华的土地上，良家女子和清白之士根本不敢涉足。据一位曾在老闸捕房干了数十年的老警士回忆，五卅惨案的主凶、惨杀我大批工人学生的英国巡捕房首领爱弗生在当“捕头”时，曾在南京路上追逐鞭打一个妓女，那妓女声声惨叫“救命”，路人唯恐惹祸，纷纷躲避。最后，那妓女逃到浙江路芝罘路口，爬上一幢房子的三层楼阳台跳楼而死。还有好多次，他亲眼看到许多贫困女子被拐骗来沪，因不愿为娼，在捕房里被打得死去活来^①。

^① 参见上海《新闻报》1951.11.24《千年冰河解了冻》一文。

长三、幺二、咸肉庄

——旧上海妓院名堂百出

旧上海的娼妓，总的分公娼、私娼两大类，向统治者纳税，被核准营业的叫公娼，不纳税、未登记的叫私娼、暗娼。娼妓是黑社会的组成部分，所以对各种类型娼妓的称呼也希奇古怪，形同流氓切口。如公娼就分“长三”、“幺二”、“咸肉庄”、“雏妓”、“外国堂子”等十多类。私娼则有“荡白”（又名“淌白”、“淌排”）、“半开门”、“私门头”、“抛岗女郎”等各种名色。有些妓院还冠上一个风雅的名称，形形色色的“书寓”即是一例。

书寓 鸦片战争前，上海尚未开埠，当时城内“也是园”附近（现城隍庙南）开设有几家“书寓”。“书寓”中的妓女，称“女校书”。本是个出卖灵肉的场所，却要起个带有书卷气的名称，真是欲盖弥彰。所谓“女校书”，语出唐代四川名妓薛涛^①，而上海书寓的“校书”，又有说书的意思，能弹善唱，名义上卖口不卖身，可以唤她说书，也可以呼她侑酒，还可以在寓内开筵设宴，但不能公然宿夜。实际上留宿的也不少。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真正卖口不卖身的“书寓”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便是“长三书寓”。

长三书寓 俗称“长三”。因为这类妓院中，喝茶三元（银

① 唐代著名女诗人薛涛，陕西长安人，幼时随父薛郎到了四川，不幸父病身亡，她身入乐籍。薛涛才气横溢，从小善诗，元稹、白居易、杜牧、刘禹锡等当代名士都曾与她以诗唱和，蜀中节度使韦皋还曾想奏封薛涛为“校书郎”，所以蜀人称她为“女校书”。诗人王建还专门写了一首诗，曰：“万里楼台女校书，琵琶花下闭门居，扫眉才子知多少，管领春风总不如。”从此，女校书便成了妓女的雅称。

洋), 侑酒三元, 留宿也是三元, 故有“长三”之称。“长三”是头等妓院。为了标榜这里的妓女身价高, 他们自称“书寓”, 妓女称“先生”, 似乎也是卖嘴不卖身的。“长三”妓院主要集中在福州路新会乐里、云南路福祥里、广西路杰余里、广东路群玉坊一带。

十九世纪末, 上海长三堂子中有四名红妓女: “林黛玉”、金小宝、张书玉、陆兰芬。她们每天必到南京西路泰兴路口的张园“安恺第”茶厅各据一桌, 招揽熟客。有一家《游戏报》, 曾接连举办过三次“花榜”, 为林、金、张、陆四人捧场。

然而, 即使是这样的红妓女, 命运也很悲惨。“林黛玉”红了一阵便被人骗了钱财, 还受到造谣中伤, 不得已跑到北京, 正遇八国联军进京, 被抢劫一空, 又只身南逃, 受尽凌辱, 不知所终。金小宝虽然身陷污淖, 却想读书以脱离苦海, 在一个相好客人的帮助下, 设法报考到地处南市的城中女学就读, 两个月来, 十分用功, 老师同学都很喜欢她。谁知有一夜, 她的国文老师应邀去吃花酒, 同桌一个富商偏偏点名叫金小宝做“局”, 老师发觉这个聪明好学的女高足原来竟是妓女, 当即报告校长, 立即开除。从此金小宝被目为“污辱斯文”, 差一点得了精神病。四人中模样最漂亮的是发明“掙车”的陆兰芬, 下场也很可悲。

比起“么二”之类的中下等妓院来, “长三堂子”似是气派非凡的头等妓院, 长三信人似是养尊处优的“姑娘”“小姐”。她们的真实生活又怎样呢? 老新闻工作者夏其言为了揭穿国民党的“禁娼”骗局, 1946年曾经写过一篇《禁娼声中的长三信人》, 发表于1946年1月16~18日《时事新报》。文中写道: “所谓长三也者, 原来是这么一个肮脏的地方, 堆在天井里的不是煤球柴炭, 就是旧桶破桌, 抬起头, 像洗衣作一样挂满了湿淋

淋的衣服，那种零乱醒醒的景象，真是难于描摹。不过，撩开绣帘一进房门，这就完全变成另一个世界，不但整齐清洁，有的甚至还够得上富丽堂皇。但使人们留连忘返、乐不思蜀的，倒不仅是她们那些生财设备，主要的还在于她们‘体贴入微’。吃的玩的，要什么有什么，倦了有人替你敲腿，凉了有人替你披衣，水果糖食有人替你去壳剥皮，山珍海味有人替你送进嘴里，除了呼吸无法为你代劳之外，一切都由她们‘服侍’”。长三堂子正是靠着种种“周到”的“服侍”，一点一点地使嫖客销魂蚀骨，从而心甘情愿地为之倾家荡产。而对做“长三倌人”的妓女来说，最重要的莫过于克制作为一个人的一切需要和一切感情，千方百计地博得玩弄她们的男人的宠爱，同时又要能为男人的太太或太太们所容纳，从而争一个长三倌人的最好前途——当姨太太。可男人们来堂子，不过玩玩而已，长三倌人真正能争得姨太太的并不多，她们害怕年老色衰后去充当种种“贱役”，在年轻时便精神忧郁。长三倌人中，歇斯底里以致发疯自杀的也就特别多。

偶尔有个把熬出了头的“红倌人”，可以不受鸨母约束，自己“铺房间”当院主，但跟在她们身后的各种债务也就纷至沓来。“我们的债务多着呢！姆妈（老鸨）、娘姨、咖啡馆、水果摊、糖食店、成衣铺乃至理发店，都要还债，节边如果没有人做花酒，真要急死人！”她们永远有还不清的债，也只能为永远还不清的债而生存。

这就是对号称头等妓院“长三堂子”中的妓女生涯的真实写照。

么二 “么二”是二等妓院。因这里喝茶一元，侑酒一元，留宿第一次需六元，第二次只二元，故称“么二”。么二大多设

在过去的法租界内，如爱多亚路南京大戏院（现上海音乐厅）旁鸿运坊内的“鸿香院”，东新桥街（现浙江路）的“蕊香院”，东新桥街现水产公司旁的“神州旅馆”等。“么二”门前的招牌上往往带个“堂”字，如“双富堂”“高升堂”等，所以人们也称妓院为“堂子”。六马路上的“陶公馆”，是旧上海颇有名气的一家么二堂子。“公馆”里有一个设备齐全的客厅，那是嫖客为“公馆小姐”摆花酒的地方。可是被称为“公馆小姐”的妓女的住处却根本不是“小姐的闺房”。“陶公馆”老板把全屋分成上下四层，隔成三百多个房间，挤得像蜂窝一样，每个房间只能横置一张三尺半的床，直放一张小镜台和一只马桶、一把椅子。人们称为“鸽子笼”，其实连鸽子笼还不如，里面照不到阳光，也吸不到新鲜的空气。打开妓女的房门，一股霉味和低劣脂粉的刺激味冲鼻而来。房内白天也要开灯，阴暗潮湿，每样东西几乎都被霉菌沾染，在发霉，在腐烂。另外，如“夜都会”“杨贵妃”“金城”等么二堂子，都是一幢三层的里弄房子，妓院老板把楼板拆掉打通，隔成五、六层，里面要住几十个妓女。

咸肉庄 又名韩庄，因最早开设的人姓韩。以八仙桥、杀牛公司（现西藏路寿宁路口），以及现在的柳林路小商品市场一带为最多。这个带侮辱性的名称，最明显不过地打上了人肉市场的印记。“咸肉庄”是下等妓院，到这里来嫖妓被称之为“斩咸肉”，把到此卖淫的妓女比作人肉市场中一块不值钱的“咸肉”，可以任凭宰割。咸肉庄门内往往挂着淫荡的妓女照片，任人指名挑选。出入这类下等妓院的大都是土匪、流氓、地痞之类社会渣滓。

“咸肉庄”内的妓女最没有人身安全保障。三杀牛公司旁边有一家叫“夜来香”的咸肉庄，妓女名兰香，长得尚有几分姿

色，一次，不知怎么得罪了一个流氓，顿时大打出手，把她的眼睛打瞎了。兰香要养活老母幼弟，不得已又让未成年的妹妹接客，那流氓又纠集一伙无赖把她妹妹活活勒死。兰香睹着眼到处呼冤。一听她是“咸肉庄”的，没有一家法院受理。

咸水妹 在娼妓中历史最为悠久。“咸水妹”的名称，是从英文 hand-some maid 的译音讹变而来。她们专门接待外国水兵，忍受着种种最粗暴的侮辱和糟蹋。光绪二年，“咸水妹”受朝廷特许，成为公开合法的娼妓。她们中有不少人会讲几句“洋泾浜”式的外国话。咸水妹主要分布在霞飞路霞飞坊（现淮海中路淮海坊）和辣斐德路辣斐坊（现复兴中路复兴坊）一带。这类妓女的身上打上了最鲜明的半殖民地的标记。

雏妓 俗称“野鸡”，她们所在的妓院，称“开门堂子”，是最下等的一流。这种妓女有相当一部分是被人贩子拐卖来的，卖进妓院就没有一点自由，绝对不能个人出外。每到黄昏，她们那毫无血色的脸便被抹得煞白煞白，躲在电线木头的黑影里，由“搭客娘姨”（多是雏妓出身年老色衰的）跟着，一见男人，便硬装出惨白而又可怕的笑容，死活拉了去。她们拉不到客人就要受到种种惨苦的责罚，拉到客人所得也全部归妓院老板所有。她们的对象是着短衣的低下阶层，如工人、车夫、摊贩等。活动地点多在南洋桥、太平桥、郑家木桥（今广东路、延安路附近）和现在的金陵东路、西藏路一带。

跑堂口 这是比“野鸡”还要下贱的一种妓女，她们多是年老色衰或丑陋残疾的女子。跑堂口者没有固定场所，总是坐在旅馆的“堂口”（又称“茶房间”），客人只要说声“来个粉头！”她们立即跑去，约半个钟头后又返回堂口坐等。她们一夜常要接二十多个客人，其苦不可名状。而卖身所得都由妓

院和旅馆分成，自己所得极少，甚至分文没有。

花烟间 花烟间是既供吸毒又供宿娼的场所，小东门一带，触目皆是。其光顾者，不外是地痞流氓之类。30年代以后，蒋介石宣传“新生活运动”，表面上禁烟禁赌，公开的“花烟间”似乎不能再存在下去；实际上，哪家妓院不吸毒？哪个妓女不称“烟花女”？专以抽鸦片为营生的“花烟间”，其“特色”逐渐消融在各类妓院中罢了。

新兴妓院 这些妓院多由“向导社”“按摩院”演变而来。向导女以导游为名，行卖淫之实。按摩女郎则以推拿、按摩为名，为男人摸摸弄弄，取得男人的欢乐。抗战胜利后，有的向导女还常常坐在美国大兵的敞篷吉普车上，招摇过市，人称“吉普女郎”，成为美军在中国土地上横行无忌的特殊标记。

外国堂子 兴起于20年代初，外国妓女多为白俄及日本和朝鲜流亡女子，集中在虹口区北四川路一带。如塘沽路308号就是有名的日本妓院“司盖阿盖”（日文译音，意即“牛肉块”，指吃牛肉块或涮羊肉之类的地方，日本统称“料理间”），门口总是站着身穿和服的下女，笑盈盈地把客人引进去，以料理吃牛肉、羊肉为名，行“吃人肉”嫖妓之实。上海的料理间还有“月廼家”“花之间”等名称。这些外国堂子大多以西洋饭店和旧式小洋房为门面，以接外国水手为主要对象。

上海的私娼，人数比公娼多得多。“荡白”是指自己荡上来（或淌上来），先陪人荡马路，荡着荡着就跟人去开旅馆。“半开门”是家有丈夫孩子，为生活所迫而过着卖淫生涯。“抛岗女郎”原是咸水妹的切口，意为“等客”。这些人原先多是咸水妹，专门招徕洋人，后来生意日趋清淡，便成了什么人都迁就的“抛岗女郎”。还有“酒吧女”“玻璃杯”则是在酒吧间、茶室等

公共场所以待女的公开身份，暗中从事卖淫和变相卖淫者。

20年代开始，一到夏季，十里洋场的上海滩又掀起了两股狎妓之风。一是“开夜花园”。投机商们在郊外物色一处僻静点的地方，搭个芦席棚，弄点什么冷饮之类，供富商大贾、纨绔子弟们玩乐。这种地方既没有花，更不成其为花园，名为“夜花园”，实际上是淫乐场所。那些洋气十足的富贵公子，开着汽车，拥着妓女，深夜出去兜风消魂，“夜花园”便成了他们胡作非为的场所。另一种叫“色白大菜”，在西藏路福州路一带，一些番菜馆（广东馆子）通宵营业，吸引着一批批吃喝玩乐的酒色之徒。每到夜晚，这里裙屐联翩，杯盘狼藉，直到天色微明，一个个浪荡公子各扶着妓女的膀子，醉醺醺地招摇而去。

断账、拆账、赎身钿 ——妓院主手段毒辣

妇女被卖为娼妓有种种方式：一种是卖绝了的，叫做“讨人身体”，妓女也叫做“讨人”，是为“断账”。卖了“断账”的妓女，生死完全操纵在妓院主手里。另一种是“包账”，得了一笔身价钱，包定要替妓院主当几年妓女，这几年内的生死自由一切由妓院主处置。还有一种是“拆账”，名义上有人身自由，妓女可以从自己的血泪收入中分得一小部分，大部分（通常是六至七成）归妓院主。再有一种是“伙计”，是妓院主引诱良家妇女为娼，也有一些因欠债待还而被迫为娼的妇女在他们门口“相帮”，叫做“退账”。做“断账”和“包账”的，不但卖身收入全部归妓院主，就是嫖客有时私赠给妓女一些小玩意，也要统统被妓院主搜身而去。总的说来，上海的妓女分“捆”着和“站”

着两种。前者没有自由，一“捆”就是五年，十年。后者名义上有选择客人和随时离院的权利，但必须付出相当的代价。嫖客要是看中了某妓女，必须付出妓院老板的开价，这个妓女才可能脱离妓院。“捆”着的妓女，若有嫖客看中，也可“赎身”，但这时妓院老板更会漫天要价了。

妓院对妓女的剥削，除了固定方式以外，还会耍出各种各样凶狠毒辣手段，使受害者永无出头之日。例如向妓女放高利贷、罚款，引诱妓女吸毒及赌博等，牵制和迫使妓女继续为娼。

上海中下等妓院的一般妓女，老板规定每晚要接八个左右的客人，一个月就要接二百多个，所以，妓女落进火坑不满半个月，就会传染到花柳病。日久皮破肉烂，出卖一次肉体，就是遭受一次惨重的刑罚。如果接不到客人，等待着妓女的便是挨饿、罚跪、鞭打、火烙……。六合路裕德里一家妓院主，逼着一个满身梅毒的妓女继续接客，那妓女实在受不了惨痛，死活哀求不允，妓院主就让她跪在两个敲碎了的玻璃瓶底下，两腿鲜血淋淋，不几天便被虐待身死。还有一个叫徐淑敏的妓女，她三岁即被人拐买，卖了“断账”，到临解放那年正好二十岁。十多年来，她因不堪忍受卖淫的惨苦，多次拒绝接客，先后被妓院主用尖刀戳破肚子，用竹筷子扎破脸颊，还把她捆起来吊在天井里。和她同院还有个叫翠琴的妓女企图偷偷从良，竟被妓院主活埋。

妓院对妓女有严格的规定：不准私自外出（拉客时都有搭客娘姨看守），不准在外面与客人接谈，只准在妓院内与客人交往，如果外出同客人看一场戏，查到了也要处罚金；不准支借金钱；“拆账”的妓女得了小账也得交给妓院“代为保管”，名为“代管”，实际上往往给妓院主借口添置衣物和化妆品而一

笔勾销。“梅龙镇”妓女裘月娣，算是做“拆账”的，有“人身自由”，然而，她有事出去一天，还要交给妓院主五个“夜厢”（嫖客住夜的钱，每夜八元，合四十元）。

正是在妓女惨痛的生活上，堆起了妓院主无耻的财富。一个卖“断账”的妓女，身价仅几十元，而一次初夜权，就可以开一两条小黄鱼（一条“小黄鱼”指一两黄金）。换句话说，妓院主在一个晚上就可收回拐买妓女所付出的身价而大大有余，以后妓女卖淫所得统统装进老板的腰包。如果是稍有姿色的，妓院主还要向嫖客狮子大开口，点花烛，摆花酒，动不动开价上千元。一个妓女往往多次被冒充黄花闺女摆花酒，妓院主便可多次从中大发横财。做“包账”的妓女，期限满了还要多熬一年，名曰“补工”。妓女从良或回家养病，都得向妓院主补贴款项。老闸区某妓院妓女王东来，生病以后，不能接客，老板逼她借“印子钱”（高利贷）交还“夜厢”（每夜五元）。

这些妓女，遭受了多年的蹂躏，被摧残的身心完全失去了常态。她们没有欢笑，没有眼泪，没有羞耻之心，过着黯淡无光的堕落生涯。在她们心目中，出卖肉体，换取金钱就是一切。她们是妓院主的商品和嫖客的泄欲工具。一旦进了妓院，就是进了无期徒刑的监狱，除了少数人能够从良，年老色衰的成为“搭客娘姨”之类帮凶外，大部分妓女最后总是染上性病，受尽折磨，过早地悲惨死去。

流氓、帮会、老头子 ——旧上海妓院的靠山

旧上海的妓院绝大部分开设在租界内，而上海的租界除

了洋人以外，大小事项主要控制在流氓帮会手中。他们的头子便是有名的“三大亨”——黄金荣、张啸林、杜月笙。

三大亨中，黄金荣发迹最早。黄早年是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的“包打听”，不久升为督察长。结伙张、杜，靠着一白（棉花）、一黑（烟土）两注生意大发横财。他们一面倾销进口棉花，挤垮了上海的民族工业；一面合伙开设“三鑫”公司，贩卖鸦片麻醉毒害千万同胞。1931年，最早开办大世界游乐场的老板黄楚九病死，大世界很快被黄金荣接管。黄金荣便和杜月笙、张啸林一起，以大世界为中心，迅速开办了一大批赌窟、妓院、燕子窝（鸦片烟馆）、旅馆和舞厅，他们依仗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势力，广收门徒，结交盗匪，进而控制了租界内所有的淫乐交际场所。妓院、赌场、烟馆、戏院，遂成了他们在租界的四大财源。

开设妓院之类，直接出面的当然不是“大亨”们。每个妓院自有各自的妓院主（也称妓院老板）。在上海滩上，要成为一个妓院主，起码得具备两种资格：即外有“货色”来路，和人贩子、拐子相识；内有后台老板，拜流氓老头子为师。相比之下，上海吃“拐子饭”的人并不难找（吃这号饭的也叫“白蚂蚁”，广东路上有一家茶馆，就曾成为“白蚂蚁”市场），而拜老头子却很有讲究。别看黄金荣、杜月笙之流都是什么“海上闻人”，担任国民党政府的高级官员，杜还参加竞选上海市参议会会议长，但他们赖以发迹的途径之一，便是经营这种肮脏勾当。

拿四马路会乐里来说，上百家妓院，每家都有一个“抱台脚”的（也有几家妓院合抱一个“台脚”），这就是后台老板。这些“抱台脚”的，都是黄、杜、张手下“学”字辈的徒孙，而操纵妓

院则要是由“五”字辈的徒子来承担^①。妓院老板在孝敬了“学”字辈徒孙上千元银洋后，由他们引见，拜“五”字辈的徒子做“老头子”，老头子举行颇为隆重的仪式，名谓“开香堂”，正式收他们为徒。一次开香堂，点几斤重的红蜡烛，铺红地毯，三跪九叩不说，光“压帖钱”就要五六根“大黄鱼”（指五六十两黄金），然后由“引见师”引见，点法师讲家规，教“切口”，口称“先生”，算是入了帮派。从此以后，这帮流氓就三天两头来“打秋风”，逢年过节请客送礼永无止境，来了一个稍为漂亮一点的妓女，当然更得“孝敬”他们。徒子徒孙得了妓院主的好处再去孝敬大亨，由大亨出面去巴结洋人老子。因此，表面上看来，租界妓院的花捐一般为百分之十到二十，而背后孝敬这帮“小爷叔”的远远比花捐多得多。但妓院主是不会吃亏的，一方面，他们可以靠加倍榨取妓女的血泪钱来中饱私囊；另一方面，在花血本拜了“老头子”以后，妓院里发生拐骗情事，乃至逼死人命，只消老头子向巡捕房打声招呼就没事了。所以，凡当妓院主者，必拜老头子；不拜老头子者，决当不了妓院主。

少数有点名声的妓女或交际花，往往自己挂牌开业，这些人不叫拜老头子，而称“认过房爷”，其实性质是一样的。所不同者，“白天过房爷，夜里小当家”而已。就如话剧《日出》里的陈白露和金八爷那样。

旧上海直接控制妓院的大流氓有顾嘉棠、谢葆生、顾竹轩等。顾嘉棠是杜月笙的大弟子，在北京西路胶州路处建造了一座很漂亮的公馆，题名“佳庐”。他是杜月笙开设烟、赌、嫖业

^① 青帮在上海分“大”“通”“五”“学”四个辈份，当时“大”字辈已无人，“通”字辈成了最高辈份。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都花了大价钱取得了“通”字辈的资格，每人手下都豢养着上万名徒子徒孙。

的总管，逢年过节二马路三马路一带的妓院都要孝敬他。谢葆生原是跑马厅的一个马车夫，后来改做汽车司机，进了三大亨之门后，神气起来，在卡德路（现石门二路）开了一家卡德浴室，兼营妓院勾当，四马路会乐里也有他的股份。日伪时期，谢葆生充当过伪江苏警察厅长，日本投降后被杀。顾竹轩是天蟾舞台的老板，人称“江北大亨”，四马路一带的妓院几乎都要给他好处，霸极一时，后来在“狗咬狗”的争斗中被人打死。

二 封闭妓院 收容妓女

娼妓制度是最野蛮最残暴的社会制度的产物。可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出现以前，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真正禁过娼。从19世纪到20世纪，欧美一些国家曾经一次又一次地召开过“反对卖淫国际代表大会”，可是卖淫妇女的人数却越来越多。1913年，在伦敦召开的“反对卖淫第五次国际代表大会”上，温文尔雅的公爵夫人、小姐、主教、牧师、警官以至各种各样的资产阶级慈善家们提出，要用宗教和警察来感化和监视“堕落”的妇女，要用肉刑来对付诱淫行为。可是，当有的代表试图提出关于卖淫的社会原因，关于工人家庭的赤贫和悲惨状况时，敌意的嘘声却使发言被迫中止。对此，列宁曾一针见血地揭露：“这个贵族资产阶级的会议充满了多么丑恶的资产阶级的伪善。伪善的慈善家和嘲弄赤贫状况的警察辩护人集合起来‘反对卖淫’，而卖淫的支持者又恰恰是贵族和资产阶级……”^①

在旧中国，也多次发生过禁娼和公娼的争论。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还把这两种意见拿到南京政府去辩论。主张禁娼的人认为，再允许娼妓存在下去，花柳病将越来越严重，其影响之大，将危及我们民族的生存。他们所主张的禁娼办法是，对敢

^① 列宁《反对卖淫第五次国际代表大会》，引自《列宁全集》19卷第254——255页。

于为娼者坚决捕获，然后处以严厉的罚金。这种办法只严惩娼妓，而不处置嫖客，因为在他们看来，造成娼妓制度的原因就在妓女的不知廉耻，宿娼的男子是没有过错的。主张实行公娼制的人则认为，娼妓的存在是无法避免的，政府实行禁娼的结果只能使公娼转入地下，变为私娼，娼妓反有增加的趋势。实行禁娼不如实行公娼，“使以卖淫为生活的娼妓，居住在特定的地方，规则地加以卫生的检查，似乎对于社会健康以至卖淫妇女本身，都是说得过去的”。主张禁娼的人又出来说：你们说对公娼实行定期检查，一个中等城市算它有一千名公娼，不为多吧，这要有多少医生来进行卫生检查呢？每隔几天检查一次呢？况且，对娼妓作检查，对嫖客检查不检查呢？争论来争论去，最后还是不了了之，而娼妓的数目则越来越多。

时至今日，在一切标榜为“最文明”“最人道”的资产阶级国家里，公开的和变相的卖淫依然司空见惯。不仅如此，有一位德国“学者”竟然说：“娼妓制度是我们文明制度的必然相关物”^①，据他说来，只要国家加强对卖淫制度的管理，“将没有梅毒的娼妓供给男子，是正当的事。”著名哲学家罗素一方面承认娼妓可怜，另一方面则又认为娼妓制度不能完全废除，只能让娼妓保持相当的数目——降至最低的限度^②。显然，产生娼妓的社会经济制度不消灭，娼妓制度是永远消灭不了的。历史只能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预言的那样：“当现代的生产关系消灭的时候，则从这种关系中产生的公妻制，即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娼妓制度，当然也会随着消灭的。”^③

① 引自鲍祖宝著《娼妓问题》一书。

② 参见罗素《婚姻与道德》一书。

③ 参见《共产党宣言》，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2页。

延续了三千年的罪恶的中国娼妓制度，只有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年代，才会被彻底铲除。

京、津、宁、杭等大中城市相继禁娼

随着神州大地四处响起“解放”的欢呼声，禁娼，作为人民解放的内容之一，相继摆上了全国各大都市的议事日程。

下面是从当时的报章杂志摘取的有关都市禁娼的事实：

1947年11月，石家庄市解放。次年1月4日，市政府即布告封闭妓院，72名妓女送教养院学习教育，妓院主、老鸨、伙计多数遣送回籍或取保释放，两名残酷虐待妓女的妓院主逮捕法办。在此之前，先解放的焦作市已动员妓女从良后参加生产；邯郸、邢台原有的妓女大都改务正业，生活过得很好。

1949年7月，吉林市封闭妓院，收容妓女103人，妓院主与伙计44人依情节轻重作出相应处理。

1949年11月21日下午5时，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一致通过封闭妓院的决议。5时半，市长聂荣臻下令，公安局长罗瑞卿直接指挥，出动干部和公安总队警士2400余人。到次日凌晨5时，全市224家妓院全部被封，1268名妓女获得解放，454名妓院老板、领家分别审查后，按罪行大小依法处理，妓院财产全部没收，作为救济妓女之用。

行动前，聂荣臻同志和彭真同志将北京市封闭妓院的决议报告了毛主席，说明将依法处理妓院老板，集中妓女给以教育，医治性病，治好后，有家可归的送其回家，有结婚对象的助

其结婚，无家可归、无偶可配者组织她们学习手艺，从事生产。毛主席听完说：“这个决议很好！”

1949年11月30日，蚌埠市由公安局长指挥，封闭妓院119家，175名妓女愿回原籍者资助还乡，无家可归者，予以教养改造；119名妓院老板和鸨儿，经讯问后，剥削妓女情节较轻者具保开释，情节严重者依法治罪；妓院财产原则上全部没收，拨充教养妓女之经费。

1949年11月29日，南京市公安局在妓女较集中的大石坝地区，召集妓女、鸨母500多人开会。会议负责人指出：娼妓转业从良，鸨母不得阻拦。会后，妓女纷纷转业。

苏州市妓女，一向以旅馆为营业场所。1949年10月，苏州市公安局颁布旅馆管理规则，旅馆业工会依照规则拒绝妓女出入旅馆。11月北京等地封闭妓院，苏州妓女也随之转业。到1949年底1950年初，扬州、镇江等地妓院也纷纷停业。

1949年底，杭州市收容小偷、扒手、妓女、乞丐等游民3700余人，其中包括妓女600多人。

1950年1月15日，天津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对妓女问题郑重决定：严格管理限制妓院的活动范围，消除老板、领家对妓女的压榨，解放妓女人身自由，帮助妓女转业，防止流为暗娼，在预定时间内彻底消灭娼妓制度。市公安局根据这一决定，引导妓女逐步走向新生。到1950年3月1日止，天津市裕德里72家一等妓院，200多名妓女全部改业，全

市妓女（包括暗娼）从解放前夕的近 20,000 人，锐减为 800 余人。1951 年底，残留下来的妓院全部封闭，妓女集中收容。

1951 年 9 月，西安市查封妓院，收容妓女 640 多人，依法审查妓院老板 297 人。12 月 19 日，西安市召开有五万多市民参加的宣判妓院老板罪行大会。会上宣布对 3 名罪大恶极的妓院主判处死刑，立即执行；203 名妓院主分别判处 1~12 年有期徒刑；91 名罪行较轻、态度较好的妓院主当场释放。

1951 年 11 月 20 日，南通市封闭全部妓院，依法逮捕了一批以残酷迫害妓女为生的妓院主和老鸨，当场搜出迫害妓女的卖身契 30 多件。在市妇联和广大居民的欢送下，所有妓女集中到教养院教育改造。

1951 年 11 月 22 日，青岛市市长下令，封闭全市 6 家残存妓院，妓女和暗娼 296 人集中收容，依法逮捕妓院班主 239 人（青岛妓院规模较大，解放前夕有妓院 11 家，妓女近千人）。

1952 年 9 月 11 日，武汉市人民政府下令封闭妓馆，取缔暗娼，297 名妓女集中收容，治疗疾病。

各大都市禁娼的做法，基本上可分为“北京方式”和“天津方式”两种。所谓“北京方式”，就是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集中相当的人力、物力，一举封闭全部妓院，集中所有的妓院老板、领家和鸨儿加以审查处理，所有妓女收容教育，治疗疾病。

1949 年 11 月 21 日，聂荣臻市长命令一下，北京市公安

局、民政局、卫生局、市民主妇联的干部和公安总队战士 2400 多人，马上出动，乘坐 21 辆大卡车，3 辆吉普，5 辆摩托，妓院集中的 5 个区的公安分局也出动了 37 辆汽车，分发至各妓院集中地。他们带了三千张封条，要把人民首都的妓院全部封闭。卫生部的一个消毒组（包括 5 名医生，7 名护士），带了消毒药水和药品，也同时出动。人民法院备下专人和有关条文，迎接这一重大战役。

就这样，仅四五个小时，北京市 224 家妓院全部封闭，妓院老板、领家、妓女、“大茶壶”、跟妈、嫖客等全部集中。次日清晨，450 余名老板、领家即分头转送法院，依法审讯；1200 多名妓女一一消毒后分别集中到临时设置的八个妇女生产教养所内；其他茶役、跟妈及嫖客等当即开释。两天后（11 月 23 日）北京市即从市妇联、公安局、民政局、卫生局抽调七十多名干部，正式组织妇女生产教养院，负责教育管理妓女，并立即开始治病。也是在这一天，罗瑞卿局长对在押妓院老板、领家当面训斥，指出他们的罪恶，宣布人民政府的处理方针。罗瑞卿局长庄严宣告：“人民的首都，决不允许这种野蛮的吃人的制度再存在下去了！”“你们只有老老实实地向人民低头悔过，向政府坦白罪行，痛改前非，才有自新之路；否则，人民是不能宽恕你们的！”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用如此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禁千年吃人制度于一旦，无疑是必要的和及时的。

“天津方式”是先采取多种限制措施，引导妓女逐步走向新生，到条件成熟时一举封闭残存妓院。

据统计，解放初，天津尚有妓院 530 家，妓女 1669 人。北京封闭妓院的消息传到天津，她们就敏锐地感觉到，“此道”不

会长久了。妓院急剧减少,到1949年年底,妓院便减少到99家,妓女减少到329人,其中有148人正式结婚了。但是,1950年1月5日,天津市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作出的关于妓女问题的决定,并没有仿效北京一举封闭,而是严格管理和限制。天津市人民政府两位负责人解释这一做法时指出,解放前夕天津有妓女近二万人,依靠妓女为生的茶房等职工也有一两万人。刚解放我们经济还很困难,如果一下子全部封闭妓院,收容妓女,势必增加人民的负担。天津市各界人民代表,正是经过了反复思考和讨论,才作出了这一缜密的决定。

然而,决定公布后,一部分妓院主、领家却又产生了“人民政府既不封闭,大可拖延下去”的苟安想法。一些甘心沉沦的妓女也抱有幻想,错误地认为限制了妓院主和领家的剥削,自己可赚更多的钱了。眼前只顾赚钱,到真要取缔时再说。居然又有部分妓院要求复业。面对这种情况,天津市有关部门做了大量的工作,召集妓女、老鸨、伙计举行各种各样的座谈会,指出取缔娼妓势在必行,多做一天妓女,多受一天活罪,不如尽快转业;同时帮助妓女解决转业、从良、回乡的种种具体问题。对那些非法勒索和阻碍妓女转业的妓院主严加惩处。正是这种说服和惩处相结合、实心实意的经济帮助和苦口婆心的启发教育并行的方针,使天津妓女的转业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天津市一等妓院的集中地裕德里一带,解放前最盛时有妓院120多家,妓女800多人,到天津解放时还有妓院72家,妓女200多人,经公安部门严加管束后,妓院减少到12家,妓女剩下23名。当地政府又帮助动员妓女迅速转业,原来的妓院院址有五家改为纺织厂,一家改为地毯厂,一家改为饭店,四家改为旅馆,其余歇业后改为民宅;原来的妓女有的

回原籍，有的结了婚，有的参加生产。到1951年11月，天津禁娼水到渠成，一举完成。

上海禁娼前周密准备

上海，是全国最大的城市，也是娼妓及妓院数字最为庞大的都市。报告文学《一个人和一个城市》中曾提到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回，陈毅市长在共舞台看戏，警卫班战士小王穿着便衣在陈毅的汽车附近警戒。突然，有人在小王背后扯他的衣袖，回头一看，是个十六七岁的陌生姑娘，脸上堆着勉强的笑容，向他伸出两个指头，轻声说：“翻一夜，两块钱，阿要？”小王像挨了一记耳光，猛然挣脱，大喝一声：“你干什么？！”那姑娘吓得溜进黑灯瞎火的弄堂里去了。

陈毅听说了此事，慨然地对小王说：“你今天吓跑了她，明天她照样到街上拉客，……为了两块钱，可悲啊！”^①确实，上海的妓女不但人数庞大，而且名目繁多。特别是那些一到夜晚便在街头弄口四出拉客的“野鸡”，她们没有登记，昼伏夜出，难以控制。淫猥糜烂的生活，已把她们的灵魂完全扭曲。对这些人，劝，劝不住；管，“又不能每天晚上派一千警察去站风化岗！”捉，也不符合政策；上海是个国际性大都市，这些人背后，又有着许多复杂的背景。当时谣言甚多，有的造谣说：“共产党经费困难，要卖妓女，年轻漂亮的卖一千五，最丑的也卖三百块！”有的还放出空气：“解放军打台湾，要把妓女绑到前

^① 参见《一个人和一个城市》。

面去踩地雷。”弄得不少妓女人心惶惶，情绪颇为对立。上海解放伊始，面临着大批工厂停工、经济困难、银元贩子活跃、物价飞涨，以及特务破坏、敌机轰炸等许多重大问题，因此，上海没有像北京那样，一解放就大刀阔斧地封闭妓院，而是直到解放两年多后（1951年11月25日）才正式下令禁娼。

但是，上海市为了彻底铲除娼妓制度，早在正式下令禁娼之前，已经做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

1. 支持妓院自动停业，妓女自行跳出火坑。

1949年5月25日上海解放。同年6月，市公安局特营科正俗股即着手登记妓院和妓女（公娼）的数字。7月1日，正俗股向报界发表登记数字：“1949年1月，上海有妓院800多家，妓女4000多人；5月，妓院减少为525家，妓女2227人。至6月30日止，又有69家妓院自动停业，234名妓女转业。”

7月9日，上海市人民法院成立。接着，报上即发表了“妓女脱离卖淫生涯，‘龟门’要赎身费违法”的法律问答。指出：“妓女要求脱离卖身生涯，是很好的表现。‘龟门’没有要求妓女给卖身费的权利，妓女的衣服及其他东西，均可以带出来。”“假使‘龟门’阻止妓女脱离卖淫生涯的火坑，那就是妨碍人身自由，妓女可以向人民法院控告。”“人民政府不仅赞成妓女脱离卖淫生涯，而且要积极协助她们跳出这样的火坑。”“在新民主主义的政策下，每个人在法律上都有身体自由和婚姻自由，妓女要求结婚，完全合法。但在选择配偶时，应十分慎重，要忠实可靠。鸨母如不准妓女结婚的话，可以诉请人民法院依法处理。”

通过宣传，社会风气进一步好转。1949年8月上半月，妓院继续锐减，停掉60家，妓女减少172名（其中回乡生产者89

名,改业者 29 名,进厂者 4 名,结婚者 15 名,其他 35 名)。

2. 颁布管理妓女的暂行规定。

1949 年 8 月 16 日,市公安局颁布管理妓院的暂行规定十四项,勒令各妓院严格执行:

- (1) 不得引诱接待军政及一切公务人员;
- (2) 不得接待年龄未满廿岁或身心不健全之狎客;
- (3) 不得贩卖、留存、吸食鸦片及一切毒品;
- (4) 不得接待来历不明或持有伪身份证者;
- (5) 不得有赌博及类似赌博行为;
- (6) 不得深夜高声谈唱、无故喧嚷,妨害公共安宁;
- (7) 不得留存违禁物品,及窝藏盗匪之赃物等;
- (8) 不得摆花酒大请客,以妓院为交际场所;
- (9) 禁止妓女在外狎宿;
- (10) 禁止妓女患病接客;
- (11) 严禁勾拐买卖人口,严禁未满十八岁之妓女接客;
- (12) 妓女不得站街拉客;
- (13) 院主不得虐待及强迫妓女接客;
- (14) 废除妓女与院主之间一切契约,如妓女申请脱离,院方应无条件允许其自由。

公安局的暂行规定明确指出:本禁令宣布后,违者将予罚款、拘役及封闭之处分^①。

公安部门令行禁止,十四条禁令一出,凡有违犯的,一概严惩不贷。10 月 18 日,有一个叫杨奇凤的十六岁少女投书《大公报》,声称她原籍镇江,因哥哥被国民党抽壮丁,家中难以糊口,被一姓萧的女人拐卖来沪,当了暗娼,萧逼着她傍晚到大

^① 参见 1949 年 8 月 16 日《大公报》。

世界当“野鸡”，白天到先施公司兜圈，这样白天要做五六个临时“客人”，夜晚要带一个“客人”回家伴宿，十六岁少女已被摧残得不成人形。来信人透露了她卖淫的场所，求《大公报》编辑速将此信转妇女救济会。这位解放后还生活在火坑之中的少女声泪俱下地呼喊：“先生，你们是社会主持正义的人，望你们伸出正义的手，救救我，救救我这一个没有了灵魂、只有躯壳快要垂死的可怜的女孩子吧！我一定会拿出勇气，去寻找我的灵魂，将我未死的身躯，回到乡间去，努力生产来报答你们的。”

《大公报》社会服务部当天下午就将此信转到嵩山区公安分局。当晚十二时，嵩山分局出动四名干警，按杨奇凤提供的地址，一举抓获了拐卖人口逼良为娼的萧姓夫妇，依法逮捕，救出了少女杨奇凤，并派人护送回乡^①。

市公安局禁令的颁布，加上北京等地大刀阔斧封闭妓院的消息传到上海，许多操此营生的人感到“这碗饭吃不下去了”，事实上，妓院的生意也的确日趋清淡，尤以长三堂子为甚。长三堂子原是旧上海达官贵人和富商大贾的淫乐场所，随着解放大军的炮声逼近，国民党权贵纷纷逃往台湾、香港、美国，留下来的也心神不宁，很少抛头露面。于是，集中在会乐里、群玉坊、小花园、福裕里、福致里等处的原有数十家长三堂子，大部分先后遣散和紧缩。会乐里“春燕楼”的妓女纷纷返回原籍；小花园的“燕鸿”，将大部分房子出租，以房租收入维持生活；残存的其余几家，生意也清淡得很。么二堂子也好不了多少，最负盛名的“陶公馆”，解放前有300多名妓女，市公安局禁令一出，大部分妓女自动转业，经常留院接客的只剩下20

^① 参见1949年10月21日《大公报》。

多人，北京封闭妓院的消息传来后，又减少为 12 名。而以地痞、流氓为营业对象的咸肉庄，更是失去了继续存在的基础。

3. 组织已停业和希望转业的女工参加学习，接受生产劳动的技能训练。

在上海最先组织起来学习的是“百乐门”、“维也纳”舞厅的 40 多名舞女。1949 年 7 月起，两舞厅的舞女就自动要求组织学习，紧接着，陶公馆、美星等妓院的女工也一起参加学习，市民主妇联立即派来了教员。每逢星期一、三、五为高级班，主要学习《新中国的新妇女》和《妇女问题新讲》两本书；二、四、六为低级班，以《长征故事》和《国文教育实验》为课本，主要学习识字。通过学习，使她们逐渐认识了自身的价值和造成自身堕落的社会原因。在一篇题为《我的自述》的作文里，许多女工叙述了自己的辛酸遭遇，控诉了旧社会在灯红酒绿的生活掩盖之下的种种罪恶，表达了她们对将来参加劳动生产的信心。一位叫凌珍的女工写了一篇短文《我的愿望》，她写道：“在过去的社会里，我们是一群被社会所遗弃了的人，处处遭遇到人家的轻视和讥讽，虽然我心中有着一种愿望，但是环境逼迫着我不能实现。在上海解放后，妇联几位热心的先生帮助我们开班学习，使我有了一种新的认识——现在的我和过去的我是不同了！我应该要学习，我需要读书，我要多增加学识，使我在新社会中能有立足之地。让我能重新站起来，真正成为新社会的一分子，为人民服务。今后我希望能给孩子们服务，这就是我的愿望。”

还有一位叫金英的，她写道：“现在是解放了，我愿望全中国快解放，那么我们人民在（才）有好日子过。在蒋匪统治下，有钱的人可以压迫人，无钱的人只好受气，我受了有钱人多少

苦啊！我愿望姐妹们都能学习好的思想，可以替人民做些有用的事业，将来国家才有发达的一天，我们做女人的就不会这么苦了。”

老闸区“夜都会”妓院的12个姐妹，在认清了旧社会对她们迫害后，也选择了新的道路。1951年6月，她们组织了一个劳动小组，凑了一些钱，买来了织袜机，学织袜技术。“群玉坊”的姐妹也在1951年10月办起了一个小型袜厂，从上午八时到下午四时，十个姐妹专心地学习生产技术，为自己的前途打好基础。

大部分妓女都希望人民政府帮助她们学习生产技能，顺利转业，因为操此生涯的妓女大多不识字，毫无生产生活技能，也无乡可归，无亲可靠。有一个叫郑花的年轻妓女说：“最近，公安局有人来告诉我们，如果妓女申请脱离，院方应无条件听其自由，许多姐妹都改行不干了，可是我一字不识，一行手艺也不会，叫我怎么办呢？”还有一个叫陈美珍的妓女说：“我本来是舞女，因为舞场生意不好，才不得已干这个。我的年纪也不算小了，接触的客人总有几百人，但是人家不把我们当人看，一句真话也没有听到过。前些日子听说‘百乐门’的舞女都在学缝纫和认字，我真替她们高兴。希望我们也能组织起来，和她们一样参加学习。”

4. 明确指出妓女是受害者，其成分分别定为“游民”或“城市贫民”。

1949年12月，上海各报对“妓女是什么成分，政府对她们是什么态度”作了明确的回答。指出：“妓女如以出卖肉体为生活主要来源，连续三年以上的，可定为游民。但是，她们原系劳动者，在万恶的旧社会，她们有的误入歧途，有的被拐

卖而流落成为娼妓，她们中的多数人并非出于自愿，积极想跳出火坑，重新恢复劳动生活。尽管她们以不正当方法作为主要生活来源，并连续三年以上，也不应视为游民，而应分别情况，视为劳动者或贫民。人民政府将帮助妓女改造思想，医治性病，有家可归者送其回家，有结婚对象者助其成婚，无家可归、无偶可配者，组织学艺，从事生产。”^①

5. 收容流浪妓女。

1949年11月，本市泰兴路601号开设了一家妇女生产教养所，先后收容了400多名流落街头的妇女，其中大多是私娼和乞丐，有60%染上了吸毒恶习。这些流浪妇女在旧社会中所经历的遭遇各不相同，但到头来都是贫病交加，无处安身，被吃人的旧社会所抛弃，任凭风吹雨淋，也只好流落街头。

担负收容工作的同志本着革命人道主义精神为她们剪发，送衣，铺床，耐心地向这批哭哭啼啼的流浪者解释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对她们中的吸毒者要求坚决戒除吸毒恶习。然后让她们按12—13人一班组织起来，学习过有规律的集体生活。

400多名流浪妇女中，还带有小孩20多名。她们这些孩子在教养所里得到特别照顾，专门为不会吃饭的幼儿准备了糯米糊和其他营养品，让他们跟自己的母亲一起过着衣食不愁的生活。

收容后的流浪妇女中，有30%患有梅毒，70%患有其他疾病。市里专门派了性病专家和内科大夫长驻泰兴路601号，为患者治病。

亲人般的体贴关怀，使这些从来没有尝过人间温暖的“贱

^① 参见1949年12月5日《解放日报》。

民”感动得热泪盈眶。她们中有的托人捎信劝过去的要好姐妹赶快结束卖淫流浪的非人生活，有的埋头学习缝纫，争取今后能依靠自己的双手挣光荣钱；有的要求参加修桥筑路，洗赎“有罪之身”。1950年3月7日，在基本上治好疾病，掌握初步的劳动技能后，她们和其他被收容的游民一起，绝大部分送到苏北垦区参加劳动生产。流浪女终于开始有了安定的家。

上述各种准备工作，打击了不法行为，伸张了正气，明确了政策，安定了人心。妓院急剧减少，妓女大批改业，到1950年5—6月间（上海解放一年后）市公安局换发妓女执照时，上海的妓院从一年前的525家，减少到158家，妓女从2227人减少到662人。一年来查有妓女回乡650人，从良302人，转业歇业283人。到1951年11月上海市第一次妓女大收容前，只剩下妓院72家，妓女（公娼）180多名。

筹建上海妇女劳动教养所

1951年11月5日，上海市民主妇联和家庭妇联抽调50余名妇女干部向民政局报到，在通州路418号集中学习。整整二十天，按照规定，这批同志在被抽调期间不能回家，不能写信，也不能打电话，她们是去从事一项特殊使命的。

通州路418号，就是即将建立的上海妇女劳动教养所的所址，这批妇女干部，就是教育改造上海千百名妓女的骨干队伍。

妓女这个名称，对每一个正派的女子来说，都意味着一种耻辱。现在，这些妇女干部要去从事教育改造妓女的工作，还必须住在所里，白天黑夜都和这么多的妓女一起生活，万一传

染上性病怎么办，而且，就这么几十个手无寸铁的女同志，能对付得了一批又一批已习惯了卖淫生活的女人吗？开始接到通知时，不少人顾虑重重，畏缩不前。

市民主妇联宣传部有一位年轻的文教干部，是个十八岁的姑娘。她一接到通知，眼前立即浮现出一幕幕令人害怕的人间悲惨景象。早些时候，她曾经在大世界、法大马路（现在的金陵东路）等地，亲眼看到一些“野鸡”，涂脂抹粉，妖形怪状，头上还插一枝红花，立在马路上死拖活拉过路单身汉，这种丑恶的形象使她越想越可憎。面对着手里的通知，她想：自己是一个年轻姑娘，能同这样的女人去打交道吗？想着想着，她顾不得什么组织原则，一屁股坐在办公室的楼梯口放声大哭起来，说什么也不肯去报到。她的科长是一位老干部，非常理解姑娘的心境，一面同她谈心，说明改造妓女工作的重要性，一面雇了辆三轮车，亲切地送她去报到，并鼓励她消除顾虑，克服困难，好好工作，为解放妇女作出贡献。后来，这位姑娘终于成了一名得力的好干部。

是的，这些同志都是经过组织精心挑选来的，她们都有丰富的群众工作经验，有中学以上的文化程度，其中许多人还是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她们以解放妇女为己任，克服了个人的许多困难和顾虑，勇敢地去从事这一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工作。担任教养所所长的是一位年近半百的中共地下党员，几十年来党叫干啥就干啥，当她接到通知，顾不得自己有心脏病和高血压，立即带上行李和药品，住进了妇女教养所。副所长是一位洁身自好的女同志，家中父亲早逝，留下二弟一妹，靠她抚育成长。困难的处境使她立志独身，性情变得比较孤僻。当领导上要让她到教养所去对妓女开展工作时，一股抵触

情绪油然而生，连声说：“啧啧，这工作叫我怎么做？”但她毕竟是一位久经锻炼的好同志，在关键时刻能以事业为重。头脑冷静下来，她二话不说，就卷起行李报到去了。

静安区家庭妇联有位 27 岁的女干部，已是三个孩子的妈妈，丈夫新近病故，一家重担全压在这位青年妇女身上，她克服了重重困难，安排好孩子的食宿，来到了教养所。她对人说：“哪朝哪代哪个国家没有妓女？今天我能亲手从事改造妓女的工作，没有比这更有意义的了，再大的困难我也能克服！”

通州路 418 号地处提篮桥区（现为虹口区）。上海一解放，这里就被作为灾民收容所，收容了两千多名流落街头的灾民，1950 年 3 月，人民政府敲锣打鼓欢送他们到苏北垦区，建设他们的“新人村”。以后，这里又作为上海第二劳动生产教养所，收容了四千多名游民（其中包括乞丐、小偷、扒手、吸毒者等）。所里把他们组织起来，挑选有技术、有手艺的成立了“工程队”，上海解放后新建的第一座电影院——长宁电影院，和第一个工人新村——曹杨新村，就是由他们参加建设的。有文化会歌舞的还组织了“剧团”，在所内所外唱歌演戏，开展各种文化娱乐活动。到 1951 年下半年筹建妇女教养所时，游民们大都已改造成新人，出所找到了新的职业。还有 200 多名无家可归、自愿留所的，在所内棉花工场从事轧花、弹花等工作。这个曾经收容过 4000 多人，占地百亩的场所，里面留下大片空房和空地，是妇女教养所的理想选址。因为这里远离热闹地区，干扰少，离公安部门（提篮桥分局）较近，便于管理和教育；加上这里空气新鲜，环境清静，附近又有医院，有利于姐妹们治疗疾病。

妇女教养所不是劳改单位，住在里面的都是被糟蹋被摧

残的苦难姐妹。因此，教养所前面没有铁门，周围没有高围墙，也没有一名武警人员。白天大门敞开，一进门首先看到的是一个广场，可以同时容纳两千余人活动。正中高耸着5米高、2.5米宽的巨幅铅制竖牌，鲜花丛中竖着醒目的红字标语“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广场两旁整整齐齐地新建了四个庭院，一个庭院是干部办公室和宿舍，三个庭院安置着三个大队的翻身姐妹。每个庭院有十间房间作为姐妹们的宿舍，每间放置28张双人叠床，一间作干部（分队长、大队长）办公室，一间活动室。姐妹们即按8人一班，56人一分队，500人左右一大队编制。

庭院的前面，是姐妹们劳动的工场，庭院的后面，则是托儿所、图书馆、文娱活动室和为姐妹们治病的医务室。医务室里添置了全新的医疗设施，有挂号处、门诊室、注射室、手术室、药房间和50张床位的病房，以及医务人员的办公室、值班室，治疗手续完全像正规医院。教养所内还有可容两千多人的大礼堂，还有舞台和清洁的厨房、宽敞的饭厅……前来参观的海内外人士无不异口同声地说，这里简直是花园，是工厂，是学校。

主战役打响——上海禁娼

上海禁娼的条件成熟了。

1951年11月13日，上海市公安局治安行政处处长召集全市残存的72家妓院主训话，通知他们立即停业。规定他们在停业后，要负责为妓女治好性病，帮助她们解决生活和出路问题，不得置之不理，不得采取强迫、哄骗等手段逼出妓院了

事，务须保证她们不再秘密卖淫。如有违背，必予惩处。

妓院老板听训回去后，大部分没有把这件有关妓女前途的大事告诉大家，更没有依照规定办理。等到妓女们得知这个消息，欢欣鼓舞迎接新生的时候，妓院老板却威胁她们。群玉坊有十个姐妹就在11月19日组织了小组，向妓院老板提出了五条要求：包括医治好姐妹们的病，帮助姐妹们转业，帮助解决已办起来的袜厂的原料困难等，但是遭到妓院老板的拒绝。妓院老板还造谣说：“你们听信政府的话没好处，政府要送你们到东北去敲石子开荒，你们不要认为现在解放了，国民党不久就要回来的！你们当心点，你们要回去，回去好了！”

面对这种情景，姐妹们毫不动摇，为了表示跳出火坑的决心，这十位姐妹还联络了另外四位姐妹联名写了一封信给上海市人民政府，下面是信的原文：

上海市人民政府：

政府下令禁止妓院营“业”，使我们脱离火坑，我们万分感激。解放前，我们过的是地狱中的非人生活，解放后，被压迫的人民都翻身了，但我们还是被人虐待，被人压榨，被人蹂躏，被人侮辱。我们常常想着，我们也是人呀，在这悲惨的日子里，我们每天伸长头颈等待着自己的解放。我们相信这一天一定会到来的，因为有了共产党，有了毛主席，有了人民政府，所以我们在政府宣布禁止营业以前，一方面团结起来和妓院老板斗争；一方面自己组织小组学习文化，学习织袜子，今天人民政府救了我们，我们将过上一直向往着的好日子。

今天我们诚恳地向人民政府保证：（一）决不再做私娼，

(二) 坚决学习技术,走上光荣的生产岗位。我们愿意和全国人民一样,为祖国美好的未来而努力。我们再高呼:感谢人民政府!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

十四人签名

11月22日,市公安局召集妓女180余人谈话,治安行政处处长在谈话中指出:“妓院老板不遵照通知办理,乃是犯罪行为,也是企图继续奴役妓女的表现。”他指出,“妓女是旧社会统治者和剥削者摧残妇女精神肉体,侮辱妇女人格的野蛮制度的产物。为了解放妓女,为了人民利益,应该停止其‘营业’。”他在谈话中强调妓女停“业”后,要妓院老板按规定为妓女治病并帮助转业。他还要求到会的妓女依靠自己的劳动,争取在新社会中做一个新生的妇女。妓女们听了谈话深为感动,有的激动得热泪盈眶,当场要求发言,控诉旧社会逼她们跌入火坑的经过,感谢人民政府拯救她们的再造之恩。妓女黄培芳痛哭着说:“过去是被恶霸、流氓拐骗到妓院里去的,今天人民政府解放了我们,我们一定要跳出火坑,学习改造,走向光荣的生产岗位。”到会妓女纷纷高呼“姐妹们翻身万岁!”“感谢人民政府!”

11月23日上午,上海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举行第七次全体会议,专门讨论了取缔残存妓院、解放妓女的问题。会议由协商委员会副主席潘汉年主持。到会者有全体委员、副市长盛丕华以及各有关局、处长共80余人。会议首先听取了公安局长杨帆和民政局长曹漫之关于取缔残存妓院、解放妓女的报告。杨帆局长在报告中详述了上海近百年来,在帝国主义和历届反动政府统治下造成的极其反动、黑暗、

残酷、野蛮的娼妓制度的状况。解放两年多来，经过市人民政府有计划地逐步限制妓院，随着社会风气的改变，大部分妓女已在经过教育后转业；特别是经过镇压反革命运动，市公安局根据人民群众的检举，逮捕了一批罪恶昭著的“妓院恶霸”，枪决了其中的首恶分子，已使妓院数目由解放前夕的 525 家降到 72 家，妓女（公娼）由 2000 多人降到 180 余人。杨局长还向各位委员报告了勒令残存妓院立即停闭的经过，阐述了处理妓院老板与妓女的不同方针：“对于罪恶昭著的妓院老板定予法办；对于罪恶较小的应予强制劳动改造；对于一般的妓院老板则令其转业。对于妓女应有计划有步骤的集中收容，加以教育改造，医治其疾病，然后有家可归者送其回家，有结婚对象者助其结婚，无家可归、无偶可配者则组织学习生产技能，助其转业。”曹漫之局长向会议报告了集中收容妓女的各项筹备工作，提出了妓女集中后将采取的各种具体步骤。他说：“首先，政府将负责为妓女医治性病，然后施以劳动教育，助其新生，嗣后再分别具体情况，妥善处理。”

会议讨论了两位局长的报告，并郑重作出决议，建议市人民政府采纳。决议称：“本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听取了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取缔帝国主义与国民党遗留下来的公开妓院，收容妓女办法的报告后，一致表示同意，并愿意号召各界人民代表开展宣传，予以支持，协助政府完成取缔与收容的工作。同时建议人民政府对于上海现存的暗娼，首先在公共场所以及街头活动的暗娼亦应有计划、有步骤地加以取缔。本委员会愿意动员各界人民起来协助政府完成这个工作。”

盛丕华副市长代表市人民政府当场表示接受会议作出的决议，并立即下令市公安局、市民政局执行；对不法妓院老板

集中审查,对妓女则予以收容。

23日下午,市公安局接到市府命令后,立即抓紧行动,把72家妓院内的妓女和证据确凿的暗娼,分别造册,写清姓名、年龄、籍贯、住址,交市民政局主办的上海市妇女劳动教养所。教养所的管教干部接到名册后,立刻编队编班,并把各队各班的妓女姓名一一贴在她们的床上,队长和班长各自拿到编好的名单,以便姐妹们对号入座。为了完成铲除娼妓制度这一严肃任务,还临时组织了一批里弄干部,协助行动。

11月24日,市民主妇联暨家庭妇联向报界发表谈话。谈话饱含感情,对解放两年后少数还在被迫沦为娼妓的妇女极表关怀。对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通过的取缔残存妓院的决议,表示热烈的拥护。市妇联热切希望,被迫沦为娼妓的妇女站立起来,跳出火坑,依靠自己的劳动和学习改造,做一个新生的妇女。对那些曾经逼人为娼、贩卖妇女、经营妓院的恶霸流氓,要求政府依法惩处。政府取缔妓院后,如仍有不法之徒,逼人为娼或操纵暗娼活动者,希望各界人民及里弄妇女协助政府随时检举,送请政府严惩。

11月25日下午七时,市公安局、民政局、妇联以及参加行动的里弄干部等200多人,全部集中到市公安局,准备执行市人民政府命令,封闭残存妓院。市公安局杨帆局长亲自指挥,市民政局洪副局长坐镇在通州路妇女教养所。晚上八点,行动正式开始。一辆辆汽车、大卡车,分头开往老闸区、黄浦区、嵩山区……的妓院门口。公安局的民警当即把妓院老板叫出来,押上卡车开往漕河泾第一劳动教养所,实行强制劳动;他们又让受尽蹂躏的妓女走出妓院,扶着她们跨上大汽车,在附近的公安局一一登记后,开往通州路妇女教养所。到

26日清晨，上海市残存的妓院全部被封。天色微明，行动人员到各家妓院一一清点财产，销毁多种淫秽物品，同时把妓院一一贴上封条。周围群众激情高呼：“共产党万岁！”“人民政府万岁！”

紧张的战斗进行了14个小时。上午10时，上海封存妓院这一庄严的历史使命宣告完成。全市共封闭了妓院72家，收容公娼181名、暗娼320名，总计501名。并对违背政府法令、依靠剥削妓女为生的324名“妓院老板”、“老鸨”、“龟头”集中到第一劳动教养所，一边强制劳动，一边进行审查，然后按其罪恶轻重分别作出处理。

上海各界人民热情赞扬、积极配合人民政府封闭妓院。福州路老会乐里的居民兴奋得不得了。26日天还没亮，里弄里就挤满了人。当执行封闭任务的人员把封条贴上“美星”和“天鹅”两妓院的大门时，周围群众情不自禁地拍起手来。一位姓李的大姐说：“过去半夜三更喝酒打架，吵得我们不能安眠，这下里弄可安静了。”“夜都会”妓院所在地的福裕里居民还专门写了大标语，贴在大门上：“欢迎夜都会姐妹们站起来！走向光荣的劳动生产岗位！”当嵩山区最大的妓院“红记”被贴上封条的时候，柳林路荫余里居民无不拍手称快。居民们说：“过去一说住在荫余里就摇头，今天人民政府可给我们弄堂恢复了清白面貌了。我们居民一定要把查封财产看好，决不允许坏分子轻举妄动！”老闸区“就是我”妓院的妓女回去取衣服时，沿途居民都为她们得到新生高兴。“夜都会”、“龙宫”、“就是我”……一座一座火坑，在公安局的封条下彻底摧毁了。汽车送着姐妹们到教养所去的时候，一路上行人都用喜悦的目光望着她们，好像在为她们祝福。一些经历了清朝、民国、

敌伪等好几个朝代的爷爷奶奶们老泪纵横，无限感慨地说：“世世代代，见过多少良家妇女被逼为娼，见过多少浪荡子弟在‘书寓’‘青楼’潦倒一生。但是哪朝哪代能为这些被害的女子撑腰伸冤？哪朝哪代能挽回如此伤风败俗的世道人心？只有共产党，只有社会主义才能说到做到啊！”

久住在黑暗地狱中的人们，虽然早就盼着见到太阳，可是一旦这一天真正到来，灿烂的阳光骤然照到她们苍白的脸上时，她们却被照得睁不开眼睛了。面对着全市性的大行动，这些昨天的娼妓半是疑惑，半是惊恐。她们不知道要把她们带到哪里去，更不知道等待着她们的将是怎样的命运，许多人头脑中立即闪出了一个念头：自己肮脏的历史将公诸于世，这辈子彻底完了！被收容的人群中有呜呜哭个不住的，也有闹着不肯去的，甚至有怀着敌意准备一拚的。可是，一踏进各区公安分局，她们首先看到的不是手铐，而是冒着热气的夜点心，工作同志为她们端茶送水，口口声声叫她们“姐妹”，她们的心热了。接着，当她们了解到，叫她们集中，是为了给她们医治疾病，学习生产技能时，许多人不哭了。一个叫吴彩凤的妓女干脆站在老闸分局的凳子上，爽朗地说：“姐妹们，我们解放了，我们新生了！从此我们不再被侮辱、被损害了。姐妹们，我们的身子为什么任人糟蹋呢？我们都是受过父母疼爱的，我们为什么要堕落到如此地步呢？这都是国民党反动派害我们的。今天是我们最快活、最值得纪念的一天，我们不应该哭，应该笑啊！”她边说边笑，帮助公安局的同志做姐妹们的工作，解释政府的政策。

另一个叫黄阿金的妓女也兴奋地走到前面去说：“姐妹们，我们从现在起，已经跳出火坑，我们就要去医好我们自己

没有力量医，老板不肯给我们医的疾病。过去我们是被剥削、被侮辱和蹂躏的无辜者，今天我们有了自己的政府，我们新生了。”许多姐妹带着欣慰和愉快的神情，走向妓院，收拾她们的箱笼衣物，她们对堕落悲惨的生活有着无比的憎恨，她们把标志着丑恶历史的淫秽照相、画片撕得粉碎，昂首挺胸走出了妓院。

至于被收容的暗娼，由于事先没有开过会，开始更是惊恐，经过工作人员的耐心说服，也大都明白过来了。二十岁的张秀珍，她曾念过中学，自从她的汉奸父亲逃掉以后，母女俩坐吃山空，为了几张钞票，她被迫做了暗娼，在里弄里一向抬不起头来。收容她时，她正在街头拉客，她吓得哭了，直到工作人员耐心地启发她，给她擦干了眼泪，让她回家去取衣服时，她的心才平静下来。她回到家里，打通了娘的思想，含着泪说：“娘应该为女儿高兴，从此可以脱离火坑了。”十八岁的颜元元，看上去顶多只有十四五岁，听说要她去教养所时，她想到自己的母亲早些时进了收容所，现在已学会踏缝纫机，因此顾虑不大。她听了工作人员的说明后，充满自信地说：“我一定要好好学会本领，将来靠自己的双手，赚钱养活自己。”

嵩山区宝兴里的陈碧君，读过中学，有个如意的丈夫，蒋介石发动内战，她丈夫惨死在苏北。为了糊口活命，她带着孩子流落来沪，正在无以为生的时候，一个鱼贩收留了她，娶她为妻，她把孩子寄养在别处。为了养活孩子，她受老鸨的引诱，趁丈夫出外捕鱼时做了私娼。当收容她时，陈碧君思想矛盾，万分痛苦，既希望从此可以跳出火坑，又怕丈夫知道自己的五行后刺激太深。收容人员鼓励她把一切对丈夫讲清楚，同时告诉她，婚姻法规定，前夫所生的孩子应受到保护。陈碧君

鼓起勇气，回家取随身用品时，得到丈夫的谅解和支持，高高兴兴地上了车。

就这样，五百多名姐妹，到各区公安分局集中点名，稍事休息后，分乘十辆大客车，唱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等歌曲，开往通州路妇女劳动教养所。

途中，不知哪位姐妹在谈笑中提到“妓女”两个字，一个叫郁雅芬的立即提出抗议：“谁再说‘妓女’这个丑恶的名字，我可不答应！”几十位曾经受侮辱受损害的姐妹，个个昂起胸、鼓起掌来，表示出和卖淫生涯彻底决裂的决心。

教养所的工作同志，通宵准备迎接新生的翻身姐妹。教养所大门口上端挂起大红横幅，上面写着“热烈欢迎姐妹们走向新生”。甬道两边的房舍灯光明亮，干部们站在广场迎接。虹口区 and 提篮桥区的姐妹最先到达，当汽车驶进大门，到了广场上，许多姐妹唱着歌喊着口号，秩序井然走下车来，同志们纷纷迎上前去，热情地领着本队、本班的姐妹走进宽敞的房间。姐妹们眼睛一亮，齐声喊起来，“喔哟，房子真好！”

整齐的床上，铺着雪白的被单，簇新的褥子，每张床前都有一张凳子，每间房间还有梳妆台。当姐妹们走进自己的房间里，早有工作同志准备好了洗脸水，给姐妹们一只脸盆、一只脚盆、一条毛巾、一条脚布，工作同志还端着茶水给姐妹们喝，真像亲人一般。一觉醒来，一盆盆香喷喷的青菜底红烧肉，一碗碗大米饭送到姐妹们面前，这些整日强颜欢笑的“下贱人”，何曾尝过人间的温暖！泪水，洗刷污垢的泪水，又一次不由自主地淌了下来。

饭后，午休睡觉。下午两点钟，全体开了个欢迎大会，干部和姐妹们手拉着手坐在一起。会议开始，由所长致欢迎词并

交代收容政策：人民政府是为了治好姐妹们的病，挽救她们跳出火坑，获得新生。组教股股长宣布了每天生活作息时间，在欢乐的歌声中结束了欢迎会。

1951年11月26日起，上海的妓女新生了。

第二次大收容

“的铃铃……”下班的铃声响了，袜工场的姐妹们一窝蜂奔向食堂，亚梅摇完最后一筒袜，掸掸灰，拢拢头发，又摸出一面小镜子悄悄一照，急切地向所长办公室走去。

大概是半小时以前吧，班长把亚梅叫到一边，端详了好一会，郑重地说：“李亚梅，下班后洗洗澡，穿得精神点，六点半到所长办公室开会，有要事布置。”

从刚才班长那异样的神情中，二十三岁的亚梅姑娘感到了有异常重要的使命等待着她去完成。那是件怎样的要事呢？她一边走一边寻思，所长办公室到了，可只有一个值班文书在。是嘛，班长明明白白通知六点半来，现在刚过五点，所长也要吃饭呢。亚梅暗自骂了一句：“急性鬼！”一溜烟跑了。

八年了，整整八年了，那是个寒冷的冬夜，一个撕裂人心的冬夜。

“阿爸啊，你不能死啊……”十岁的弟弟抱着阿爸的腿嚎啕大哭。

“阿爸啊，我已经没有了阿妈，不能再没有阿爸啊……”七岁的妹妹拉着阿爸的手，哀痛欲绝。

亚梅一家原是浙江象山的一户小康之家，阿爸是象山县

税务局职员，亚梅已快小学毕业了。虽说一年前阿妈因病去世，但阿爸在税务局的收入还能维持一家四口的生活。1943年东洋鬼子打到象山，阿爸不愿做汉奸，便辞职不干，与人合伙做冰鲜生意，把象山的鱼鲜冰了一船运到上海去卖。谁鬼知子把海路封锁了。亚梅阿爸一介书生，既不懂买卖，也不知怎样开路，船在海上整整抛锚两个月，淡水没有了，鱼也臭了，心里还挂念着年幼的子女，只得把船贱卖掉，搭乘航船回家。

到家一看，房子被鬼子封了。那些合伙人听说他生意蚀光，船也卖了，纷纷上门讨债。倾家荡产，封门逼债，逼得他走投无路。这个耿直的汉子一气之下吞了鸦片。幸亏乡邻百般抢救，总算慢慢地醒了过来。

弟妹还在哭泣，债主还在逼债，十五岁的亚梅咬咬牙关，“扑通”一声跪倒在阿爸跟前：

“阿爸，与其全家去死，不如我一人受罪，您把我卖了吧！”

阿爸自然不答应，亚梅一再坚持，逼得他无言以对。

终于，十五岁的亚梅以200元的身价，典给了上海一家宁波堂子，两年后又转到四马路会乐里4号的“美星”妓院。

“美星”是一家长三堂子，讲好典押四年，每年一百元。亚梅咬紧牙关，刚刚苦熬了一年，从老板娘手中接过一百元血泪钱，想给阿爸寄去，冷不防闯进一个“大阿哥”来。“你们连花捐都没有交清，分什么钱！”说着一把夺过钞票，还把亚梅身上的绸子旗袍剥了去。亚梅气出一场大病。那老板娘却骂骂咧咧：“都是你这晦气星，冲了我的财神爷。”一边骂，一边逼着亚梅带病接客。事后亚梅才知道，那个“大阿哥”原来是同老板娘串通一气特地来骗钱的。这批家伙在她身上括的钱没法计数，那老板娘一家几两重的金项链，几克拉的钻戒，哪一件不

是一次次括来的？

不久，亚梅的父亲去宁波贩鱼，船在海上触礁，连人带货，葬身鱼腹。亚梅一听捶胸大哭，“阿爸啊，女儿原想卖身救您，谁知您在劫难逃，还是丢下我们去了！”越想越觉得自己命苦，还不如死了算，一了百了！然而一转念，为了赡养两个年幼的弟妹，她还不能死。尽管她已身患梅毒、血崩等多种疾病，还得靠吸白粉强打精神，拚命接客。

在地狱里生活了八年的李亚梅，是多么希望早日见到阳光啊。1951年11月25日夜，当公安局同志请“美星”的姐妹们到老闸分局（现培光中学），集中送她们到妇女教养所时，她不哭不闹，进所后带头诉苦，很快戒了毒，治好了性病，不到一年，又学得一手织毛巾技术。

是的，她从小失去亲娘，父亲又葬身鱼腹，自己沦落为娼。是共产党挽救了她，让她过上了人过的日子，共产党就是她的再生父母！今天，听说上头有重要事情向她布置，她心头怎能不焦急呢？

六点半，会议准时开始，地点不在所长室，而改在会议室，因为到会姐妹有一百多，所长室坐不下。

“上海市人民政府已决定要取缔暗娼，几天后即将实行第二次大收容，在座的各位姐妹，即将派到第二批姐妹群中去担任新班长！”

“什么，当班长？”姐妹们听了大吃一惊，一个个张大了嘴。她们想：教养所当班长、队长的都是干部，怎能轮到我们呢？我们自己还是被收容的啊……

“还记得你们刚来时队长班长是怎样迎接你们的吧？你们的任务就是像过去的班长那样，为新来的姐妹布置房间，分配

物品，倒茶送水。最重要的是，用你们自己的亲身经历，做好思想工作，安定姐妹们的情绪。”

教养所内，作为收容第二批姐妹的骨干队伍，一百多位翻身姐妹已经集中在新的庭院里（第一批姐妹只住满一个庭院，第二批姐妹将安排在第二、第三个庭院），听报告，倒苦水，学做思想工作；同时还要打扫房间、铺床叠被。培训新班长的日程一一安排就绪。教养所外，二次大收容前的准备工作进行得更早，更紧张。

第一次大收容后，公开宿娼在上海是被禁止了，但是，各种暗中卖淫却并未绝迹。她们不是公开的娼妓，没有登记，无法控制。一到夜里，分散在昏暗的马路边、弄堂口，偷偷拉客；在咖啡馆、舞厅、游乐场，搔首弄姿，骗人钱财。她们中有的原是被政府取缔的公娼，在第一次大收容时漏网转入地下的；有的是踏上社会不久的失足女青年，她们和男阿飞厮混在一起，白天出入溜冰场，夜晚搞淫乱活动；还有的是不顾廉耻，夫妻合谋，或老鸨、龟头等互相串通，搞什么“仙人跳”、“放白鸽”，勾引诈骗，敲榨勒索，无所不为。

这些人的存在严重妨碍社会治安，危害人民身心健康。市公安局发动群众，经过两个来月时间，基本查清了这批人的行踪。1952年9月25日，上海禁娼史上的第二次大收容发动了。

新成溜冰场内，一个体态轻盈的女子拉着一名男子的手，边笑边溜冰，不一会儿，女的一个媚眼，闪身跌进男的怀里，男的会意，两人悄然离场。刚走到门口，上来两个便衣警察，一人一个带走了。这是专以溜冰搭客的地下妓女，公安局派人侦察了多次，早认准了的。这一夜，单新成溜冰场内就带走了

几十名。

深夜，汉口路西藏路口的扬子饭店（现申江饭店）里，一声查房，饭店老板拿起钥匙，开一间，抓两个，几乎百发百中，全是狎妓的，男的呆若木鸡，女的索索发抖。老板事先接到通知，要严加监视、密切配合这次行动。对待这样一件严肃的命令，他们不敢阳奉阴违，当然也不愿放弃这样的立功机会。

顺昌路×弄×号有一个二十六岁的女人黄某，单身一人住一间九平方米的亭子间。早上邻居们从不见她买菜、烧饭、做家务；到中午大家吃饭时，她才开始梳洗打扮，忙个不停；下午两点以后，她身穿长旗袍，脚踏高跟鞋，又画眉毛又擦唇膏，在黄黑的脸上涂涂抹抹，一阵难闻的低劣脂粉味令人作呕。然后拎着黑色小皮包走出弄堂。人们在背后窃窃私议：“瞧，这只玻璃杯又到大小新公司搭客人去啦！”这个女人名义上是大小新游乐场的女招待，实际上是个变相卖淫的暗娼，周围邻居都瞧着不顺眼。顺昌路派出所根据居委会的检举，几经核实，把她的名单报到公安局治安科去了。这一晚，各种游乐场所里变相卖淫的“玻璃杯”、“吧娘”、“按摩女”、“向导女”、“交际花”……全都被带上了收容车。

云南路、广西路、贵州路等“野鸡”出没的弄堂里，早已布置了便衣哨。午夜时分，哭哭啼啼的“野鸡”、老鸨，连叫“晦气”的嫖客，一串一串被带出弄堂。这次抓到嫖客，不像第一次大收容那样教育一顿便放，而是逐个与单位联系，屡教不改的还要严加处理。因为人民政府早已明文宣布严禁宿娼了。

这一夜，上海共收容私娼等 940 人。

妇女教养所的同志曾作过调查，第一次大收容的姐妹中，有 96% 是因生活所迫，被骗被逼卖到妓院的。她们中的许多

人早就盼着跳出火坑，因此收容时阻力较小。第二批收容的对象就不同了，她们中不少是自甘堕落的，一到教养所，又哭又闹，骂声不绝。这时，让第一批翻身姐妹出来向她们现身说法，比较容易收效。

因搞“仙人跳”而被收容的李某，正好分在鱼贩的妻子陈碧君班里。在这次行动中，李的丈夫被抓进漕河泾第一劳教所，李某又哭又骂：“政府阿作兴活活拆散人家夫妻哦？”陈碧君对她说：“你们搭挡搞‘仙人跳’，这哪像正正当正的夫妻？现在政府把你们收容起来，只要认真接受教育改造，争取早点回家，才算是堂堂正正的好夫妻呐！”说着，又举出自己的例子，说她自己也失过足，现在通过学习认识提高了，碰上接见日，做鱼贩的丈夫总带着儿子来看她。干部们还说她一家人团圆的日子不远了。李某听她说得句句在理，从此不哭不闹，安分起来了。

亚梅的班里数那个刚堕落不久的女学生吵得最凶，她口口声声嚷嚷：“捉到阿拉学生头上来了，”“政府捉错人了！”亚梅摸清了她的身世，诚恳地对她说：“我也是学生出身，但谁让我做出这种不光彩的事情呢？不是人民政府，而是我自己！我们还年轻，政府把我们教育好以后，上进的机会有的。我现在已经学会了织毛巾，如果你想学，以后我教你，怎样？”女学生不闹了，后来真的跟亚梅学会了织毛巾。

这次大收容所遇到的阻力，远比人们预料的严重得多。

解放已三年，这批女人之所以还敢变着法子卖淫，因为她们大多跟流氓阿飞混在一起，有自己的“后台”，有些“白相人嫂嫂”还拜过“老头子”。这时节，镇反运动虽告结束，但上海的黑社会势力并没有给“一窝端”，“九·二五”行动涉及面如此

之大，收容人数如此之多，对那批黑社会的吸血鬼来说，无异是绝了财源，他们岂肯甘心！

10月上旬的一天，正是第一批进所的姐妹们接见家属的日子。一清早，教养所的广场上整整齐齐地摆好了几排紫色的条桌，桌子两边放着一排排方凳，等待家属们到来。第二批刚被收容进所的私娼、女阿飞听说第一批姐妹有家属探望，在宿舍里大哭大闹，吵着也要与家属相见。为了保证接见顺利进行，干部们把第二批收容人员的宿舍门给关上了。这时，混在私娼中的少数老鸨和女阿飞煽动大家冲开宿舍门，吵到大队部办公室。

“她们有接见，我们为啥没有接见？”

“教养制度明确规定，进所两个月后方准家属接见。你们还没有到时间。”干部们话音未落，突然听到一阵刺耳的口哨声，夹着阵阵怪叫。这声音是从教养所的围墙外传进来的。干部们还没有明白这口哨怪叫是什么意思，旁边的女阿飞和暗娼却一面吹着同样的口哨答应，一面举起凳子、面盆架，拚命地想打开大队庭院的大门。原来当时上海有一个流氓集团，人称“九条龙”，暗娼阿飞中又有一个叫“十姐妹”的组织。“九条龙”和“十姐妹”狼狈为奸，不知害了多少良家子弟。如今，“十姐妹”全被收容进所了，“九条龙”就纠集一帮“喽罗”，和“十姐妹”里应外合，利用教养所接见之日，混在接见家属中，打算冲进教养所。

当时各大队的庭院只有两扇木门，经不住她们人多势众，以“十姐妹”为首的第二大队部分阿飞暗娼，很快冲到了广场上，因为时间尚早，家属还没有进来接见。她们劈手抢过凳子，有的从大伙房抓来火钳火棍，还有个别人举着菜刀，狠命

朝教养所大门口冲去。教养所既没有铁丝网、高围墙，也没有武装警卫，干部大多是女同志，怎挡得住阿飞们的猛冲猛打。何况她们遵守一条明确的纪律：“妓女是受摧残的阶级姐妹，只能教育，不能动手。”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第一大队的姐妹们挺身而出。她们用最快的速度跑到教养所大门口，用身体堵住大门，不让外面的流氓冲进来。她们夺菜刀，抢棍棒，两个对付一个，把闹事者一个个拖进宿舍。靠近第一大队的棉花工场里有几十名男场员，见此情景，也连忙跑出工场，保护教养所大门。闹事者们眼看大门已被拦住，纷纷向四周的围墙跑去，想越墙逃跑，一大队的翻身姐妹追到墙下，把闹得最凶的人拉进了宿舍。

两扇大门被一大队姐妹反锁住了。未冲出去的闹事者们，眼看达不到目的，就在大队走廊里殴打班长和队长，许多姐妹的头发被拉掉，衣服被撕碎，胸口被打伤，还是奋不顾身地保护干部，顶住大门。摇纱班长孙美华和毛巾班长李亚梅一起，首先冲过去用全身护住电话机，闹事人拉她们，揪她们，拳头雨点般地落在她俩身上，两人毫不畏缩，直到干部赶来接过话筒，拨通了电话。

刹时间，公安局提篮桥分局的几十名干警荷枪实弹，迅速赶到。“九条龙”和一批为首闹事的歹徒束手就擒。一些未逃出去的私娼，有的坐在地上披头散发乱叫，有的干脆躺在广场上装死。根据群众的揭发，煽动闹事的“十姐妹”和暗娼老鸨金阿四、女扒手张妹妹等 23 人被送往第一劳动教养所强制改造。一场蓄意制造的闹事被迅速粉碎了。在平息这场闹事的过程中，教养所的干部们和许多翻身姐妹，吃耳光、被打伤、衣服扯碎的不计其数。

1953年8月,上海市公安局又集中进行第三次大收容,这次收容主要对象是阿飞、地下舞女和各种变相卖淫者,共400余人。在此以后,上海暗娼的卖淫活动更加秘密、分散,政府对取缔卖淫的工作随之采取了一系列相应的对策。例如:通过调查研究,掌握卖淫活动频繁季节(如春节前后)进行突击收容;发动群众配合治安机关,随时发现,随时收容。到1958年,上海妇女教养所先后共收容各种娼妓7513名,在上海娼史立了一大功。

收容妓女的政策界限

什么叫娼妓?社会学家、犯罪学家对此下过各种各样的定义,概括起来无非是两重意思:一是以卖淫为生,把卖淫所得作为她或她家庭经济生活的主要或全部来源;二是以卖淫为业,有些妇女好逸恶劳,不愿从事正当劳动,尽管可以有其他的生活来源,但就是心甘情愿地干那种出卖灵肉的勾当;也有些妇女自量没有别的谋生之道,只好把自己的肉体当作商品去出卖。

1951年到1958年,上海妇女劳动教养所共收容了七千五百多名对象,由于收容时间集中,人数多,严格执行政策十分重要。从第一次大收容起,始终遵循着这么一条界限:被收容对象必须是以卖淫为生、以卖淫为业的妓女,而不是其他罪犯或做了错事的女人。坚持不错收,不滥收,发现有错,立即纠正。

以下几种情况不是收容对象,放在当地由群众监督,促其改邪归正。

(1) 作风不正派,一般的(注意,不是严重的)乱搞男女关系者。

梁某某一进所就嚷嚷:她是跟人“轧朋友”,不是卖淫。公安局掌握的检举材料上却明明写着:梁已订了婚,正准备结婚。但她经常同别的男人奸宿,有人检举她在卖淫,而且被公安部门当场抓住,作为私娼送进了收容所。后经核实,梁的行为是一种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不是娼妓。经向她本人进行批评教育,并对她的未婚夫做了工作,准许离所回家。

颜某某进所时嚎啕大哭,死不承认为娼。群众揭发材料上却写得很详细:某月某日,出外和某男子“兜风”;某月某日,某男子来其家很久才出……被送进教养所后,医务室对她作了检查,发现颜某某还是处女。原来颜的主要问题是一向作风不正派,借“兜风”为名骗人钱财。由于数额不大,经教育后释放回家。

(2) 和一两个固定的对象长期姘居,不属卖淫性质者。

徐某某的丈夫是小贩,经常早出晚归,有时出外贩货几天不归。徐某某趁机和两个男人姘居。经邻居揭发,并经她丈夫同意,送进了收容所。审查中发现,徐虽与第三者姘居,但并非卖淫性质,与娼妓拉客有区别,不应收容。徐的丈夫坚持说:“这样的老婆我不要了,还是让国家收了她去吧。”徐则哭哭啼啼一再认错,表示一定改过。干部反复向徐夫做工作,终于说服了他,领着妻子回了家。

(3) 受人引诱偶尔失足者。

诸暨朱某某,父母在乡务农,她趁农闲来沪帮佣,想赚些工钱贴补家用。在她东家附近住着一名暗娼,见她长得不错,用花言巧语骗她去游乐场,搭识了一个男人,同到暗娼家奸宿

了两次。第二次大收容时暗娼被抓，朱某正巧在暗娼家，被一起收容进所。到了这时，朱才悔恨不已。教养所查明实情，严肃地警告她，今后如再来上海干这种坏事，必须严办。然后将她家长找来，把她带回家去。

(4) 歌女、舞女无卖淫行为者不予收容。歌女、舞女也是受摧残的一群，她们大都为生活所逼，不得已而靠“卖笑”、“卖艺”过日子。她们不同于出卖肉体的娼妓，按照当时的政策，不是收容对象。对待没有卖淫行为的舞女和歌女，只能创造条件让她们转业。直到1954年11月，人民政府鉴于上海不少私营舞厅、音乐厅作风恶劣，败坏社会风气，决定予以取缔。对那些专跳“黑灯舞”，勾引人坐“鸳鸯座”、“燕燕座”的不正当舞女，以及没有执照、暗中从事卖淫活动的地下舞女，则坚决予以收容。

党的政策明确指出，妓女是被压迫被摧残的妇女，是我们的阶级姐妹。对妓女的收容要启发她们的自觉，争取家属的配合，达到教育改造的目的。另一方面，妓女的存在，又是危害社会治安、败坏道德风尚、影响人民身心健康的不利因素。因此，对妓女应该集中收容改造，即使本人暂时思想不通，也应坚持收容教养。对于那些没有性病，有家可归，经教育后确实洗手不干者，可以交给社会群众监督改造。

大新游乐场女招待黄某变相卖淫，经群众检举，查明确实后进了收容所。进所后，她考虑到自己一走，老母无依无靠，躺在床上失声痛哭。后来有一个中年丧偶的产业工人愿意娶她为妻，并书面保证她今后不再重操旧业。公安人员考虑到黄某尚能认识自己错误，愿意改正，身无疾病，本人同意与那位中年工人结为夫妻，决定黄某暂不收容。后据当地居委会和群众

反映，黄某婚后生活作风确实大有改变，夫妻和睦，生了个孩子，学会了勤俭持家，1958年起进厂就业。现在，黄某已经退休，在家安度晚年。

第一次大收容时，公娼许阿宝被收容教养。许的丈夫陈某寻到妇女劳动教养所，向干部沉痛忏悔：“1945年，我因患肺结核失业在家，上有老母，下有幼子，贫病交加，无法生活。万般无奈，将妻子抵押在群玉坊一家妓院，她在火坑受尽摧残折磨，我自己更是心如刀割。现在人民政府取缔妓院，挽救了我的妻子，我从心底感激万分。解放以后，我已经找到工作，生活不再像过去那样苦了。如果领导同意，我想把妻子保释出去，一家团聚，同甘共苦，老人和孩子也能得到照顾。”队长让他们会面时，夫妻俩抱头痛哭。所方根据许的平时表现和目前健康状况，同意考虑许夫提出的要求。经与当地政府联系后，即与她丈夫约定时间接其妻回家。

盐城一位老大娘王戴氏，颤巍巍地来到妇女劳动教养所，要求见见她的女儿阿秀。老大娘泣不成声地说，女儿阿秀在旧社会被恶霸兵痞强抢过去，后来又被拐卖到上海妓院，到现在已整整七年了。听说人民政府已经把女儿救了出来，她简直怀疑这是在做梦。当她见到阿秀时，激动得双膝跪地，泪水滚滚。母女俩悲喜交集，抱头痛哭。后来老大娘走到队长身边恳求：“同志！求求你让我带阿秀回家吧！”同志们向她耐心说明政府收容、改造妓女的政策，告诉她，阿秀身患梅毒，要治好病才可回家。王戴氏连声感谢。临走时说：“我回家等候消息，到时候我再来接阿秀。我一家决不忘记共产党的大恩大德。”

在上海妇女劳动教养所收容的 7513 名妓女中，大部分人

是经过耐心的宣传教育做通工作后，本着本人自愿、家属同意的原则被收容进所的。对极少数证据确凿而本人态度极为恶劣，以及危害社会治安情节较严重的对象，则实行强制收容。住在新民支路×弄×号的马某某，解放前做舞女，解放后又做私娼，每天晚上涂脂抹粉，狎带男人回家奸宿。周围群众多次检举揭发，强烈要求政府予以收容。公安人员上门时，马某某却矢口抵赖。公安人员见她很不老实，当场出示人证物证，对她实行强制收容。还有一个李某某，多次在三轮车上兜风搭客，甚至与外侨胡搞，影响极坏，也予强制收容。1954年马小彦、傅宝娣流氓团伙被揭发，情节严重的主犯依法逮捕，一批卷进去的女阿飞犯罪情节尚够不上逮捕，但因带有流氓集团性质，而全部予以强制收容。

坚持既不错收也不漏收的原则，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我们在妇女教养所1956年的工作总结中看到，当年该所错收47人，全部送回。有个名叫尹小妹的女子，因性格暴躁，常在里弄与人争吵，被人以流氓罪向公安部门检举，收容来所后，她用最恶毒的字眼漫骂不止。教养所经过审查，证实她是错收人员，随即向她赔礼道歉，好言好语送其回家，并在里弄里为她当众恢复名誉。此后，尹小妹改掉了过去的坏脾气，有一次邻里失火，她奋不顾身参加抢救，得到街道的通报表扬。

正因为对妓女的集中收容严格执行了党的政策，使这项工作得到了社会各阶层的支持和赞扬。市家庭妇女联合会主席胡绣枫和副主席胡子婴说：娼妓制度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下最野蛮最丑恶的产物，多少英明的君主，有作为的政治家都对它无可奈何，只有“忧民之忧”、“乐民之乐”的人民政府，才能如此坚决又如此顺利地把它连根铲除了。市政

协委员韩学章欣喜地称赞这一举动是“建设美丽幸福新上海的前奏曲”，鸿兴织造厂的劳资双方，为了拥护人民政府这一贤明的创举，协助改造久受欺凌的苦难姐妹，特地把该厂300台手摇织袜机捐赠给妇女教养所，供翻身姐妹参加生产劳动之用，并义务担任技术培训。

三 荡污涤垢 走向新生

“她们是一群可怜的妇人”

英国哲学家罗素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她们是一群可怜的妇人，全世界均视为败类。除了她们在卖淫的时候外，社会上不许她们和普通人往来。”

1951年11月至1958年4月，上海妇女劳动教养所共收容了这样的“可怜的妇人”7513名。

收容的时间以1952、1953、1954、1955年最为集中。公娼一般教养两年便可出所，私娼、阿飞教养的时间则要长些。

下面是按年份统计的教养所收容进所人员表：

(表一) 教养所历年收容人数统计

年 份	1951	1952	1953	1954	1955	1956	1957	1958	总人数
人 数	681	1115	964	1131	1724	875	807	216	7513
百分比	9.1	14.8	12.8	15.1	22.9	11.7	10.7	2.9	100

其中1951年收容进所的不少是公娼，1952年至1955年大多是私娼，1956年以后，有一部分是阿飞。

根据教育改造的实践，那些被骗被卖的劳动人民出身的公娼，一般通过二年左右时间，病治好了，又学到了一定的劳动技能，有了生活出路，就可以安置出所。参加工作后，一般表

现都比较好,有的成为先进工作者,有的还提升作为干部。因此公娼大多在 1953、1954 年前后陆续出所,有的还通过劳动部门介绍到工矿企业去工作了。而那些经历复杂的暗娼、高等妓女和自甘堕落的阿飞则较难改造,要她们认识到出卖肉体、出卖灵魂、不劳而获是可耻的行为,需要费更多的气力,教育改造的时间也要长一些。

据调查,旧上海有些妇女沦落为娼的原因首先是生活所迫,其次是婚姻不幸,再次是环境影响,贪图享受,自甘堕落。

1951 年 11 月第一批收容的妓女中,生活所迫的占 73.3%、婚姻不幸的占 17.5%,自甘堕落的占 3.4%,其他原因占 5.8%。

(表二)第一批收容人员为娼原因分析

为 娼 原 因		人数	百分比
生 活 所 迫 73.3%	被父母、丈夫卖给妓院的	42	8.4
	被父母、丈夫抵押给妓院的	14	2.8
	父母、丈夫死亡,生活无依靠的	66	13.2
	父母、丈夫失业,生活困难的	69	13.8
	父母或丈夫收入少,负担重,不得已为娼	64	12.7
	受后父母或丈夫或公婆虐待无法生活	49	9.8
	本人无依无靠无生活来源	16	3.2
	被骗被拐卖	47	9.4
封建包办婚姻和各种草率婚姻造成夫妻不和,以致离婚分居,生活无着		88	17.5
自甘堕落		17	3.4
其他原因		29	5.8
合 计		501	100

1953年10月9日，妇女教养所对当年新收的九百余人，加上前二年尚未出所的三百余人，共1259名对象进行为娼原因分析，情况就起了变化。

(表三)1953年所作的为娼原因分析

为 娼 原 因	人 数	百 分 比
被 迫 为 娼	540	42.9
被 骗 为 娼	221	17.5
自 甘 堕 落	457	36.3
屡 教 不 改	41	3.3
合 计	1259	100

按当时的分析，被迫为娼指的是由于生活困难、财主逼债、农业歉收或受丈夫、后母、公婆虐待无法共处等原因而离家另谋生计，沦为娼妓者。被骗为娼大多数是受人口贩子、熟人同乡中的不良分子所骗，说是来沪做工可赚大钱，终于落进虎口者。

自甘堕落多数为吸毒、爱虚荣、图享受而掉进娼门。屡教不改是指头两年收容后释放出所，不知悔改重操旧业者。从统计数字可以看到，在这次收容对象中，自甘堕落者和屡教不改者加起来所占比例达39.6%，比1951年第一次大收容时要高出十倍多。

1981年，原教养所几名干部又对早已出所安置，现居住在上海的原收容对象，抽样500人（1951年至1958年历年收容的都有），作了调查分析。

(表四)历年收容人员中抽样 500 名为娼原因分析

为 娼 原 因			人数	百分比
生 活 所 逼	父 母 原 因 24.4 %	被后父母、养父母卖、押在妓院的	28	5.6
		后父母、养父母或公婆虐待无法生存 被逼为娼	25	5
		父母失业死亡, 生活急剧下降 被逼为娼	69	13.8
	丈 夫 原 因 59.6 %	被丈夫卖、押给妓院的	7	1.4
		丈夫失业, 或病或亡, 经济极度困难	100	20
		丈夫不务正业, 赌博吸毒强迫妻子为 娼	6	1.2
		丈夫因犯贩毒、盗窃等罪, 逃跑或被捕	57	11.4
	35.2 %	丈夫虐待不堪生活逼迫出走而误入歧 途	6	1.2
封建包办婚姻, 童养媳、草率结合后被离弃等			111	22.2
家中或周围环境影响, 父母或亲戚开妓院			58	11.6
贪图享受, 吸毒腐化, 自甘堕落			33	6.6

也就是说, 上海妇女教养所收容的 7513 名妓女中, 分析她们之所以成为娼妓, 生活所迫是第一位原因, 约占六成左右; 婚姻不幸占二成多一点, 居第二位; 家中或环境影响及本人自甘堕落居第三、第四位。

统计表明, 为娼开始时的年龄以二十一岁到二十五岁为最多。

(表五)初为娼时的年龄统计(总数7513人)

年龄	15岁 以下	16~20	21~25	26~30	31~35	36~40	41~45	46~50	50岁 以上
人数	24	1551	2083	1558	994	553	419	259	72
百分比	0.3	20.7	27.9	20.8	13.2	7.3	5.5	3.4	0.9

其中为娼时未婚的占 34.8%，已婚的占 53.6%，离婚的占 11.6%。

根据统计分析，那些年龄小、未婚的，大都是妓院的公娼。她们的遭遇一般是几年后被人从妓院赎身，但由于对方多数是军、政、警、宪、资本家、流氓等，因此往往靠不住，而再次入妓院为公娼，或沦为暗娼。许多人就是这样断断续续反复为娼，有的超过十年，最长的达三十八年。当她们有生活依靠时，便想法洗手不干，一旦遇到挫折，又重操旧业。因此，有的曾先后为娼三四次，最多的达七次之多。

为娼活动基地大多集中在交通方便、人流量大、旅馆多的闹区，主要是车站，码头，游乐场所，上海市以黄浦区为最集中，占 33.8%。

(表六)娼妓活动区域统计

区域	黄浦	闸北	卢湾	南市	虹口	静安	普陀	长宁	徐汇	杨浦	郊县
人数	2538	1184	1212	851	592	551	196	123	63	36	167
百分比	33.8	15.9	16.1	11.3	7.9	7.4	2.5	1.6	0.8	0.5	2.2

控诉非人生活 洗涤心灵污垢

娼妓制度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最毒的毒瘤，妓女固然是被压迫被摧残的一群，却染上了人世间最坏的恶习。她们喜怒无常，不知羞耻，什么脏话都说得出口，什么下流事都干得出来。初收容时，由于上海解放还只两年半左右，帝国主义、反动派的残余尚未彻底清除，社会上还流传着各种各样的谣言，说什么“妓女统统要剃光头，押到边疆去开荒、敲石头。”有的甚至污蔑说，共产党收容妓女是要共产共妻。一些妓女顾虑重重，更有一些则是唯恐天下不乱。一进收容所，旧病恶习一起发作，有哭的，有骂的，甚至还有撕破衣服、脱掉裤子耍无赖的……。

显然，我们面临的是一批最难教育的对象。教育妓女从何入手？经过初步调查，一张为娼原因分析表，使人们找到了开锁的钥匙。

第一批收容的 501 名妓女中，90% 以上出身于劳动人民家庭。为娼原因主要是三条：生活所逼被骗被卖的共 367 人，占 73.3%，封建婚姻、买卖婚姻和各种草率婚姻造成夫妻不睦，以致离婚分居，生活无着，陷入火坑的 88 人，占 17.5%，自甘堕落的仅 17 人，占 3.4%（详见上节附表）。

很清楚，她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是在旧社会的摧残剥削下被迫为娼，是含着眼泪卖笑。问题是，许多人一旦为娼，便认为是命中注定，任人摆布，久而久之，从肉体到灵魂全麻木了。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观点，娼妓不属于必须予以推翻和消灭的那个阶级，但她们的生活方式和观念形态，却同

被推翻阶级密切相关，是必须予以消灭的；她们与广大工人、农民同属于被压迫、被剥削的一群，但她们的本质已全然迷失，要使她们从麻木中惊醒，从沉沦中奋起，从迷惘中复归，是一场特殊意义上的革命。而这场革命的起点，则又同当时中国大地上的革命运动一样，同农村的土地改革、工厂的民主改革一样，是从面对面地向着压在自己头上的牛鬼蛇神、魑魅魍魉开火开始的。

一场诉苦运动迅速在教养所内部展开了。

“苦？我们诉什么苦！”如同身患重病而不自知一样，一些长期在苦水中浸泡的姐妹，在初听到“诉苦”两字时也不免感到突兀和不可理解。有些人担心共产党不久长，不敢诉苦；有些人自认为身世下贱不愿诉苦；有些人早已麻木而不知苦；更有那种恬不知耻的人拿着戒指手镯，嬉皮笑脸地说：“我们穿金戴银的，有啥苦？”

上海市公安局派员来到教养所，向收容对象宣布：根据群众检举和已经查实的罪行，上海市已有114名罪大恶极的妓院主、暗娼主、老鸨被逮捕。210名罪行较重的老鸨送往漕河泾第一劳动教养所强制改造。老鸨林某，多年来一直依靠剥削娼妓为生，解放前以跑单帮为名，到乡下拐骗良家妇女来沪为娼，解放后不知悔改，仍旧暗中进行这一罪恶勾当；暗娼主常某、袁某，将未成年的少女拐骗来沪，强奸后再迫其卖淫，这三人都被逮捕了。还有残酷迫害暗娼的老鸨唐某某，正想拐带四个暗娼逃跑，被里弄居民揭发，也逮捕归案了。

人群开始骚动了，许多人传递着愤怒的眼神。突然，一个瘦弱的姐妹奔上台去，在公安人员的面前双膝下跪，声嘶力竭地问道：“那个叫阿陈的坏女人抓到没有？求求你们抓到那坏

女人吧，我要报仇！”

她叫陈翠英，浑身瘦得皮包骨头，三十来岁的人才70斤重，一天不吸毒便眼泪鼻涕，四肢无力。吸毒，当然不准，她便大吵大闹，前两天还用玻璃杯砸破了工作人员的头。今天，她一边认错，一边大声哭诉起来。

翠英是浙江定海一家佃农的女儿，父亲种田，母亲替人家洗衣服，还养不活全家，反欠了地主一笔钱。地主上门讨债，一见她长得漂亮，硬买下作丫头。十四岁那年，地主把她奸污了。地主家靠近水码头，她每天在河岸边洗衣服边流泪。有一天，船上下来一个叫阿陈的女客人，关切地问她：“小姑娘，啥事哭得这样伤心啊？”她叹口气，告诉女客人，家里欠地主债，地主逼着她做丫头来抵债。

“这不怕，跟我到上海厂里做工，一个月可以赚好几元钱，寄回家，还他就是了。”

一派花言巧语，不由小姑娘不动心。翠英真的跟阿陈到了上海，三转两转，阿陈把她带到四马路（福州路）会乐里，进去不久，拿了一张纸出来，“这是做工的保单，你按个手印吧！从今以后你就在这里做工了。”

小姑娘不识字，信以为真，按好手印兴冲冲走了进去。一个婆子拿出旗袍和高跟皮鞋叫她穿上。她忙说：“我是来做工的。”那婆子摊开“保单”，狞笑着说：“做工？嘿，你婢娘把你卖给我了。”

人们说，妓院是人间地狱，千真万确。那人贩子把翠英卖了“断账”，整个身子卖死了。进了妓院，每天要接十几个客人，她实在受不了。月经来了要求休息两天，凶恶的老鸨罚她跪在碎玻璃上，打得遍体鳞伤。后来，她怀孕了，老鸨又逼她

吞蝌蚪打胎，打完胎才几天，又被逼接客。就这样得了一身病。老鸨为了要她接更多的客人，又叫她吸白粉提神……

陈翠英的控诉在全队苦难姐妹中产生了极大的共鸣和反响。是啊，在教养所里，谁没有一本血泪账？但是在她们尚未觉醒时，只是把自己的悲惨遭遇归结为命运。她们不明白自己苦难的根源，也就不理解人民政府为她们安排的光明大道。

“同是天涯沦落人”，在小组会上，在饭前饭后，在晚上的休息时间，姐妹们纷纷诉说自己的苦难。有的说，我被卖过四次；有的说，我更多，七次；有的说，我都记不清了。一连几天，悲愤的气氛笼罩着整个教养所，这种悲愤迅速地转化为对敌人的仇恨。当她们一旦认清了自己的真正敌人，也就产生了新的追求，新的希望。

1951年12月27日，天寒地冻，北风呼啸。通州路妇女教养所的广场上竖起了两条巨幅标语：“往日有冤无处诉，今朝翻身吐苦水！”全所姐妹集中在一起，要向昔日的仇人作最后的清算。市民政局、公安局、人民法院、妇联的五百多名代表来了；接着由武装民警押着五花大绑、罪大恶极的妓院老板张菊卿、张金芳，和拐骗妇女的私娼老板何小妹、王阿四，妓院恶霸戴云卿等人进了会场。许多姐妹呼地站了起来，“打倒恶霸”的口号声震天动地。任人摧残的弱者，今天要做主人，清算恶霸的滔天罪行。

这是怎样的非人生活啊！她们从肉体到灵魂都已全然不属于自己！她们存在的唯一价值是供人蹂躏。她们的卖身所得全部落入老板的腰包，连“相好”私自赠送的财物也被搜刮一空。她们一天“接待”八个、十个嫖客是常事，最多的竟达二

十多个。十天半月就染上了花柳病，做一次“生意”就是受一次惨苦的刑罚。接客少了，皮鞭、藤条、烧红的炭、明晃晃的钢针……种种酷刑把她们折磨得死去活来。

在张菊卿妓院，妓女一天接不到客，就要罚“跪香”。大冷天，脱光衣服跪在洗衣板上，不到一炷香点完不给起来。有一次马路上涨大水，涨到膝盖深，老板硬逼着妓女穿着木屐去拉客。一个叫黄培芳的妓女突然流产了，肚痛如绞，苦苦哀求放她一天假，老板一脚把她踢进了水塘，一阵大出血后被人抬回房中，二十一岁的黄培芳就此绝了月经。妓院中还有一个姐妹叫王莉莉，她得了梅毒，下身的肉烂成一个一个小洞，遍体长满了杨梅子，张菊卿和张金芳两人说要给她治病，竟用烧红的铁条把杨梅疮烫焦，再用剪刀剪掉，擦上食盐和明矾，一道烙痕，一声惨叫，一汪鲜血，这个姐妹就这样活活地痛死了。

还有一个叫小梅的，生了肺结核，重病缠身，老板戴云卿说：“不能赚钱，没有用了。”决定把她处置掉。她还没有气绝，就被装进了薄皮棺材，盖上棺材还听得见她微弱的呻吟声。灭绝人性的戴云卿，竟叫人把长长的棺材钉，对着她胸部所在的位置，狠狠地敲下去……

字字血，声声泪。姐妹们一个接着一个上台控诉。有的披头散发，有的一言未出就泣不成声。在何小妹家里做私娼的许锦云，还没开口，喉头就哽住了，眼泪不断地流下来。停了好一会，她才一字一句地说：“不接客没有饭吃，接客接多了，弄得浑身是病。有一次生横痃，腿上烂出两个大洞，还逼我到马路上去拉客人。狠毒的何小妹竟说：‘不要紧，把病过（传染）给客人，你就会好的。’后来这个狼心狗肺的何小妹看我病

得实在不行了，竟用烧红的火钳来烫我……”说到这里，许锦云捶胸顿脚，要求政府为她报仇。另一个叫何金定的姐妹，脸色惨白，由两名工作人员扶着上台，她被过份糟蹋已失去了人形，是姐妹中患梅毒最严重的一个，下身全部腐烂了，连大小便都失去控制，现在医生为她作了一个人工肛门。这次听说开诉苦大会，挣扎着从医院出来。她声音微弱，站立不稳，断断续续地说了两句：“我被何小妹买进又卖出，我比狗还苦……”就昏倒过去。台上台下，要求枪毙恶霸的呼喊声、抽泣声、号哭声响成一片。各界代表也先后上台发言，坚决支持翻身姐妹的正义要求。最后，人民法院依法判决五名罪犯死刑，立即执行。为非作歹，血债累累的恶霸得到了应有的下场，压在姐妹们头上的石头搬掉了！

控诉大会是教养所对妓女进行阶级教育的高潮，随着阶级教育的深入，姐妹们还进一步看清了，把她们从人变成鬼的不仅是几个妓院恶霸，更是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整个黑社会。

听听十九岁的叶小英的控诉吧。

“我家在江苏盐城乡下，九岁那年死了父亲，十二岁去当童养媳。养媳妇的日子真不是人过的呀，公公婆婆稍不如意，就拳打脚踢，浑身上下找不出一块好肉。我实在受不住了，偷偷地逃到城里一户人家去帮佣，不料有一天，东家陪来一个姓江的女人，口口声声说：‘江阿姨是我的亲戚，心肠最好，她见你可怜，愿意带你到上海去做工。你有了工资就不愁吃穿，也不怕公婆来找你了。’我信以为真，跟着姓江的来到上海白克路（即凤阳路）一幢房子里，当夜被一个妓院老板拖到扬子饭店奸污了，第二天又被送进了‘杨贵妃’妓院。那年我才十六岁

啊，哪里忍受得了嫖客的蹂躏！

“一天晚上，在与嫖客过夜时，给警察查到了。那警察见我长得瘦小，问我几岁，我说：十六岁。他一听，叫来老板，当着我的面说：‘政府规定，不满十七岁的女孩不能当妓女。’我一听可以不当妓女，心里感激，扑通一声跪了下去，哀求他救我。警察跟老板递了个眼色，笑了笑，撩起一脚把我踢开。当晚，老板挥起皮鞭把我打得奄奄一息。不久，我又染上了性病，寸步难行。共产党再晚来几天，我就要像小梅那样，装进薄皮棺材，给活活钉死了……”

是啊！反动政府似乎有过许多“规定”，什么“未成年不准当妓女”，什么“人贩子严惩不贷”，有哪一条认真执行过？初中二年级的女学生朱丽华，就是在一次外出游玩时被人贩子拐骗来的。一次她被逼在马路上拉客时，猛抬头看见了自己的亲哥哥，她刚叫出一声“哥哥”，一旁跟着的老鸨马上叫人把她拖回妓院，抡起藤条往她身上乱抽。第二天朱丽华哥哥向警察局报告，警察局不但不去侦查，反而说他看错人了。从警察局回来的路上，她哥哥竟遭到一批流氓袭击，一顿毒打。朱的父母思念爱女，无处可寻，控告无门。

血泪斑斑的控诉，擦亮了迷蒙的眼睛，振奋了麻木的灵魂。姐妹们决心彻底清除自己身上的污垢，走上新生之路。就拿陈翠英来说，她把苦水全吐出来以后，人完全变样了。她治好了病，体重增到一百多斤，又学习了文化，还掌握了摇袜、织袜等技术，被评为六好职工。1956年，教养所介绍她到区清洁管理所工作，干得很出色。后来她结了婚，生了一个儿子，晚年生活过得美满幸福。

良医良药治恶疾 共产党恩情比海深

妓院是传染病的大本营，许多人得了性病（俗称花柳病），主要就是因为宿娼而传染上的。解放前夕，根据上海市性病中心防治所的统计资料，上海登记的娼妓有性病的约占65%。上海红十字会、同济医院及嵩山区卫生所从1945年至1950年检验31861位市民，其中2880人患有性病，占9.03%。也就是说，在11位成年人中，就有一个人是患性病的。嵩山区卫生所1949年检查的3674位孕妇中，患梅毒的212人，占5.8%。妇婴保健院1949年检查的2869位孕妇中，患梅毒的191人，占6.3%。同济医院1946-1950年检查的2448个孕妇中，患梅毒的186人，占7.5%。合计三处8991个孕妇中，患梅毒的589人，占6.55%。换句话说，在16位孕妇中就有一位患梅毒的^①。这些孕妇大多是家庭妇女，她们的性病多数是通过丈夫间接传染，或是由上一代遗传所致。不难设想，她们的下一代又将蒙受它的隐患。

要消灭性病，就得从妓女身上着手。第一次娼妓大收容前夕，上海市人民政府就指定市卫生局，调集治疗性病专家和有关医生16名，进驻上海市妇女教养所，其中皮肤花柳病科8名，泌尿科4名，妇产科4名。他（她）们来自性病防治所、公济医院（即现在的第一人民医院）、广慈医院、第五人民医院和南市区妇产科医院等著名医院，不少人曾在德、日、法等国留过学，是技术高超的名医；另外还有经验丰富的护士7名，称得上是一支技术力量很高的医疗队伍。收容后的第四天（即

^① 参见1951年1月25日上海《文汇报》专稿：“性病和妓院”。

1951年11月29日)上午9时, 妇女教养所医务室大门敞开, 里面用厚实的布幔隔成几个诊室, 室内都放了生有炭火的大缸, 500多位姐妹依次排队接受检查, 进行血液和涂片的化验。

第一批检查结果如下表:

分 类	人 数	分 类			百 分 比
		早 期	晚 期	隐 匿	
梅 毒	59	6	8	45	11.5
梅毒型 淋病	245	40	26	179	47.6
淋 病	155	—	—	—	30
正 常	56	—	—	—	10.9
总 计	515	—	—	—	100

查验结果表明, 第一批检查的 515 名姐妹中, 患各种性病的有 459 人, 占 88.3%。另外, 还有不少人患有心脏病、肺结核、气管炎、胃病、眼疾、湿疹、皮癣等内、外、妇各科疾病。第一批 500 多个姐妹, 由于为娼时间长, 多数是公娼, 受迫害极深, 性病比例也最高。以后, 教养所又陆续对新收容的姐妹进行过四批集中大检查, 性病比例逐渐下降。后四批检查结果如下表:

分 批	检 查 人 数	患性病人数	百 分 比
第 二 批	911 人	611 人	67.1
第 三 批	554 人	266 人	48
第 四 批	822 人	287 人	35
第 五 批	848 人	165 人	19.5

经过全面检查，发现姐妹们身上的性病主要有四种。第一种是梅毒。相当一部分人患的是早期梅毒，自己还不知觉，经抽血检验呈阳性反应，注射青霉素油剂，治疗三个疗程一般就能控制传染。那些患第二期的，外生殖器（阴唇两侧）及宫颈部均已出现病变，如花菜样的溃疡，在皮肤上可见到玫瑰红皮疹，形如杨梅，俗称梅毒子，或杨梅疮，又痒又痛，这是从皮下血管渗透出来的。有病变的部位除注射针药外，还得手术治疗。第三期（晚期）梅毒口腔溃疡，鼻子穿孔，俗称“开天窗”。这时病毒已经入骨，如不赶快治疗，就会引起眼睛失明，全身瘫痪的可怕后果。还有个别梅毒病人怀有身孕，她们生下的孩子不是断臂缺腿、浑身溃烂，就是死胎，而且往往早产。有个梅毒病人，怀孕七个月就生孩子，生下的胎儿像小猫一般大小，生下就死了。即使偶尔产下个完好的，往往也是先天性梅毒患者。

第二种是淋病，也称白浊，人数相当多。患淋病者身上的白带恶臭难闻，输卵管发炎，不会生育，少数人到了晚期，如不抓紧治疗就会很快死亡。

第三种是梅毒型淋病。这是一种急性发作的疾病，患者大阴唇急速鼓胀，又硬又痛，姐妹们称为“橡皮肿”。得这种病的人步履艰难，心理特别恐惧，有个曾做过私娼的姐妹，切除的橡皮肿竟有两只面包那么大！

第四种是横痃引起的宫颈糜烂，生殖器和腹股之间都会烂出深深的洞，脓血直流，痛不堪言。

性病一定要根治，这不仅为了解除姐妹们的痛苦，更是为了铲除旧社会遗下的毒瘤。但是，治疗性病要用当时价格相当昂贵的配尼西林（青霉素）。一个早期梅毒病人，每天注

射60万单位，十天一疗程，最少要三个疗程，按当时价格，就要一百多元^①。一个二期、三期的病人，得用100万单位的配尼西林，反复十几个疗程，时间在半年甚至一年以上。所用药物价格昂贵且不说，解放不久的上海，配尼西林还全部要从海外进口，国家要化大量的外汇，而且在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下还很不容易买到。当时上海医药仓库里的配尼西林，原来是专供朝鲜战场志愿军伤病员使用的。可是，姐妹们没有配尼西林就治不好性病，为此，报告从教养所打到民政局，一直送到陈毅市长的办公桌。

“先给教养所，志愿军战士另想办法。”陈毅市长果断地作出了决定。

受尽磨难的姐妹啊，在旧社会，你们被人称作“下贱货”，只有在解放了的新中国，你们才得到了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温暖。为了你们的健康，为了你们的新生，连日理万机的陈毅市长都在为此操心。你们要珍惜啊！赶快与旧世界决裂，做一个堂堂正正的新人。治好恶疾，好日子还在后头呢！

如果说，血泪斑斑的控诉，是把姐妹们救出火坑的第一课的话，治好性病，恢复健康，就是第二课，而且是最使姐妹们感激的一课。过去，妓女初得性病，妓院主总是逼迫她们接客，待到性病入骨，下身腐烂，实在不能接客时，便把她们关起来，让她们活活烂死、饿死。原在“大都会”妓院为娼的胡月珍，患了严重的性病，不能再为妓院老板出卖肉体了，老板就把她关在一间密不通风的小阁楼里，不给吃，不给喝，最后又把她赶出门外，几天以后就死去了。姐妹们恳求老板给买口

^① 按当时币制，为一百多万元。本书全部采用1955年后的新币制，下同。

薄皮棺材，妓院老板冷笑一声，说：“譬如死条狗！”这一切，都牢牢地记在姐妹们的脑子里。如今，共产党竟要省下志愿军英雄用的针药，先给她们治病，这件事一传开，整个教养所内简直发狂了，好多人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她们有的奔走相告，有的痛哭流涕后又放声大笑，有的竟“扑通”一声给医生跪下，连连磕头。有个叫冯兰英的姐妹，十八岁时给卖绝身子，已经做了十年妓女，染上一身恶疮。当她得知人民政府要替她治病的时候，从这个房间跑到另一个房间，大声说：“十年来，我一直在假笑、苦笑、含着泪笑，今天可是开开心心地真笑了。”吕玉芳和钱梅玉，每人都带了一个未满周岁的孩子进所，钱梅玉还把一个无家可归的弟弟也带了进来。她们说：为了下一代，一定要把病治好！

在治疗性病的日子，发生了多少令人感动的故事啊！有个叫程梅芳的姐妹，父母吃白粉把家产荡尽了，她在十三岁时被卖给妓院，十五岁开始卖淫。起初因年轻貌美，接客较多，老板把她当摇钱树；十八岁时身染梅毒，大阴唇上长了湿疣，溃瘍腐烂，痛苦异常。老鸨说：我来给你治。说着就把剪刀在火中烧得通红，然后蘸上盐水叫人按住陈梅芳的手脚，活活地把湿疣给剪下来了。程梅芳顿时流血不止，昏死过去。老鸨在她伤口上擦上食盐，过几天下身结了厚厚一层痂，老鸨又逼她接客，如不肯接客就罚跪洗衣板，头顶一根柴升，柴升落下来，就毒打。如此经过十三年的摧残，她病情日益恶化。为了减轻痛楚，吸上了白粉，而且患有严重的肺病、胃病以及由淋病引起的输卵管炎症。收容的时候，她是被工作人员抬着进来的。医生采用驱梅疗法，并运用组织治疗法配合内科治疗。一年以后，终于将被旧社会折磨得不成人形的程梅芳挽救过

来。她感激得痛哭失声，说：“如果没有共产党，这条小命早就完蛋了。”

还有一个叫柯敏珍的姐妹，因身患性病多次接客，大阴唇内长了一块比拳头还大的息肉，痛得她走一步便直冒冷汗，息肉磨破发炎，还不住地流脓水。医生让她住进病房里，用手术将息肉整个切下，一称竟有三磅重！柯敏珍病愈后，逢人就说共产党好。年仅二十二岁的杨红梅，患了梅毒性关节炎，开始因为教养所医务室尚没有健全的病房设备，一度送到外面医院治疗，化去医药费一千多元。病情减轻了，但仍没有彻底治愈。半年后，教养所里建造了新病房、化验间、手术室、药房等一整套完备的设施，杨红梅就在所里的新病房内治疗。经医生会诊，决定用碘剂及青霉素治疗。杨红梅刚进所时，性情暴躁，对政府的收容教养政策不满，专讲怪话。后来住进医院，别人告诉她，她所用的药是当时奇缺的贵重药物，要用外汇进口，还很难买到，她吃惊得睁大了眼睛。一年以后，她的病彻底痊愈了，她跑到所部办公室说：“人家志愿军急需用进口配尼西林，他们是流血拚命，保家卫国的英雄，这是理所当然的；现在我这样的人也用上了这样贵重的药，能不感动吗！我只有拚命干活，加紧改造，来报答人民政府的大恩大德。”当她得知棉花工场弹出来的棉花制成药棉是送到朝鲜前线时，便一再要求到最繁重的棉花工场里弹花，不久被评为劳动积极分子。

还有一些姐妹，如十八岁的范云娟、二十一岁的张翠琴、二十八岁的花素珍等，下身因患梅毒都已溃烂，而且还染上了吸毒症。她们年轻，原来都有些文化，所里让她们一面在病房治病，一面给她们进行医务常识的教育。病好以后，医务人

员培养她们学会注射、配药以及治疗一般性疾病的知识，她们很聪明，专心学，有些人以后终于成了医务工作者。

政府为大家治病的消息，使许多原来情绪对立的姐妹改变了态度。三大队八分队二班八个姐妹，原来哭闹着要出去，有的索性不洗脸，不吃饭，通过治病，情绪大变，纷纷说：“我们错怪政府了，人民政府是天下最好的政府。”

“杨贵妃”妓院的华爱英，是个卖绝的妓女。她刚入所时，整天沉着脸不说话，过两天，就开始捣蛋，说怪话，骂干部，摔碗筷，工作人员和她谈话，她闭着眼睛，捂着耳朵，不理不睬。医生为大家抽血化验时，她就在所里散布反动谣言，说什么：“现在朝鲜战场打仗，共产党抽我们的血给当兵的用！”可是，医务人员告诉她，她的血液里已查出梅毒晚期的征象，所里决定给她治疗，让她写信告知家里的亲人。她大吃一惊，再也不说怪话了。

小组会上，她哭着诉说自己的身世：爱英是江都人，从小死了娘，靠父亲做小贩维持她和弟弟的生活。开始尚能勉强度日，后来物价飞涨，日子一天难似一天。到十七岁那年，跟一个五十开外的同乡来上海谋生。华爱英在上海举目无亲，只好跟同乡一起住在一家老虎灶的楼上。第二天晚上，同乡带她到大世界白相，吃夜点心，替她买衣服。天真单纯的爱英以为自己遇到了一个大好人。第三天晚上，同乡带她到大世界看戏，看着看着，就开始在她身上动手动脚，爱英开始还不好意思说破，后来看看实在不像话，气忿地跑出戏场。同乡紧追不舍，一本正经对她说：“你啊！真是乡下人，不开通！要在上海做生意赚钞票，就要向人家上海姑娘学学。”说着用手指着大世界周围拉客的“野鸡”：“依看看人家，男男女女在一

起，多亲热，多大方，多出风头！”爱英似信非信。当天晚上，他们仍住在老虎灶楼上，睡到半夜，这个同乡就串通老虎灶的人把爱英轮奸了。这个同乡，原来是个“白蚂蚁”。从这天开始，老虎灶里每天要来几个男人和爱英奸宿，可怜的爱英就这样成了这只“白蚂蚁”占有的暗娼，每天卖淫所得全被他和老虎灶的家伙拿去吃喝玩乐。

过了两年，“白蚂蚁”把爱英玩腻了，又把她卖给“杨贵妃”妓院，变成一名卖绝了的妓女，从此完全失去了自由，任妓院老板摧残、压榨，还染上了一身性病。

“我一直以为世界上的人没有一个好的，都跟那个‘白蚂蚁’一样，是些伪装的骗子，”爱英声泪俱下地哭诉着，“我进教养所时，尽管工作人员和颜悦色，苦口婆心地跟我讲好好改造重新做人的道理，我不但听不进去，反而听信谣言，加油加酱地传播。现在才晓得人民政府是真心为我们好啊！队长，从今以后请你们看我的表现吧。”她积极配合治疗，病好以后，带头劳动干重活，不久以后，她的父亲和弟弟来到上海，把她接回乡下家里去了。

还有这样一个“电影明星”，十五岁时就在香港拍《少奶奶的扇子》，还演过《空谷兰》等片。出名之后受到流氓的威胁，在港不能容身，十九岁只身来到上海，和一个小开结了婚。然而，资产阶级的“金屋”并非安身之地，浪荡丈夫的薄幸使她对生活压根儿丧失了信心。她离家而去，自甘堕落。就是她，一进教养所，见人就骂。她有病，医生让她抽血检查，她说针把她的膀子戳伤了，不能动了，一天到晚曲着臂。有个姐妹发现她洗澡时手臂却能伸展自如，戳穿了她的西洋镜，原来这个吃了饭连碗都不愿洗的人是怕劳动。没几天，通知单来了，不是叫

她做苦力，而是让她住医院——确诊她得了子宫癌，要送到外面医院去开刀。

两个月后，病治好了。她又喜又愁，问医生：“我这得花多少钱？”

“790 元，”医生递过一叠账单。

“啊？！”

“你不用担心，政府全给你报销了。”

“什么？790 元，人民政府全给包了？这么说，所长、队长平常说的‘人民政府是要救你们出火坑’，这话不是骗人的？我就是被救活的一个啊。”这个不知被人骗过多少回的女人，终于相信人间真有温暖，真有好人了。她会写一手清秀的字，病好以后，教养所用其所长，安排她在医务室写病历卡。她总是现身说法，细声细气地劝姐妹们忍住痛，治好病，报答政府。1958 年，她带头响应号召，支援甘肃建设，成了一名正式的医务人员。

妇女教养所的医务工作重点是治疗性病，也兼治其他疾病。姐妹们进所时几乎百分之百患有各种妇科病，如宫颈糜烂、子宫肥大、滴虫等等，严重的要住病房动手术开刀，切除子宫肌瘤、卵巢囊肿。由于性关系混杂，患大阴唇淋巴阻塞后遗症、腹股沟慢性淋巴结肿大症的也为数甚多。出所时教养所都一一为她们治愈，同时，教养所还为几百名姐妹戒了毒。医务人员对吸海洛英或鸦片者，瘾轻的强制一星期或数星期不吸，任其自然习惯而痊愈，瘾重者采取递减法和注射东莨菪碱催眠法，所以没有一位姐妹因进所后没有毒吸而导致死亡；相反，在她们出所的时候都养得脸色红润，身体健康，得以精神饱满地走上劳动岗位。

为了让翻身姐妹的致命宿疾——性病能得到彻底根除，党和人民政府尽最大努力，配备了第一流的医疗队伍，提供了十分名贵的药物，把她们一个个从死亡线上救出来。桩桩件件感人的事迹，真令人没齿难忘。无怪她们要发自内心地高呼：“良医良药治恶疾，共产党的恩情比海深！”

妇女教养所生活种种

没有铁丝网，没有高围墙，没有武装警卫，几十名干部管教着几千名跳出火坑的姐妹，她们在里面过的到底是怎样的生活呢？

1952年8月22日的上海《新闻日报》上，刊登了一篇文章为《翻身姐妹的新生活》的通讯，记录了她们的真实生活：

她们每两个星期可以会见亲友一次，每人都可以和亲友通信，都可以按照规定时间进行文娱活动，每个月还放映电影，或演出戏剧，以调剂她们的文化生活。对个别有乳婴在外，须亲自喂奶的姐妹，还协助她们把孩子带进所来。这样进所的孩子有17个，加上有些姐妹进所以后生下的婴儿，现在共有49名。对于她们私人的财物，不在身边的，或存放在妓院或朋友处的，完全负责保护。

501位姐妹在进所时的文化程度是：高中1名，初中13名，小学212名，文盲275名。经过半年学习，基本上消灭了文盲，原来的文盲，最少能认字33个，最多的能认识1408个字，一般都能认到500个左右。继文化上的翻身接踵而来的，就是迫切要求学习生产技能。所方接受了她们的要求，成立织袜工场一所，实行每天半日学习、半日生产制。

6月25日起，所里还展开了评进步活动。在自觉自愿的基础上，姐妹们交代了自己的历史，人人如释重负。

让我们来具体地看一看，教养所采取的生活方式，是怎样温暖了一颗又一颗冰冷的心吧。

会见亲人

1952年1月的一个晚上，第一批姐妹进所刚满两个月，教养所召集全体会议，宣布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

“从现在起，教养所建立亲属接见制度，姐妹们每隔两周可以接见亲属一次。明天就是接见日，接见时间从上午八时到下午五时，上海有亲属的我们都已经通知了。”

第二天一早，许多姐妹走进接见室，看到一排排抹得发亮的黑漆条桌两旁，安置着一张张凳子，桌子上放着暖瓶和茶杯，干部们正为姐妹的亲属倒水。亲人们面对面地坐在一起，这对夫妻一见面就抱头痛哭，那对母女却已破涕为笑，这里一位老泪纵横的父亲痛责自己当初不该把女儿送进地狱，那里一个调皮的妹妹却为姐姐带来了好吃的东西……

二十五岁的李淑萍一听“接见”，飞奔而来，她怎么也不相信眼前站着的竟是昔日一见到她就吐口水的亲妹妹淑玲！淑萍早年丧父，遗下姐妹三个，由一个没有职业的寡母抚养。淑萍是大姐，她十七岁就找了个对象，结了婚，满以为丈夫从此可以分担家庭困难，哪知新婚不久，丈夫急病身亡，家里又多了个年轻的寡妇。母亲年老，妹妹尚幼，这副沉重的担子压垮了淑萍的自尊心，迫使她走上了这条见不得人的道路。淑玲长大了，进了中学，同学们都嘲笑她，淑玲又气又恨，见了姐姐就像见了仇人一般，情愿辍学也不愿再要姐姐一分“臭钱”了。

两个月来，淑萍在教养所内痛哭，淑玲也在教养所外自责。姐姐走上这条路也是万不得已呀，教养所又派干部上门

做工作。现在，淑玲正拉着姐姐的手，亲亲热热地谈心呢！“学校免了我的学杂费，我的学业继续了，我相信我的前途是美好的，姐姐，你在这儿好好学文化，学技能，出去以后也一定会有个好前途！”以后，淑玲每次接见都来，还给姐姐带了不少书和笔，检查姐姐的功课。淑萍情绪稳定了，精神也好了，她郑重其事地把劳动换得的五元奖金，让妹妹带给母亲贴补家用，更把母女二人感动得不得了。

正躺在病房里治疗的魏丽芬，断断没有想到她也会有亲属接见，而且，慢慢走来的那个颤巍巍的老人竟是她根本不想见的生父。丽芬幼年丧母，父亲娶了后母后，她就再没有过过一天好日子。十三岁那年，父亲把家业赌空，后母改嫁了，狠心的父亲就把她卖给了向导社，以后又被老板转卖给虹口日本妓院，先后做了五年妓女，患了严重的性病。

现在，那个当年亲手把女儿送进火坑的父亲，亲眼见到政府是怎样全力在抢救他的女儿。当年，他把十三岁的弱女卖给向导社时，总共才得了一百元身价钱，很快又被他在赌桌上输个精光；如今，为了治他女儿的梅毒，第一个疗程连打十天青霉素油剂，就要几十元，而且还都是进口的，第二个疗程连打十天铋剂，第三个疗程再打十天砷剂，价格就更高了。而为了医治女儿那颗破碎的心，人民政府花的代价更是不能用金钱计算的！

五十多岁的老头跪下了，向女儿，也向教养所的干部赎罪。以后每次接见，他总是早早进来，尽管女儿开始不肯叫他“爸爸”，他还是絮絮地对女儿说：“过去爸爸对不起你，可现在爸爸有了工作，待你毛病一好，爸就来接你出去，爸要加倍待你好！”两年后，父女间的这条裂痕终于补复了，丽芬跟着父亲

回了家。

一次接见日，教养所来了一个无锡人。他一进门就述说：“我是某剧团的演员，叫杨某某。解放前我到处跑场子，顾不上妻儿，我的妻子就带着孩子到上海来找活干，至今已有十年了。听说我妻子犯了错误，在贵所收容教养，她叫鞠引娣，我想见见妻子，告诉她，失散的孩子已找回来了，和我同在一个剧团演戏，我们父子盼着她早日回到身边。”鞠引娣见了丈夫，就像变了个人似的，逢人就说：“人民政府的好处说不完，不但挽救了我，还教我们拆散十年的夫妻重新团圆。”开始，鞠引娣还担心她的丈夫不爱她了，以后，杨某每隔一月就从无锡来上海见她一次。当鞠引娣的性病治好，所里很快批准她跟丈夫一起回了家。

接见制度建立后，像鞠引娣这样破镜重圆的事还有很多很多。二十五岁的秦富珍十二岁父母双亡，十九岁受人拐骗，被逼为娼。解放后她洗手不干，和一个摆水果摊的小伙子叶某相爱，但婆婆不许她进门，逼得她重操旧业。所里开始亲属接见后，叶某每次都来看她，但从来不提保释她回家的事。干部了解到秦富珍的情况后，两次上门，终于做通她婆婆的工作，使秦富珍如愿以偿，堂堂正正地成了叶某的妻子。

许多姐妹沦落为娼，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享受不到家庭的温暖和亲人的爱，因此，天伦之乐，夫妻之爱，温暖的家庭生活，是治愈她们心灵创伤的最好药方。在这方面，教养所除了让亲属来所接见外，凡是上海有家或有固定往来亲属的姐妹，只要符合下列三个条件：（1）没有性病或性病已经治好；（2）教养期间情绪稳定，出去不再走老路；（3）能按时返所；一般每两周还都可以请假回去一次。

在教养所生孩子

满口脏话的林福娣要生孩子了。她先做过公娼，后来又当私娼，生过四个孩子，死的死，送人的送人，一个也没留住。这回已是第五胎了。年纪活到三十多，还要在这倒霉的教养所生孩子，这孩子能生下吗？林福娣又痛又急，满嘴乌七八糟地又乱骂起来。

人们把她抬进洁白的产房，准备好为她催产接生。这个生过四个孩子的女人，还不知道催产接生是怎么回事。是啊，妓女生孩子是遭孽的，不揪死在马桶里就算福气了，还想接生？！

“哇”的一声，孩子顺顺当当地生下来了，是个白胖儿子！林福娣不顾产后虚弱，一把抱过儿子，就像变了另一个人。脏话不说了，丑脾气也不发了，一边喂奶，一边细声细气地唱儿歌……

妇女教养所成立七年多时间，先后在所内接生的有近百个孩子。所里有规定，怀孕的姐妹，生活上予以照顾，分娩后，有一个半月的休假期，哺乳期另外增加营养津贴，对缺少母乳的，就给人工喂奶。有的姐妹入所前生了孩子，所外又没有亲属领养的，可以跟随母亲一起到所里生活。学龄前的孩子，分别进所里办的哺乳室、托儿所和幼儿园，学龄期的孩子送儿童福利院接受教育，孩子们的一切费用，都由政府负担。

1954年5月，教养所医务室对所内113名孩子和孩子的母亲做了一次全身检查，结果发现有9名婴儿因母乳不足，体质羸弱；有10名婴儿，因母亲患有肺结核等疾病不宜喂奶。当时所内尚有孕妇数人，预计类似情况今后还会发生。为此，5

月22日,妇女教养所特向上级打报告,要求提高母婴营养标准。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上海市分会经研究后,于6月16日明文批复:

一、有奶的收容人员带有24个月以内之婴儿者,其婴儿之给养费每天0.7工资分^①,发给其生母。

二、25个月以上之幼儿,其给养标准仍为0.7工资分,可以由各单位统一调剂使用。

三、24个月以内之婴儿,其生母确实无奶或不宜哺乳者,每天可增发0.5工资分,借以解决吃奶问题;如婴儿过分瘦弱,每天1.2工资分还不够用,可再酌情增补,由教养所自行掌握。

所有这一切做法,使许多做母亲的姐妹感动得热泪盈眶。三大队八分队的梁玲,入所后生了一个孩子,每月从救济分会领到三磅奶粉不算,所里还发给她营养补助费。她无限深情地说:“过去的娼妓哪能有孩子?记得我有一次怀孕了,听人说,麝香能打胎,就用血汗钱买来一点麝香,偷偷地在自己下身、肚脐眼乱塞,结果全身大出血,差一点死去。还有些姐妹,为了防止怀孕,一早起来就吃两块明矾,还有的吞活蝌蚪。为了不生孩子,什么样的苦头没吃过!真没想到,现在人民政府这样照顾我们这些没有权利生孩子的女人,这样照顾我们这些下等人的子女,这个大恩大德何时报得了?”

学 文 化

秋妹因为父母有病借了地主二十元银洋,地主要把她家

^① 工资分的价值按当时物价变动情况而定,一般说,一个工资分约值5角左右。

仅有的二亩地抵债，秋妹为了还债，跟人来上海做工，在一张合同书上按了指印，谁知这合同书竟是一张卖身契！

秋妹为了多得几个小账，忍受着嫖客的各种侮辱。她把小账钱私自聚起来，想寄给乡下父母还债，她不会写信，也不会写汇票，只好央人代写。钱是寄出去了，回信也收到了，说是这些钱不够，利钱又涨了，还要再寄。一次、二次、三次，她瞒着老鸨，代有事空付“夜厢”^①的姐妹接客，把钱寄回家去。

可是到后来，她寄去的钱全被这个代写代读书信的人私吞了。她收到的回信没有一封是真的，连她母亲死了她还不知道。直到进了教养所，学了文化，秋妹自己能写信了，这才真相大白。她已吃了半辈子的苦了。

这是根据教养所一个姐妹的真实经历，编写的说唱剧“睁眼睛”的故事。是啊，姐妹们吃了多少“睁眼睛”没文化的苦头啊！

结合阶级教育，教养所开始了文化学习。根据进所姐妹的文化程度，80%以上是文盲或半文盲，具有高小程度的仅仅占5.5%，初中程度的3%，全所7513名姐妹中，只有一人念过大学。教养所文化学习的重点是扫盲，所内设一、二、三、四四个年级，有五六年级程度的组织自学，初中和初中以上的动员担任扫盲教师。

教养所扫盲采用的是50年代初期普遍采用的速成识字法。要求三个月读完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识字课本一册。姐妹们吃尽了睁眼睛的苦，她们学文化的积极性特别高。

开学第一天，天刚蒙蒙亮，许多姐妹就起床了。“阿翠，你

① 按上海有些妓院规定，那些做拆账的妓女，临时有事，不能接客，要倒付给妓院主“夜厢钱”（每夜3—10元不等）。

吃过鸡蛋吗？上学吃鸡蛋记性好。”“阿五姐，昨晚洗过澡吗？当心文曲星罚你……”人们互相开着玩笑。突然有人尖着嗓子高叫：“大家拜孔夫子呀，我们是孔子门生啦！”

上课铃响了，扫盲老师抱着一捆又一捆新书走进教室。书啊书！姐妹们抬头看看“学好文化作新人，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对联，低头抚摸着、翻看着还散发着油墨清香的新书，从心底笑了。

这些二三十岁大字不识的女人，要在短短三个月中摘掉文盲帽子，困难是很大很大的，而且一开始学的又是歪歪扭扭的拼音字母，见都没有见过。可在小先生的启发下，姐妹们自有她们的诀窍：“唱战歌”（用唱歌背拼音字母），“炸碉堡”（认一个一个生字），“冲险滩”（读一句一句话说），“占高地”（背一段一段书），然后争优胜，戴红花。有个人竞赛，也有集体竞赛，还开展班与班的互相通信活动。哪个班级发信多，内容丰富，就可以集体得奖，奖励一本新书，或是钢笔、日记本。在结业时，每一个姐妹都要向家里（没有家的向姐妹、或队长都可以）写一封五百字以上的信。

第一届学员结业了，全所敲锣打鼓，送喜报，发信向家属报喜。就这样，一届一届的学员摘掉了文盲帽子。教养所文化学习热气腾腾，睁眼睛都开眼了。

库 楼

1952年冬天，教养所来了一个叫何华的妓女，她学习、劳动各方面表现都还不错，就是到了夜里，总是一个人躲在帐子里，唉声叹气的，人也一天天消瘦下去。

何华到底有什么心事呢？

原来，何华本是一个摆过多次花酒的“红倌人”，积了不少金银首饰。那天，她提前得到政府要收容她的消息，匆匆忙忙把东西包好送到要好姐妹家里。既没有同那姐妹说清里面是什么，也不敢透露自己将去哪里。现在，小姐妹知道她原来是去教养的，那东西还会还给她吗？

正在这时，教养所组织新来的姐妹去参观库楼。那是四个大房间，里面整整齐齐放着姐妹们随身带来的财物：提包、皮箱、梳妆台、席梦思……全都编上号，写上名字，登记在册。

干部们一面带她们参观，一面和颜悦色地讲解政策：“这些财物都是用你们的血泪换来的，个人财产受到法律保护，现在教养所替你们保管，将来你们出去时全部可以带走。姐妹们还有什么需要保管的，或需要为你们追回的合法财产，尽管说。”

何华心动了，我那一包东西……可转念一想，那包东西不比几件衣物，现在才说出来，会不会说我像地主那样转移浮财呢？

何华思想斗争了三天，终于向队长报告了，队长根据她提供的地址和她一封亲笔信，找到那个小姐妹家里，取回了那包东西，当着何华的面，外三层里三层一层一层拆开包布：各式各样的戒指穿成一大串，足有裤腰带那么长，还有项链、镏头、金锁片，银洋钏。队长当即带何华来到所长室（较大笔财物都要经过正副所长），叫来会计、保管出具收据，一式三份，队长一份，库楼保管一份，本人一份，因为这些东西比较贵重，还专门放进了库楼的保险箱。何华放下了一桩大心事。后来，她去安徽参加建设时，这些金银首饰除了一部分她自愿卖给国家，换成人民币外，其余的全部原件带了出去。

七八年来，妇女教养所的四间大库楼，不仅保管了姐妹们大大小小各种财物，而且保障了她们的合法权利，捍卫了她们的尊严。过去，绝大部分姐妹根本没有自己的任何私有财产，稍有相好赠与的一点小东西，也往往被老鸨或抢或“借”霸占了去。现在，她们正是从人民政府对她们那一丁点小东西都悉心保管的举动中，看到了自己作为人的尊严——她们也有属于自己的财产！那少数有私蓄的“高等妓女”则往往从库楼开始，认识到人民政府的真诚。

除了建立库楼制度以外，教养所还从维护姐妹们的人身权利出发，为她们解决各种实际问题。有的在外面欠有债务的，债主见她们进所教养，还债无期，就去非法霸占她们的住房、财物，教养所便和司法机关联系，为她们妥善处置。有的外面有钱物寄来，只要查明是正当的，就收下代她们保管起来。有个叫张素珍的姐妹，进所前经法院判决自愿与丈夫离婚，其夫支付她生活费每月八元，由法院在工资中扣发邮寄给张素珍。张进教养所后，法院月月照寄不误，直到张素珍安置回乡，教养所又郑重其事致函法院，告知张的家乡地址。八元钱虽小，人民政府如此关心一个苦难女子的情谊，却使全所姐妹感动不已。

过 节

每逢佳节倍思亲。一到节日，是姐妹们思想最不稳定的时候，她们有的思念亲人：父母、丈夫，特别是孩子；有的还怀念过去灯红酒绿的糜烂生活，口里会不知不觉地哼起色情小调，双脚会情不自禁地上下抖动。怎样使姐妹们过上一个健康而又热闹的节日呢？干部们为此绞尽了脑汁。

一年一度的春节快到了，从腊月廿六，到正月初五，教养所要给姐妹放十天假。可教养所的干部，从所长开始，全得住在大院里，和姐妹们一起欢度春节。年前五天，车间主任就领着姐妹，拆揩机器，盘点产品，封门停产。宿舍、会堂、操场、托儿所、医务室，全部打扫得一尘不染。姐妹们从库楼里一一打开自己的箱子，取出锦缎被面和准备穿戴的漂亮衣服；经济条件较差没有私物的姐妹，也把公家发的被服浆洗得干干净净。院子四壁贴上了年画，走廊挂上了猜灯谜的走马灯，门上贴上自己制作的新春联，像“祖国繁荣昌盛，新人前途光明”、“党是救我大恩人，立志改造成新人”等等，全是表达自己的决心和愿望的。礼堂正中拉起紫红色的帷幕，台前放上了一盆盆鲜花。托儿所的孩子比大人还阔气，床上一色换上了救济分会特发的羊毛毯，每人都有两件新罩衣。经济无来源的姐妹的孩子还发给新棉衣、新鞋帽。

大厨房最为忙碌了。节前十几天，伙食委员会就召集各队生活委员开会，讨论菜谱和点心。他们要准备一个星期的好菜肴，每天的菜单都要事先列好，这菜单要按各民族的习惯设计，还要分病号菜、儿童营养菜、点心等等，大厨房还专门派担任炊事员的姐妹去大饭店学习烹饪技术。

节前一次家属接见总是放宽时间和人数。原来每人接见半小时，家属只能来一人；现在增加到一小时，有孩子的还可带孩子前来。允准请假外出的姐妹，节前增加假期一天，有特殊情况的姐妹，如家有孩子老人的，经分队长同意后，还可在家留宿一夜。

大年夜家家都吃年夜饭，教养所这个大家庭的年夜饭吃得可长可欢呢。太阳还没下山，姐妹们就进入饭厅，餐桌上放

着冷盆、热菜、点心，还有酒，这顿年夜饭起码得吃到午夜两点。这些女人真那么会吃，那么爱吃？不，她们最感兴趣的不是吃，而是唱。姐妹中能弹善唱的多了，稍稍练一练，马上就能演出。越剧《楼台会》、沪剧《卖红菱》、甬剧《庵堂认母》、淮剧《打金枝》、京剧《贵妃醉酒》，一出又一出的传统折子戏，还有快板、相声、双簧、独唱、乐器伴唱……谁不想乐一下，谁不想露两手？即使唱到午夜两点，好多人还觉得不过瘾呢。

大年初一，一清早锣鼓喧天，大厨房的姐妹扛着各式点心送到宿舍，拜年队敲着锣鼓，戴着大头娃娃，领着载歌载舞的孩子，向干部和姐妹拜年来了。从初一上午到初五夜间，所内各活动室全部开放。图书室里放满了新的画报、连环图画和小说书。文娱室里，钢琴、提琴、胡琴、洋琴、笙箫鼓笛吸引了一大群人。大操场上，近千人随着喇叭乐曲跳起了集体舞，笑声伴着乐曲声飞出墙外，引得好多居民趴在围墙上看热闹。

傍晚时分，各院门前的走马灯转动起来了。一条条灯谜，忽闪忽闪的，谁猜到一条就有一件奖品，常常是两三个人同时猜中，为了抢时间，不是碰头就是跌跤，引得人们哄堂大笑。

晚上七点半，大礼堂开戏了，从初一到初三，连演三夜大戏，全本《龙凤呈祥》，全套戏装道具，可最受欢迎的还是姐妹们自编、自导、自演，反映她们自身生活的现代戏。这晚，台上正在演出她们自己创作的大型话剧《姐妹泪》，礼堂里没有笙鼓声，没有笑声，听到的只有一片唏嘘，演到老鸨虐待姐妹这一场时，有人竟大声叫骂着冲上台去要打那老鸨。墙外的居民以为教养所出什么事了，好奇地跑到门房来问。直到戏演到解放了，姐妹们站在队伍里和全市妇女大姐一起游行，礼

堂里爆发出“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时，居民们才知道教养所在演戏呢。

自尊 自新 自立

人格尊严，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最重要的标志之一，血淋淋的娼妓制度，却把这群可怜的妇女的人格尊严，从肉体到灵魂全都撕得一干二净。她们不懂得尊重别人，也不知道尊重自己，对于讽刺、嘲笑、奚落、挖苦，她们全然不羞，一概报之以轻浮的笑；人家骂她、打她、大声赶她，她偏要拉拉扯扯，打情骂俏，送上门来。在人们眼里，这是一群最不知羞耻的人，是一群最不能称之为人的。

恢复和培养人的尊严，是挽救教育这些几乎完全丧失了人格的姐妹们的最难的一件事，也是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最重要的一件事。

从劳动教育入手

要恢复一个人的人格尊严，就得弄清楚他的人格尊严是从哪里开始失去的。

这群曾经作过娼妓的妇女，她们的失足点在哪里呢？

教养所建立接见制度后不久，两个男人同时来探望一个叫刘兰云的队员。一个说是刘的对象，另一个也说是刘的对象。说着说着，两人似乎都轧出了苗头，你一句我一句地争吵起来，被工作人员发觉后，拉了出去，那刘兰云气急败坏地大喊：“慢点走，把带给我吃的东西留下！”

刘兰云本是个农家女子，从小家境贫寒，却厌恶劳动，一

心企望有朝一日能像某些城里女子那样，吃油穿绸，东逛西游。抗战爆发后，她和同村一个二流子结伙来到上海作“仙人跳”。那“仙人跳”是最不顾廉耻的勾当，几年下来，养成了刘兰云又馋又贪的性格。解放后，这对假夫妻双双被收容教养。刘兰云在上海没有亲属，眼看不少姐妹的亲属前来接见时给她们带来好吃的东西，把她馋得直咽口水，今天向这个要只咸鸭蛋，明天向那个讨几粒盐金枣。但向姐妹们讨一点毕竟有限，她便挖空心思打听过去那些老嫖客的地址，发信要他们来看望她，厚颜无耻地说，日后出去了和他们如何如何，开条件要这些人送东西给她吃。

如果说，生活所迫，婚姻不幸，是多数女子被迫为娼的客观原因的话，那么，好吃懒做，爱慕虚荣，就是部分女人沦落为娼的主观原因，就是引诱千百个刘兰云由人变成鬼的一个恶魔。这些复杂的、或多或少的主客观原因交叉在一起，使她们对可耻的卖笑生涯，由害怕逃避到慢慢习惯，进而全身麻木，甚至还带有些许留恋。在妓院里，许多人连一块手帕也不用洗，而正是这种连一块手帕也不会洗的不劳而获的生活，把她们变成了除了供人淫乐以外，一无所能、一无所长、一无可取的行尸走肉。她们低贱得为了几粒盐金枣，就可以出卖自己的肉体；也只有出卖自己的肉体，才能换得几粒盐金枣。

是的，人格尊严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最重要的标志之一，而这人格尊严的背后，则是人能劳动，人会创造；劳动是人的本质，人只有在劳动中才感受到自身的力量和价值，才产生区别于动物的自我意识。而这群可怜的妇女，恰恰没有劳动的习惯，没有劳动的技能，更没有体会过劳动创造的欢乐。她们不能（开始是被迫）利用自然创造财富，就只能利用肉体换取金

钱；她们从好逸恶劳失足，我们就得从劳动教育入手，从培养她们学会劳动入手。

妇女教养所的劳动，开始时和其他劳教单位一样，是强制性劳动。除了身体有病者以外，每天八小时，干的大多是些机械性的活：抬石子，修操场，翻地，挑泥，捅阴沟……但是，这样做的效果并不好。这些人过惯了不劳而获的生活，养成了严重的游荡懒惰习气，别说八小时，让她每天坐下来干上四小时轻活，就喊吃不消了。有的喊腰酸背痛，有的消极怠工，有的一上厕所就是一小时，有的干脆装病睡大觉。干部们去动员她，她就撒泼似地叫嚷：“你们不是说老鸨、妓院主剥削我们吗？你们也一样，你们欺骗我们，剥削我们的劳动力！”闹得情绪十分对立。

教养所的干部，对这些妓女的思想心理作了仔细的分析。是的，她们以前过的是不劳而获的寄生虫生活。她们不是劳动者，但也不是剥削者，绝大多数人过去都有劳动的经历。然而长期的寄生生活，却使劳动对她们变得陌生和可畏了。因而对她们不能像对犯罪分子那样的强迫劳动，而应该把劳动当作洗刷她们心灵污垢的清洁剂，作为恢复她们做人尊严、指引她们走向新生的路灯。教养所明确地确立了劳动生产与教育改造相结合的方针，并提出了参加劳动的四项原则：

（一）从各人的实际情况出发，根据她们的年龄大小，身体强弱，由少到多，由轻到重，逐步增加劳动量，一般半天劳动，半天学习，提高思想认识。

（二）根据各人的爱好和身体、文化条件，尽量从事具有创造性的劳动：摇纱、织袜、织毛巾、缝纫、弹药用棉花，以及医务、保育、炊事等等。使她们学得一技之长，以便为将来安置就

业创造条件。

(三)表扬她们的点滴劳动进步,开展以“评质量、评产量、评操作”和“找窍门,找潜力”为主的“三评两找”红旗劳动竞赛,发动工场与工场之间,小组与小组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挑应战,夺红旗。

(四)逐步实行奖金制度和计件工资制。

这四条的关键,是要让她们体会到劳动的欢乐和劳动的价值。而发现了劳动的价值,也就是发现了自身的价值。可是,大家没有料到,姐妹们从这些富有创造性的你追我赶的生产劳动中得到的欢乐竟是那么多,发现的自身价值竟是那么高。棉花工场的风车原来是旧式老爷车,要两道工序,早晚两班工人操作;姐妹们大胆开展技术革新,将两道工序改为一道工序,劳动力减少一半,光这一项革新每月增加产值就达三万元;织袜工场的摇纱车原先是单架摇纱,每天每人最多摇一包到两包,现在,姐妹们一起动脑筋,单架摇纱改造成双架摇纱,每人每天可以摇三到五包。

这就是劳动给她们带来的奇迹:这些过去为了几个铜板,死皮赖脸,乞求别人去过一夜的下贱女人,今天挺起胸膛,开动脑筋,创造的价值居然会有几千几万;这一双双千人指万人骂的肮脏的手,织出的新生牌球袜和新生牌毛巾,竟会远涉重洋,畅销国际市场,为人民创汇,为国家争光!1951年11月,第一批500多名姐妹刚进所的时候,什么也不会干,连马桶都是教养所调难民收容所服务员代倒的。两年以后,大部分人都有一技之长,有了各自的专业称号:摇袜工、缝纫工、保育员、护士、扫盲教员……

事实教育了大家,更重要的是教育了她们自己。她们在

劳动中实现了自我确认：她们的生命一点也不比别人低贱，她们的智慧和能力一点也不比别人低下，她们同样能用自己的双手改造客观世界，从而也就改变了自己的主观世界。

第一次挣到干净的钱

1953年4月1日，是妇女教养所第一次发奖金的日子。

“姐妹们，今天提早停车，发奖金了！”从车间的一只只高音喇叭里，传出了激动人心的消息。人们有的面面相觑，有的相对而笑，有的窃窃私语，有的大声欢笑，还有人在抹眼泪。手摇机一部接一部地停了下来，热闹的车间显得安静起来。右边靠窗的一部摇袜机却还在不断地转动，机器的撞击声越来越响。班长高声喊道：“宣秀妹，停车了，不要摇了！”她好像没有听见，仍然挥动着手臂，而且越摇越快。

“我是劳动人民啦，我要劳动！我要劳动！劳动光荣！”突然，宣秀妹高叫起来。

“劳动光荣啊！”姐妹们发自内心地同声喊叫：“哒哒……”机声撞击，此起彼落，一部又一部，全车间的手摇机又转动了。

“一号机！二号机！三号机……”伴着机声哒哒，一份又一份的奖金发了下来。奖金分五元、三元、一元三等，虽然绝大多数人都有，虽然最多也只有五元钱，可姐妹们一个个都是那么激动。

“十一号机”的老姐妹王秀英用颤抖的手捧过五元奖金，像不认识似地呆呆地凝视着。“秀英，多看什么呀，快走吧，后面的人等着呢！”她像没有听见，还是木然站着，后面的姐妹轻轻捅她一记，“你怎么啦？呆啦？”

“呜……”她哭了，把奖金紧紧贴在心口上，跑到分队长面

前深深一鞠躬：“分队长，我七岁被卖掉，在地狱里长大，我浑身伤痕，也浑身肮脏。过去，我袋里的钱都是臭的。多亏政府教我学会了技术，这五元钱，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拿到的干净钱。分队长，请您在我这干净的钱上签个名，作个证吧，我王秀英变成人了，是个干净的人了！”

她回到宿舍，把这分队长签了名的五元钱一层一层用纸包起来，外面再裹上一块新手帕，又郑重其事地交给分队长。要求分队长把这五元钱锁在库楼的银箱里，离所时她要把它带回家去作为最珍贵的纪念品。

各分队的姐妹们三人一堆，五人一圈，聚集在一起，那些有文化的忙着代姐妹们写信。一大队三分队的杜粉珠捧着钞票擎过头顶，连连要求代她写信的姐妹说：“请告诉我奶奶，这钱是干净钱，多写几句‘是干净钱’，请她老人家买点补品吃吃。”

杜粉珠出生在江都农村，从小依从父母之命许配给一个老实农民，可她不甘心乡下的清苦生活，在她快要结婚之前偶尔听人说，上海是个花花世界，钞票满地有得捡，只要有办法，随时可以发洋财。她心想，去赚点嫁妆来也好。于是，轧了几个小姐妹作伴，闯上海滩去了。临走前，尽管年迈的奶奶苦口劝她，可她一句也听不进，只当耳边风。稚气的杜粉珠哪里懂得，上海滩并非她想像中的天堂。当她一下火车，就尝到了举目无亲、寸步难行的滋味，只好在火车站角落里徘徊，终于被人贩子骗去，跌入火坑。几年后，杜粉珠想摆脱这种出卖肉体的非人生活，重新回乡与亲人团聚，她用血泪钱买了点礼物带回家去。然而，纸包不住火，她在上海沦落为娼的消息早就传到家乡，她的奶奶和父母听到后痛恨切齿，一见她进门，就把

那些东西劈头盖脑地朝她身上摔去，她只得流着眼泪快快返回上海，从此同家里断绝了往来。

今天，杜粉珠高擎钞票，头抬得高高的，她站起来了。钱，这劳动得来的钱洗刷了她的污垢，净化了她的灵魂，她仿佛看到奶奶嘴里嚼着用她劳动得来的钱买来的补品，全家人都开心地笑了。

“阿粉，还写什么？”

“噢，再写过几年我就可以用劳动得来的钱养家了，我要加倍待奶奶好，为父母争气……”

棉花工场将两道工序改为一道工序，奖金拿得最多，宿舍里最热闹，笑声也最高。“阿珍，明天不是你出去送货吗？带点好吃的东西。来，拿张纸来，登记一下，我们要好好快活一番，享受享受自己劳动得来的果实。”话音刚落，一群姐妹涌向阿珍，争着登记要买的东西。

“阿珍，她们买吃的，我可要买用的，给我买一条棉花胎。”老班长阿九姐开腔了。

“买棉花胎作啥，公家不是发给你了吗？”

“新姐妹陆续进所，公家要发新的，我把公家的棉花胎上缴，不是可以减轻政府的负担吗？我们要自食其力，当国家的主人啊。”

“到底是老班长，觉悟高。”于是，有的说今年的棉衣可以自己买，有的说要把棉裤上缴，更有的大声喊着：“我储蓄支援国家建设！”

在一团热烈的气氛中，调皮的阿娣做着鬼脸，走向闷坐在角落里的阿兰。阿兰就是那个对着盐金枣流口水的刘兰云。

“阿懒，你拿多少奖金？”她干脆叫她“阿懒”了。“是存银

行，还是买几粒盐金枣吃吃？”人们一阵哄笑，鄙视的眼光从四面八方投向阿兰。阿兰急了，“不要小看人，我下月的奖金不超过你阿娣是灰孙子，爬给你看！”

刘兰云本来就懒，自从那两个嫖客为她争吵之事发生以后，她好几天装病旷工。看到干部查房，她会穿着鞋子钻进被窝，呻吟不止。姐妹们上工了，她就在人家的枕边东摸西摸，看看能不能摸到几颗盐金枣含含。久而久之，姐妹们干脆不叫她阿兰，而改叫“阿懒”了。她也无所谓，任你们去叫，依然好吃懒做，装病旷工。可今天，她眼看过那些和她一样勿要面孔的人，一个个都拿到了奖金，那么神气活现，那么欢快跳跃。整个棉花工场，就她一个人，连最低的一元钱都没有拿到。她第一次感到一种低人一等的耻辱感，火烧一样地炙着她的心。她火了，她真的火了，扑腾腾地跑出门外，大吼一声，“谁说我阿兰只会吃盐金枣，我也是人，我也要面孔，不信，跟我找分队长写保证去！”

教养所从1953年4月开始发第一次奖金，到1956年8月，进一步改变成为按件计酬工资制，凡掌握了一门技能的人，根据她的劳动产量和质量，最高的可以拿到45元，最低的20元，培养工拿13—16元。新进所的姐妹们仍然采取奖金制，分一、三、五、六元四等。按劳取酬，多劳多得的制度，使得劳动好的人受到更多的尊重，使多少人从中发现了自己的价值，燃起了活泼泼的生命的火焰！二十九岁的顾秀英，解放前在一次被蹂躏后睡熟了，嫖客偷去了她用血泪换来的金戒指，大衣，花旗袍。上海解放后，又被一个嫖客骗出去住了一个多月。那人有老婆，她被人家当众赶了出来，还几次三番送上门去。现在，她学会了织毛巾，每月工资40多元，在小组会上扬

眉吐气地说：“过去人家看不起我，现在我学会做工，将来嫁起人来，也要挑挑人家合不合我的意了。”

“我是好人了”

如果说，劳动权利的实现，使姐妹们认识到自己存在的价值，那么，政治权利的实现，使她们进一步认识到，自己不光是个劳动者，而且还是个共和国的公民，是我们国家的主人。

教养所并不是与世隔绝的，除了培养姐妹们学习劳动，还积极组织她们参加社会政治活动。二十岁的金美芳，过着地狱生活已经有四年了。她说，她曾参加过1951年“三八”节大游行。那天，她看见许多姐妹排着长长的队伍，欢庆自己的节日，她也做了一面小红旗插进队伍中去。走着走着，突然发现，别人都有一个团体，一个人领头喊口号，大家跟着高呼，唯独她自己，走到哪里都会有人和颜悦色地说：“走错了吧！这不是你的队伍。”她一下子意识到，自己是硬挤进去的，她和她们不一样，她们可以昂首挺胸地走在街上，庆祝自己的节日，而她不能，像她这样的人，只配在街上拉男人。

“我们和众人不一样，在公众场合，我们总是贱人，总是骚货。”低人一等的烙印深深地烙在她们的心底。可这些自暴自弃的妇女没有想到，进了教养所，干部们不但没有把她们当作“劳改犯”，而且向她们打开了一扇又一扇过去她们根本进不去的大门。

1953年劳动节，第一批收容的姐妹进所才一年多，教养所就挑选了100名表现好的姐妹参加节日游行，以后每次劳动节、国庆节游行，都有教养所的代表，游行前两天宣布名单，叫

到名字的姐妹兴奋得彻夜不眠，不等天明，就梳洗完毕，换上一身洗净的人民装（穿上人民装就是人民了，她们是多么喜欢人民装啊）。到了人民广场，站在她们前面的是纺织女工，接着是头扎毛巾的农村妇女，她们的后面是机关干部、里弄妇女、女学生……听说参加游行的都是各界代表、劳动积极分子，她们一个个默默无言，相互传递着会心的微笑，再不用像金美芳那样东找西钻，她们也是代表、劳动积极分子，也在队伍中间呢。主席台近了，她们一个个挺起胸脯放声高唱：“我们工人有力量，嗨！每天每日工作忙……”这群昔日最无力量的弱女，今天终于看到了自己的力量，显示出自己的威风！

1954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颁布。教养所组织姐妹们学习宪法，树立主人翁思想。根据宪法规定，教养期间的妓女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都有选举权。所里召开了大会，向她们祝贺获得这神圣的一票。

选举人民代表，这一票神圣在哪里呢？很多姐妹弄不清。有的说，“拿张纸头划几个圈圈有啥了不起，又没有钞票进账。”有个过去的阿飞还嘲笑说，“只要是活人就有一票，这叫‘活票’。”

“不对！不是活人都有选票，提篮桥吃官司的犯人、社会上的管制分子、地主、富农就没有选票。”干部严肃地指出。

“那老鸨有没有选票？妓院主呢？‘蚂蝗’呢？”姐妹们最关心的是这个。

“他们大多被剥夺了政治权利，也没有。”

“啥叫政治权利？”

.....

经过热烈的讨论，姐妹们终于弄明白了，公民就是好人，

就是工人、农民那样对社会有贡献的人。而老鸨、“蚂蝗”们不是。共产党已经把她们这些翻身姐妹归入神圣的工农大众这一边了。那些原来把进教养所看作吃官司的人恍然大悟：原来我们不是犯人，是国家的主人呢。

选举的那天，几乎人人都穿上一套人民装。发选票时，姐妹们生怕自己的名字漏掉，都探着头侧着耳朵细听。一个曾经站过十多年马路的“野鸡”梁宝英说：“从前我有许多票，那是当票，为了赎那些当票，我深更半夜站马路，依屋檐，脸上不知吃过多少耳光，背上也不知落下过多少警棍。我每天提心吊胆，东逃西躲。人人看见我吐唾沫，说我是坏人，我自己也认为是坏人。今天人民政府给我好人票，我是好人了！”她一面说一面哭了起来。

老姐妹王秀英还控诉了老鸨、妓院主剥削妓女的一种手段：旧社会大流氓设了好多花会，老鸨总是怂恿我们妓女去打花会，我们不能出门去投标，老鸨就把我们的钱夺去代打，老鸨出一张票给我们写上花名作为凭证，等开标日对花名，说是对中了就可以得奖。但是这一张张票子，从来没有打着过，其实是花会主和老鸨勾结起来骗我们的血泪钱！王秀英还说：“今天选民票把我们和老鸨分清楚了，她是坏人，没有票，我是好人，有好人票。”

外国堂子妓女韩倩，是南朝鲜人，一直等在办公室门口，看到同班的姐妹们都拿到了选票，她急得涨红了脸找她的队长。她说，我虽做过日本人的军妓，但我没有和日本人一道做过坏事，我是好人，我要选票。队长告诉她，你是外国人，不能参加中国选举。她说：“我在外国也是好人，我是被日本人抢来的。”她要求把寄存在库楼里的三箱衣服和一包首饰上交给

政府，换一张“好人票”。她说：“这是我卖身得来的血泪财产，我情愿要‘好人票’，不要这些东西了。”队长耐心地向她解释：这次选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履行自己的权利，你将来也有那么一天，回国去选举自己的领导人的！这下她才笑了。

平时，教养所还经常组织各种参观活动，让姐妹们出去参观。在大世界的天桥边，在老闸捕房的大门口，她们回忆起过去遭人污辱、被人敲诈的日子，听着今天场子里欢快的笑声，教室里孩子们琅琅的读书声（老闸捕房解放后改成了培光中学），她们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在太平洋织造厂、华阳纺织厂等工厂，一些已学会纺织技术的姐妹跃跃欲试而又有些胆怯，得到了热情鼓励：“是个熟练工啊，欢迎你们出所后到我们厂工作！”是啊，社会变了，生活变了，人们对她们的看法也彻底地变了。

在所有这些活动中，给她们印象最深的是接待日本战犯的一次教育活动。

1955年春季的一天，上海市有关部门通知，有三百多名日本战犯要来妇女教养所参观，接受教育，不久后将遣送他们回国。提起日本侵略者，教养所绝大部分姐妹都有一本血泪账，许多姐妹就是被日本鬼子糟蹋后沦落为娼的。教养所宣布这一消息后，告诉姐妹们：今天他们已经放下屠刀，我们接待他们，不是为了发泄对他们的仇恨，而是为了表示自己的尊严，表现一个曾经遭受过巨大痛苦，今天终于站起来的民族的无比尊严。

上午九时，四辆大客车载着身穿黑衣黑裤、头戴黑帽的日本战犯，一个个走进事先准备好的会场，教养所所长简单地介绍了姐妹们在三座大山压榨下的痛苦生活，介绍了中国政府

改造妓女、引导她们走向新生的政策和做法，然后大声地说：“正是日本军国主义惨无人道的罪行，使多少中国姑娘受尽了人世间最惨重的折磨。今天早晨，听说你们日本战犯要来，我们的一个姑娘晕倒了，这个可怜的姑娘，一家人全部死在日本侵略者手中。那一天，仅仅是因为家里没了盐，姑娘的母亲和六个乡下人一起到镇上去买盐，哪知刚出门就遇到一群野蛮的日本侵略军，他们举着枪枝，当着乡亲们的面，在光天化日之下把姑娘的母亲轮奸了。她母亲无颜见人，跳井身亡，她的父亲和两个弟弟也被日本侵略者活活烧死，她孤身一人逃到上海，又被日本鬼子糟蹋……今天，我们胜利了，对日本侵略者犯下的滔天罪行，我们怎么清算也不过分。可是我们没有用你们惯用的手段来报复你们。现在，我们把侵略者遗下的毒瘤割除了，把被摧残得不成人形的姑娘拯救过来了，今天还要把你们——日本战犯们，送回国去，和家人团聚。我们中华民族是酷爱和平、宽宏大量的民族，是能把一切污泥浊水都荡涤干净的伟大的民族！”

所长激昂的声音，说得日本战犯脸色苍白，冷汗直冒。这声音，透过扩音器，响彻在工场、教室、俱乐部，说得姐妹们热血沸腾，正气昂然。是啊！侵略者耀武扬威、苦难姐妹任人蹂躏的日子，再也不会回来了。当战犯们走过她们身边时，她们一个个目不斜视，镇定自若，专心致志地干自己的活，就像一尊尊不容侵犯的雕像。

“国家干部称我是同志”

还有一些姐妹自惭形秽，默默无言，她们心头的疙瘩还没有解开。

“陶公馆”妓女吴月娥，被收容时已经二十六岁了。她出生在苏州吴县一个贫农家里，从小父母双亡，七岁被卖作童养媳，十三岁被人贩子拐进陶公馆，卖了绝契。她先当了五年“公馆小姐”，才十八岁就染上一身性病，便被搭客娘姨押着，到旅馆、书场、戏院门口拉客，成了下等妓女。

1951年她被收容后，政府为她治好了性病，教她学习文化和生产技术，经过四年多的努力，她从一个啥也不会的文盲，变成一个能写会算的袜整理工场检验员，袜子上的任何一点斑点都逃不过她的眼睛。可是，她依然那么胆小，那么自卑，得了表扬不敢上台领奖，每当查出有的袜子不合格，只要她听说那是正规的“先生”“姑娘”“公馆小姐”摇的，比她的“野鸡”身份高得多，她便会吓得捧着次袜浑身发抖。她常常天不亮就起床，车间门还没开，就来上班了；下班铃响三遍，还不敢离开。头疼发热，她总是撑着，甚至连上厕所，假若干部在身边，她也总是脸胀得通红地忍着，忍着……

一个巨大的阴影怎么也摆脱不开，吴月娥仿佛总是觉得身后有人跟着，押着，逼着。对这样的苦难姐妹，又怎么恢复她的人格尊严呢？

一天，工场干部叫吴月娥带上两个姐妹，把400打球袜送到上海东站去托运，她楞住了，还以为干部在与她开玩笑呢。干部郑重其事地拿出货单，一五一十向她交待，她才明白这确实是事实。她激动地问干部：“400打袜子，就我们三个收容人员，这么大的数字，你们真的信得过？”“为什么信不过？货物已经装车了，快走吧！”她咬着嘴唇点点头，带上两个姐妹跳上车子出门了。

回来时，她在门口下了车，呆立在巨幅标语牌下，眼睁睁

地盯在“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一个一个大字上。忽然她哭了，蹲在地上大哭起来。干部得知后，连拖带扶把她拉到整理间，以为她第一次接受任务，出事了，忙不迭地问她：“是不是回单掉了？”“是不是有人嘲笑你，欺侮你？”“是不是有什么不舒服？”她只是一个劲地摇头，却说不出话来。半晌她才停止哭泣，慢慢诉说。

原来她太激动了。她说：“我自七岁起就被人看管起来，十三岁以后就被打入人间地狱，再也见不得阳光。我比狗还不如，狗虽吃屎还可以到处跑进跑出，看到人还抬起头来汪汪汪叫几声；我虽吃饭，却被人捆起来，任人侮辱，不要说叫，连哭的地方也没有。十三年来，我耳朵里听到的只有‘婊子’‘贱货’。今天我居然身带价值两千多元的货物，还带两个从未出过门的姐妹大模大样地走出大门。一路上吹来的风是清香的，太阳是多么明亮、温暖！车站检验员横一个‘同志’，竖一个‘同志’地叫我们。‘同志’，是我们这号人配得上叫的吗？车站检验员是国家干部，我们竟和他们一样成了他们的同志了！”在场的人都被她的话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给她们充分的信任，让那些工作认真、思想觉悟明显提高的姐妹担负一定的责任，是帮助她们从自卑自薄走向自立自强的重要措施。1951年，第一批大收容时，全所各级负责人都由国家干部担任。一年以后，第二批900多人收容进所，就从第一批收容人员中挑选了108名表现较好的姐妹担任班长。以后，教养所又逐步实行民主生活管理制度。全所分三个大队，每个大队都设立一个民主管理委员会，除主任委员由国家干部担任外，其他学习、生产、文体、生活、清洁委员等均由姐妹们民主推选，各分队再选出若干干事。学习委员要掌握

政治文化学习的详细情况，经常了解姐妹们的思想动态，帮助文化教员（也由姐妹担任）备课。生产委员负责工场生产任务的安排和开展红旗劳动竞赛，平时做好详细的考勤记录，每月召集分队干事提出发奖金的初步名单。文体委员要保管俱乐部的一切财产，包括有几千册图书和数十种报刊的图书室，有风琴、钢琴、提琴、大鼓、小号、管乐等各种乐器和球类的文体室，还要组织演戏、舞会、赛球、广播操等各种文体活动。生活委员负责伙食管理，包括制订食堂制度、采购、拟定食谱、计算成本、出售饭菜票等。卫生委员负责根据爱国卫生的要求，安排和检查全所的环境卫生……

有人说，人生来就要承担社会责任，谁承担的社会责任越大，他就越觉得社会需要自己，也就越觉得生活有意义。这些压在社会最底层任人蹂躏的人，正是在承担种种社会责任中，突然发觉自己身上竟还有那么多别人需要的东西，还有那么多美好的有价值的东西，她们猛地觉得自己高大起来了。

学习委员胡道英，原是个成绩很好的女学生，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使她家破人亡，沦落为娼。从此，她觉得自己不是个人了。文体委员张翠琴，原是个越剧演员，自从吃白粉的外婆把她卖入娼门以后，再没有哼过一句。今天，她们怎么也没有想到，整整一个大队两百多姐妹，竟会那么相信她们，需要她们，推选她们作大家的委员。她们仿佛又成了当年朝气蓬勃的女学生，活泼可爱的女演员。生产委员沈玲秀，生活委员邵西林，清洁委员陈翠英，一个个都和胡道英、张翠琴那样。她们带动了一批干事，组织起一批积极分子，有文化的教文化，懂珠算的帮算账，会唱歌的教唱歌，会乐器的弹乐器，善于写字的抄墙报黑板报……

谁说她们自甘下贱？多少年来，她们缺少的就是尊重，最盼望的就是信任。而一旦得到了尊重和信任，那些粗鲁、猥琐的举动，虚伪做作、奉承拍马的习性，好逸恶劳、自私自利的心理，娼妓生活印在她们身上的种种痕迹，顿时就与她们显得格格不入，压抑在她们灵魂深处的最强烈的念头被唤起了——我也是人，我也要靠自己的双手，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做个堂堂正正的人！

她们的人格觉醒了。

改造女流氓

对娼妓的收容改造，远比人们预想的要复杂得多，艰巨得多。

如果说，收容教养的头两年，对象大部分是受尽摧残、被迫为娼的苦难弱女，对她们来说，只要倒尽了苦水，治好了性病，学会了劳动技能，也就走上了新生之路；那么，随着收容对象的变化，这些做法便逐步显得不够用了。

1954年，是妇女教养所建所以来最困难的一年，也是收容改造工作带有转折性的一年。

一方面，在教养所内，收容对象已由出身贫寒、为生活所迫的妓女，成批地转为自甘堕落的暗娼、无法无天的阿飞。对前者来说，首先是受害者，然后才是害人者；后者正好相反，她们主要一面是害人者，然后才是受害者。她们思想里无“苦”可诉，却有着许多抗拒改造的流氓手腕，而那批已经教育好的苦难姐妹不少已经安置出所，力量对比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另一方面，在教养所外，娼妓活动并没有完全绝迹，被称为“小飞机”的流氓阿飞死灰复燃，招摇撞骗，反有变本加厉之势，有些人里应外合，集体逃跑，出去后重操旧业，危害人民。

下面是1954年3月10日上海市公安局给上海市人民政府政治法律委员会的一份报告的摘要：

关于娼妓的收容工作，我局自1951年11月25日封闭妓院起，至1953年10月22日止，已配合民政局、人民救济分会收容了2156名。计1951年681名，1952年1115名，1953年截止10月22日558名。根据1953年国庆节前收容的62名材料分析，目前娼妓来源是：(1)本市新增25名，占40.3%，大多是些自甘堕落的无知青年，不事生产，与流氓阿飞为伍造成失足者；(2)其他小城市及农村来沪为娼24名，占38.7%，这些多是经济困难，乡间年成不好，被迫外出，以及刑事、劳改犯和反革命家属；(3)在沪老娼13名，占21%，其中有4名是经我收容后，不知悔改，重操旧业的，日前娼妓活动仍较活跃。据检查，现浮在面上的仍有300名左右，以大世界、先施、大新等游艺场为多。其中先施约60名，大新约30名，大世界最多，经常活动的约在100名以上。在黄浦、老闸、嵩山三区内的旅馆，由于管理控制不严，自1953年7月份以来，经常客满，每日营业平均十五成以上，甚至一间房间一夜卖十次之多。其中80%系不正当男女关系及娼妓在内活动。此外在延安东路(由山东路至西藏南路间)及云南路、广西路、永寿路、浙江路等路口，约有60余名，北海路由云南路至浙江路湖北路一带，晚间约有40名，西藏中路(南京路至金陵路之间)约在10名以上，大多活动在和平电影院及大世界门前。

除此之外，本市各特种营业场所内尚有舞女721名，女招待597名，以及无照舞女1000名左右，这些人绝大部分是变相卖淫的。

从妇女教养所收容的对象看，经教养所放出去后重操旧业，以及逃跑捕回的比例也明显上升。

下面是 1954 年 7~10 月教养所新收容人员的情况分析：

年 月	当月收容总数	其中潜逃抓回		其中重操旧业再次进所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 分 比
1954年7月	55	3	5.45	7	12.7
8月	189	2	1	49	25.9
9月	92	3	3.26	17	18.5
10月	39			9	23

也就是说，1954 年 7 月至 10 月，教养所收容的 375 人中有 82 人是属于放出去后重操旧业的，其比例高达 21.8%。

根据这些变化了的情况，从 1954 年第四季度开始，上海的妓女收容改造工作采取了三项新的措施：

(1) 通过公安部门摸底分析，对娼妓收容由以前的成批收容为主，改为经常性收容为主，发现一个，收容一个。由以前的启发自觉改为强制收容，凡在公开场合拉客的采取公开方式收容，以打击其气焰，限制其发展。

(2) 适当延长教养期限，对那些年轻体壮又无疾病的暗娼阿飞，适当提高劳动定额，必要时采取某些强制劳动的措施。

(3) 对安置出所者，都要和当地政府部门取得联系，并将材料转至其居住地的派出所掌握。

对这些发生了变化的收容对象，改变一定的收容改造手段是完全必要的，但是我们的最终目的，还是要把她们中的绝

大多数人改造转变成新人，只是，我们的改造转变工作变得更艰苦了。

“监 啸！”

那是 1955 年深秋的一个风雨之夜，天色漆黑一团，只听得风呼呼地吹着，雨淅淅沥沥地打着玻璃窗。将近午夜，教养所各大队的宿舍全熄灯了，只有值班队长按常规在新收容的第四大队宿舍来回巡逻。这一夜的值班队长是两个青年女干部，她俩披上雨衣，打亮了手电，刚巡逻了一遍回来，想走进值班室避一下雨。突然，从隔壁一分队宿舍里传出一声低沉而又凄厉的叫声：“呜——”，这声音拖得这样长，这样粗，似鬼哭，又似狼嚎。这一声低沉的凄叫未断，突然，又一声“嘎——”的刺耳叫声，带着沙哑，像深谷里的乌鸦叫，使人听了毛骨悚然。两个青年干部吸了一口冷气，倒退进屋，忙把门关上。这时，“呜——”“嘎——”“啊——”“呃——”，阵阵凄叫声由轻到重，由一个人到两个人、三个人……直到整个分队，长声呻吟，短声哭泣，粗声怪叫，像从很远的地方传来，又好像就从脚底下冒出。一分队，二分队，三分队，整个第四大队的新收容人员全都发出了这种怪声，顿时风雨潇潇，鬼哭神嚎。两位值班干部已吓得说不出话，住在四大队干部宿舍的同志全被吵醒起来，打开了所有的灯，可这凄厉的叫声依然持续不断。

这是什么声音？新收容的四大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在场的女干部谁也没有碰到过。她们一面关紧大门，不让声音传到别的大队，一面打电话报告所部总值班。总值班带着一队警卫跑步赶来了。一进大门，一个曾经当过监狱看守的警卫忙冲到庭院中间，猛喝一声：“监啸！”声音像打雷似的，

把整个院子炸开了，全队警卫齐声高呼：“监啸，抓为首的！”瞬时怪声全息，全场肃静。

“监啸”是旧时犯人抗拒服刑的一种手段。大凡犯人关在牢内，都有一种压抑感，只要有几个犯人互相串联，先叫数声发难，牢内犯人就会自觉不自觉地卷进这种声音，同样凄叫起来。“监啸”这种怪声既是犯人情绪的一种发泄，在那些领头发难者看来，又是威慑监狱当局，显示犯人力量的一种手段，如果不及时制止，往往又会成为犯人暴动的先声。

今天，教养所的少数顽固分子把旧时对付监狱的那一套也拿出来了。她们满以为，妇女教养所的干部一定会吓得索索发抖，教养所起码要乱上几天，她们便可以混水摸鱼，乱中脱逃。没想到教养所的警卫识破了她们的诡计，一声断喝，绝大多数人本来就是稀里糊涂跟着乱喊的，顿时自己都呆住了。待干部们拉开电灯，进入她们的宿舍时，只见有的泪痕满面，有的面如土色，有的呆呆地坐在床沿不知所措。

教养所的干部严肃地指出了问题的性质：“我们这里不是监狱，你们也不是犯人，有人用‘监啸’来示威，就把自己放在犯人的地位上了。在监狱里，为首发出监啸者也是要加刑的。大家先好好睡下，天亮以后，为首分子一定要坦白交代，检举者有功，包庇者错上加错，拒不交代者一旦查出严惩不贷！”

“是我领头的！”干部话音刚落，马上有人拍胸站了出来，头抬得高高的，得意地扫了全场一眼，俨然一副“摆大王”的神气。

又是她！

此人叫吴娣，是个二十二岁的暗娼，收容不到一年，已逃

跑了七次，其中有三次还企图煽动集体逃跑。每次一被抓住，她总是当场站出来承认：“是我领头的！”在她看来，当场承认，既可在她那班朋友面前显示她“天不怕地不怕死也不怕”的气魄，又能在共产党面前博得一个坦白认错的好态度。坦白总是从宽的，果然，她逃跑了七次，承认了七次，共产党不是一次也奈何不了她吗？

然而这一次，吴娣想错了。

吴娣是浙江长兴人，本是长兴某工厂的临时工，却不事生产，与男工乱搞男女关系，屡教不改，被工厂辞退。吴娣不仅不接受教训，反于1953年跑来上海，公开以卖淫为业。她专门在公共娱乐场所搭客，甚至公然在三轮车上、弄堂里与狎客发生肉体关系。1954年秋被公安局收容，进了妇女教养所。

吴娣进所以后，拉了一批暗娼阿飞，想尽办法，制造混乱，伺机逃跑。逃出去后，依然公开搭客卖淫，卖淫手段更加下流。一次，一个姐妹经批准请假回家，途见逃出去的吴娣正在搭客，回所作了报告。吴娣被抓回来以后，有人告诉她，是某某告的“密”，她恨恨地说：“总有一天我要做掉她！”又有一次，吴娣和几个人策划，如何用尿水去泼干部，被一个姐妹听到，出来阻止，吴娣立即拉住她的头发，没命地撕打。吴娣的所作所为，使教养所很多人怕她，不敢惹她，不得不听从她。但在她周围，也确实围了一群人，她们把她当作“英雄”和“大王”。对这样的人，再不严肃处理，就会邪不压正，就会姑息养奸，就会打击一大批积极改造的姐妹的积极性。教养所经过反复研究，决定向法院起诉。

几天后，吴娣被戴上了手铐，带走了。

“阿飞总司令”和“阿飞托拉斯”

阿飞最喜欢摆大王，讲义气。教养所收容的一些女阿飞中，一部分本来就带集团性质，互相之间有帮派联系。她们拉拢了一批气味相投的人，在所内拉帮结伙，联合起来作弄干部，抗拒改造。她们不像开头几年收容的那些妓女多在为自己的身世、命运哭泣忧虑，只要顺藤摸瓜，解开她的心头疙瘩，即使寻死觅活的人也能幡然走上正道；而现在这些女阿飞常常是无事生非，恶作剧，好像谁闹得最凶，谁就最体面、最有气魄，谁也就最能得到众阿飞的拥戴。

她们故意制造各种事端。有时集体装病，说食堂伙食有问题，吃坏肚子了；有时集体逃跑，你翻墙头她跳窗；甚至集体自杀，这边一个人假装跳井，两三个人死活拉着：“跳不得啊，跳不得啊！”那边两个人又跑来报告：“某某吞金了！”待到教养所出动救护车，载上“吞金者”急驶去医院灌肠，她们便躲在一边吃吃地笑个不停。后来，她们还大胆地在教养所内搞起“吃讲茶”、“打群架”等不法行为来了。

“吃讲茶”是两派阿飞有了矛盾，由阿飞头头出面“谈判”的一种形式。教养所有两个公认最凶的女阿飞，一个自称阿飞总司令，叫黄荣；一个则称阿飞托拉斯，叫邱剑芳。“吃讲茶”就得请这两个人。

一天晚饭后，两个女阿飞闲聊时，为了一个男人争风吃醋，双方都说这男人是自己的相好。这两个女阿飞各自请来黄荣和邱剑芳吃讲茶。教养所不比外面，她们搞这种活动不得不隐蔽些。双方约定趁星期天下午文娱活动室开放时间进行。这一天，黄、邱二人各带三个小流氓助威。双方穿戴整

齐，一派一个打扮，黄派白衬衫蓝裤子，邱派红衣灰裤。进门时，相对行礼、握手，坐定后，互敬一杯开水。接着“谈判”开始，双方争得面红耳赤。碰上干部或积极分子进来，她们就假装吃茶。由于文娱活动受时间限制，她们搞“吃讲茶”只得分几次进行。谈了好几次还是谈不拢，就动起武来——打群架。

打群架也是事先约好的。她们专门选择了黄昏时分，天快黑了，干部们忙了一天正想歇一歇，晚上还要组织学习呢。她们就挑了一块空地，双方摆好阵势，互相对峙着。大家都是身绕皮带，脚着跑鞋，扎紧裤管。先双手叉腰责问，接着指手对骂，“司令”、“托拉斯”一声令下，各自冲出队伍拍一记手心，于是就动手了，拉头发的拉头发，撕衣裳的撕衣裳，拳打足踢，两旁好几十人呐喊助威，最恶劣的是双方互拉裤子。等干部得悉后赶到，她们一声口哨，溜得一干二净。

对这类阿飞的改造相当不易。干部们通过反复研究分析，最后取得了两点统一认识：第一，既然她们的特点是拉帮结伙，那就得抓为首的；为首的确系怙恶不悛，那就要严惩不贷。因为惩治极少数人，就会使绝大多数人看清这条路走不得；为首的若能幡然悔悟，那当然更能带动一批人。第二，既是拉帮结伙，就要分化瓦解。参加这些活动的多是二十岁上下的女青年，她们年轻无知，不少人觉得吃讲茶、打群架、集体自杀这些行为很好玩，够刺激。对这些被拉进去的多数人，只要讲清政策，严肃指明这样做是闹事，带有抗拒改造的性质，是要受处分的，切不要盲目参与。看到这类不法行为，应随时检举揭发。通过政策宣传，多数人是会醒悟过来的。

教养所多次组织“什么是英雄气概，什么是江湖义气”的

讨论,开展阅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普通一兵》、《把一切献给党》等革命书籍的读书活动,用健康的文化娱乐生活填补她们精神的空虚,同时与重点对象开展谈心。人们一批又一批地觉悟了。有的把保尔·柯察金写的“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这段话背了又背,说:“我们这样打群架,瞎起哄,现在看看蛮有劲,到将来临死的时候,当我回首这一段往事,那是多么无聊啊。”有的说:“有真本事得用在工作上,学习上,马特洛索夫曾经有过偷窃行为,后来也成了英雄,我们为什么不能向他学习呢?”许多人揭发吃讲茶、打群架这些事,全是黄荣、邱剑芳两个人带头干起来的。

教养所对黄、邱二人作了具体分析。黄荣只有二十一岁,父亲是个工人,母亲是个里弄干部,她与流氓为伍,冒充学生身份,专门腐蚀青年工人。被收容进教养所后,先是以各种卑鄙手段,企图拉男干部下水,受到严厉指责后,转而挑逗教养所邻厂的工人,工人们不予理睬,她就用石头打人家。一天清晨,她胁迫两名收容对象,同她一起翻墙逃跑,跑到路上,被一行人发现,她竟无耻地提出要同这人发生关系,被那行人严正拒绝,叫来群众扭送回所。黄荣进所后逃跑数次。一次逃出去后,她母亲劝她好好在教养所接受改造,不要再逃了。黄荣竟扼住母亲颈项欲置于死地,被她母亲拚命挣脱。她父亲也因为她胡作非为,痛苦得想跳黄浦江自杀。正是她那什么坏事都敢做的“胆量”,使她成了一伙顽劣之徒的首领。她恨正直的父母亲,更恨把她关起来使她不能再胡作非为的人民政府。千方百计作弄政府的干部,成了她最得意的“杰作”。干部们多次对她进行教育,她还是一副“我什么也不怕,什么也不说”的架势。

邱剑芳比黄荣还小一岁，原是个中学生，吃讲茶、打群架的风气都是她带进来的。事发后，她沉痛地对干部说：“我就是从吃讲茶走上邪路的。我念书时，曾经受过一个坏蛋的欺侮，总想报复他，自己又没能耐。听人说，只要请个体面人去吃一次讲茶，替你讲赢了，欺负你的人就得乖乖地向你道歉。我真的请人吃讲茶，也真的讲赢了。可是从此以后，我就被这个吃讲茶的人拉下了水，他原是个流氓集团的头子，后来被逮捕法办了，我既恨他，又暗暗佩服他出众的辩才。进所后，我看黄荣自称阿飞总司令，在教养所称王称霸，我想，你黄荣有什么了不起，专干些偷偷摸摸的勾当；我就自称阿飞托拉斯，提出以后遇事要吃讲茶，动口动手都要放到桌面上来。很多人都赞成我的做法，我这一派的人越来越多，可是，她黄荣又想出假自杀这些把戏，拉过去一大帮人。现在我想通了，吃讲茶、打群架都是流氓行为，我带头这样做，讲轻一点，是要流氓；讲重一点，是聚众闹事，是犯法的。我要求队长处分我。”

显然，邱剑芳和黄荣不一样。像黄荣这样连正直的父母亲都欲置于死地的人，单靠教养所苦口婆心的教育已经不行了，她的所作所为已经触犯了刑律。邱剑芳还有一定的正义感，只是是非不分，深受“江湖义气”之害，对自己的错误也有所认识。教养所对两人作了分别处理：黄荣报司法部门逮捕法办，邱剑芳向大会作检查，现身说法，教育了大多数。

“捉 逃 跑”

自1954年底采取发现一个、收容一个的方针以来，教养所收容任务加重了。1955年共收容了1724人，是历年收容

人数最多的一年。收容人员又大多是零零星星进来的，互相之间不熟悉，给管教工作带来了许多不利因素。另一方面，从1955年下半年开始，教养所进入大批安置阶段，要派出许多干部为新生姐妹落实安置环境，又要协助新疆建设兵团等单位，为去新疆、甘肃等地参加大西北建设的姐妹办好培训班^①，教养所的管教力量明显感到不足。因此，从那时开始，收容人员逃跑事件接二连三地发生，有好几起还是集体逃跑，最多的一次达二十多人。

必须采取断然措施制止逃跑。

1955年10月，教养所召开了部分管教干部会议，布置了一项特殊任务：要求在半个月内，协助公安局把教养所逃出去的人全部捉回所内。以后随逃随捉，决不能让她们混迹社会，再去害人。

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这些逃出去的私娼阿飞都是晚上出来活动，干部们白天要正常工作，晚上八点以后就在地区公安分局治安科的配合下，到大世界、大新游乐场、先施乐园、皇后咖啡馆、新都溜冰场、人民广场、八仙桥等地，搜寻私娼阿飞的足迹，这些逃出去的人，只要在外活动，管教干部一眼就能认出。

有一位“捉逃跑”的女干部来到先施乐园，她进入剧场，一眼就看到第三排中间有一个妇女是教养所逃出来的私娼，等她跑到第三排边上，这个私娼却不见了。一眨眼功夫，她躲到哪里去了？这位女干部很纳闷，不甘心让私娼溜掉，就在剧场后排一个不显眼的角落里坐着。过了几分钟，这个私娼的脑

^① 详见下节。

袋又露出来了。原来，当干部刚进场时，那私娼早就发觉，急忙躲到椅子下面，几分钟后探出头来不见干部身影，估计是出去了。谁知那干部又来到了她面前，她只好老老实实跟着干部到黄浦公安分局。

在“捉逃跑”时，也会碰到一些使人啼笑皆非的事。一位青年女干部到大世界歌舞剧场去执行任务，有个中年男子看到她单身一人东张西望，以为她是到大世界来“兜生意”，就跑到她身后搭讪挑逗，纠缠不放，弄得这位女干部无法进行工作。她急中生智，把对方引到大世界派出所，公安人员狠狠地训诫了他一顿。

不到半个月，从教养所逃出去的收容人员绝大部分被捉拿回所。在这以后，逃出去一个就捉回一个，毫不放松。有一个叫殷秀春的私娼，先后逃跑十二次，公安局和教养所通力协作，把她捉回十二次。教养所的围墙不高，没有铁丝网，也没有武装警卫，收容人员活动的范围又广，要逃跑并不很难。但是，这些人逃出去之后，势必重操旧业，她们总是要在这些场合活动，所以总能重新把她们捉回来。

教养所对逃出去的人不歧视，不体罚，但要她们作出检查，认识错误。严重的要停止亲属接见，适当延长教养期限，有的还要关“禁闭”。当然，防止逃跑最有效的措施还是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用眼前发生的一些活生生的事例，反复向她们说明，翻墙头逃出去不会有好结果，还是戴上红花大步走出去才显得有光彩。

有个叫王佩玲的女阿飞，收容时才十七岁，是她妈妈陪着送到教养所来的。她那忠厚的母亲向教养所同志诉说了王佩玲学坏道的经过。

王佩玲原是个读书很用功的中学生，“二六”轰炸时，她父亲给国民党飞机炸死了，一家生活发生了困难。幸亏家庭妇联的帮助，她母亲被安排当上了营业员，临时把佩玲寄养在外婆家。不久佩玲轧上了坏道，小小年纪跑舞厅，坐汽车兜风，还装病旷课，偷窃外婆的钱去舞厅鬼混，抽烟、酗酒样样都来。有一次被三个小流氓灌醉后轮奸了。从此，她干脆不读书，当上了专跳黑灯舞的地下舞女，在公园里进行淫乱活动。这位母亲说：“我多少次劝她，骂她，还跪在地下向她哀求，她都无动于衷。后来只好把她关起来，可小阿飞们常来窗下打暗号，接应她逃出去。有一次，她沿着水落管爬下去，不小心把脚跌伤了，那些流氓阿飞趁她在家养伤，把黄色书刊从窗口扔进来，她着了迷，伤一好又逃了出去。现在我实在管不住她了，求你们把她关起来。她会逃的，你们可要看紧些。”

果然，王佩玲进所没多久，就在阿飞的串通下逃了出去，被教养所抓了回来。第二次她正企图翻墙，教养所早有准备，把前来接应她的流氓也一网打尽。这下王佩玲就像死了老祖宗似地大哭起来，又叫又骂，她被关了禁闭。正在这时，教养所请三个已经走上工作岗位的姐妹回所谈体会，王佩玲开始根本不想听，听着听着，她入神了。那三个人原先都是调皮捣蛋的，有一个还逃跑过，可现在却成了厂里的先进青年。特别是一个叫郎莲娣的，比王佩玲大不了几岁，也像她那样被流氓集团勾引，她转变后，检举了流氓头子，立了功，受了奖，登了报。一位前来采访的波兰记者还摘下胸前的共青团证章送她，祝她早日成为一个共青团员。现在她真的入团了。她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过去我总以为，趁年轻的时候和那些男人白相白相，反正吃喝有人掏腰包，打架有人当保镖，一个女

人嘛，这就够神气的了。可进了工厂我才知道，真正神气的是有本事有技术的人，我们厂里有些十七八岁的小师傅，已经是三级工、四级工了，可我这个二十几岁的人却什么也不懂。这时我才感到，过去那样地‘白相白相’，不但危害社会，而且误了自己。姐妹们，我们不能再耽误了，得抓紧时间，努力改造，争取早日出所，早日参加工作，早日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王佩玲听呆了。说老实话，这些话过去老师、同学、母亲也曾对她说过，可她听不进去。现在，同样的话出自一个和她有着同样经历的人口中，就有了一种特殊的感染力和说服力，她相信了。

针对1955年刮起的逃跑风，教养所一手抓逃跑，对严重逃跑分子进行处理；一手组织各种正面教育活动，情况很快有了转变。妇女教养所1957年的工作总结中，明确地记录了这样一段事实：“教养所当年收容807人，其中32人属逃跑后被抓回的‘二进宫’‘三进宫’，占3.96%；上年安置1695人，其中安置回原籍农村的494人，倒流来沪重操旧业的13人，占3%。安置在本市参加家务劳动的238人，其中重操旧业的仅1人，占0.4%。安置在皖南国营农场的601人，倒流回沪重操旧业的5人，占0.8%，安置去甘肃工厂和上海厂矿企业的357人，没有一人重操旧业。这与1954年逃跑和重操旧业者高达20%以上相比较，这个数字确是大大降低了。”

戴上大红花 走出教养所

1951年11月26日上午，在第一批姐妹进教养所的第一

个清晨，隆重地举行了第一次学习动员大会，上海市民主妇联的代表曾经这样对姐妹们说过：“把你们集中起来，是为了提高思想，治好性病，学会生产技术。到时候，再依照各人的身体条件安排各种生产工作。翻身姐妹中，有些已有了真正相爱的对象的，也可以公开提出来，经过调查，证明确是好人，等把病治好了，一定让你们自由结婚。如果乡间有丈夫的，将来也会帮助你们团圆。目前家中父母生活有困难的，政府将给予适当的照顾。总之，今天你们进所时，一个个还是浑身是病的苦难姐妹，不要很久，到你们离所时，你们就是新社会的新妇女了。”

时隔一年，这位上海妇女界代表讲的一番话开始变为现实了。1953年初，教养所就开始对改造好的姐妹，分期分批予以安置。

根据政府的规定，凡收容进所的姐妹，必须符合下列四个条件，方能出所安置：

- (1) 改掉好逸恶劳的游惰习气，确已提高了思想觉悟；
- (2) 学会了一定的劳动生产技能；
- (3) 医治好性病和其他传染性疾病；
- (4) 有家属保释，出所后有生活来源或生产就业条件。

一般来说，那些出身贫苦、为生活所逼而沦为娼妓的，经过一年多到两年教养，符合上述四个条件，便可出所安置；而那些自甘堕落的私娼、阿飞，思想复杂，教养时间往往要长一些。

上海妇女教养所 7513 名收容人员中，原籍上海的仅 673 人，绝大部分来自江苏、浙江、安徽和各地农村。因此，安置方向主要是去国营农场和农业生产合作社从事农副业生产。其

中有 2500 多人安置在安徽、苏北等地的国营农场；1500 多人回乡参加农副业生产；近 2000 人去新疆、甘肃等地支援边疆建设；500 多人由教养所介绍到上海企、事业单位工作；500 多人有家庭抚养条件的，保释回家从事家务劳动。还有 300 多人没有亲属，不愿离开教养所的，改变教养人员身份，留场工作。1958 年妇女教养所改为国营工厂，迁到甘肃，她们随厂去西北，当上了正式工人。

教养所历年安置出所人数统计：

年 份	1952	1953	1954	1955	1956	1957	1958	合计
人 数	92	999	778	1968	1695	619	1042	7193

全所收容人员共 7513 名，除历年分批安置外，还有 13 人因病死亡；274 人因年老体弱转入养老院，由国家负责养老；26 人经审查不属收容范围由家属领回；还有 7 人因多次外逃，继续违法犯罪，由公安机关逮捕，强制劳改。

日思夜想的红派司

1953 年 1 月 25 日，黄阿金进教养所正好满十四个月，她作为首批安置的十九名劳动妇女之一，胸佩大红花，喜气洋洋地坐在大礼堂的最前排。

大红标语映衬着十九张喜悦的脸，紧锣密鼓激荡着十九颗跳动的心。民政局的领导来了，劳动局的同志来了，国棉四厂、华阳纺织厂、太平洋织造厂、中国医药公司上海采购供应站、保生电泡厂等就业单位的同志来了。教养所的领导 and 各方代表先后讲了话。在一千多名姐妹的热烈掌声中，在一千

多双眼睛羡慕的注视中，安置就业的十九个姐妹的代表黄阿金讲话。她站起身来，一步一步走到劳动局代表面前，恭恭敬敬地三鞠躬，心中在默默地念叨：“同志，给我红派司吧，我想了整整三年了。”

黄阿金九岁丧父，母亲为了得到一点聘金养活她的弟妹，把她许配给一家姓高的地主家做童养媳。谁知高家儿子是个游手好闲、嗜赌如命的流氓。阿金吓得从乡下逃到上海做童工。几年后，高家追到上海，强拉阿金回乡成亲。成亲后高家之子不但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地吃喝嫖赌起来，而且抛弃了阿金。逼得阿金再次逃到上海找工做，可是，工没有找到，却被人贩子骗进妓院。上海解放那一年，黄阿金已经三十三岁了，她说：“我九岁就当童工，从那时起就想当一辈子工人。”她不顾老板威胁，和同院的十个姐妹一起，坚决洗手不干，学习织袜子。解放后不久，有一次，手工业工会一位同志送了她们十多张参观工人文化宫的票子。黄阿金也去了。工人文化宫在解放前本是东方饭店，那时的东方饭店是供有钱人玩乐的地方，有不少受人拐骗沦落为娼的妇女，经常在这里被蹂躏、被侮辱，今天完完全全地变了。解放后的工人文化宫，只有工人，只有劳动人民才能进去参加活动。这次，黄阿金能来工人文化宫，她心里多高兴啊！“我也成了工人，也是个劳动者了！”可到门口一看，她发现进进出出的人都笑嘻嘻地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红派司”（工会会员证），有了这个“红派司”，打球也行，看书也行，唱歌演戏都行。可她没有。什么时候她黄阿金也能当个堂堂正正的工人，也能从口袋里拿出一个“红派司”？今天，这个愿望终于快要实现了！而且她是教养所一千多姐妹中的第一批，她怎能不激动呢。

是啊，在这批受苦的姐妹中，很多人本来就是能干活的，许多人就是为了想做工才到上海来的，是万恶的旧社会剥夺了她们劳动的权利，连骗带拐把她们推入火坑。二十四岁的吴桂英，幼年父母双亡，由祖父抚养长大。祖父是更夫，桂英九岁那年，祖父巡更时被一群土匪打死，小桂英从此拿起了讨饭棒。棍子赶，石头扔，拳打脚踢放狗咬，什么样的苦她没吃过？有人对她说，上海有招童工的，你要不怕苦，讨饭到上海去做工吧。她问怎样才能做上工，那人告诉她，到了上海，头上插一根草，脚下放一只破碗，在大街上跪着，就会有人来要你去做工了。可怜的桂英，她哪知头上插草是卖身啊！就这样，十四岁的吴桂英从扬州乡下一路讨饭到上海，被人领进了金城妓院。先做佣工，十六岁开始卖淫。十年摧残，她早就死了做工的心，没想到今天真正能去做工了。不是头上插草跪着求上门去，而是胸佩大红花，敲锣打鼓用车子接去的。她想放声笑，更想大声哭，可她没笑没哭，来到华阳纺织厂，她只说了一句话：“我什么活都愿意干！”

吴桂英当上了厂托儿所清洁工。她称心，她自豪，不仅把分配给她的洗尿布任务完成得又快又好，而且还能仔细观察尿布上的粪便，发现婴儿大便颜色不正常，及时告诉护理人员或婴儿的家长。平时一空下来，主动把环境打扫得清清爽爽。吴桂英这种高度自觉的劳动态度，得到全厂职工的赞扬。1953年10月，华阳纺织厂专门给教养所送来一封感谢信，信中说：“贵所给我们送来了一个多好的工人啊！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吴桂英同志已被我厂群众评为优秀工作者。”一年后，她与同厂的一位劳动模范幸福地结合了。

在第一批安置就业的十九个姐妹中，李亚梅（在处理“九

条龙”闹事中她表现很突出)等十个姐妹准备安排做技工,先在失业救济会办的第二机械制造训练班培训。1954年初培训结束。这时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不久,大批农民进上海要求做工,上海市还有一批失业工人急需安排,这十个姐妹未能及时分配,只好按失业工人待遇,每月发五元五角救济费,生活相当困难。这些人技术进步快,已经加入了工会,其中有两人思想不通,埋怨说:“难道我们的工会会员证是假的吗?发五元五角救济费,这不是逼人……。”

“不!”李亚梅脸涨得通红,大声说:“我们是政府介绍来的人,现在政府有困难,我们得替政府着想,为政府争气,宁可饿死,也不能再走老路!”十个姐妹互相鼓励,互相接济,过了半年多,先后进厂就业。1985年退休的李亚梅,退休前已是个七级车工,在该厂工人中工资最高,她带出的徒弟中,有三个还是援外技术骨干呢。

让改造好的姐妹安置就业,是对还在接受改造的姐妹们最好的鼓励和教育。多少人从这些活生生的实例中看到了自己的前途和希望,增强了继续改造的信心。分配去某国营袜厂的尹杏珠,原是个啥也不会的暗娼,做“乌龟”的丈夫去新疆改造了,她无儿无女,无亲无故,原以为要在教养所了此一生,没想到政府把她介绍进厂,担任机器烘袜工作。她兢兢业业,产量月月超计划,厂方不记前过,照样评她先进。三年后,丈夫刑满释放留在当地工作,夫妻双双都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还有一个叫包祥英的,原是一家工厂的女工,解放前与“咸水妹”为邻,染上爱虚荣、图享受的坏思想,轧上坏道沦为娼妓。进所后,她痛哭流涕,后悔不已,决心洗心革面,积极参加劳动。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教养所主动找她原来的工厂

联系，希望能恢复她的工作。但该厂表示，包进教养所时已在大会上被宣布开除，再去恐不合适。于是，教养所又和纺织局联系，把包介绍进另一家工厂工作，包祥英感激不尽。教养所好几次请尹杏珠、包祥英等来所为姐妹们现身说法。姐妹们说：“尹杏珠、包祥英这样的人都能有出息，我们还怕没有前途吗？”

妙手补得破镜圆

五十年代前期，我们国家百废待兴，失业工人还有一定数量。因此，教养所姐妹中经政府介绍就业的只能是其中确有专长和表现突出者，较多的人是由家属保释回家参加农业劳动或家务劳动。她们中间当然有许多人巴望夫妻亲人团聚，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人不愿让家人知道自己的过去，担心在家人和乡亲面前抬不起头而不愿回去；还有少数是被父母或丈夫卖出来的，至今感情深处还有无法弥补的伤痕，不想再见家人。因此，做这部分人的安置工作就要花费更大的力气。教养所的干部往往既要千方百计帮她们找到亲属，找到后又要苦口婆心地去做有关当事人的思想工作，弥补苦难的岁月刻在她们心头上的伤痕。

三十二岁的周梅梅和丈夫失散已经整整十年了。这对苦难夫妻原是街头卖唱艺人，十年前，抗日战争刚刚结束，国民党反动派又挑起了内战，夫妻二人连同一个出生才八个月的孩子在兵荒马乱中被冲散了。一群乱兵糟蹋了梅梅，还把她逼进了火坑。进教养所四年来，看到别人夫妻团聚，重享天伦之乐，周梅梅无时不在思念她的丈夫和孩子。一天，教养所干部告诉她，她丈夫现在浙江某县剧团当演员，因为听说她当过

娼妓，不愿再与她往来。现在，教养所打算向她丈夫做工作，周梅梅听了自然很感动。

教养所详详细细地给周的丈夫写了一封信，叙述了当年梅梅遭受国民党匪徒摧残的痛苦遭遇，叙述了她进教养所后积极改造，渴望团圆的迫切心情，希望他能体谅妻子的心情，到上海来跟她见一面。梅梅丈夫看着言词恳切的来信，终于带着孩子来到上海，把梅梅接回家去。

半个月以后，教养所收到了梅梅丈夫的感谢信：

“我妻梅梅已经平安抵家。我原以为与沦落娼门的人共同生活是不会有好日子的，真没想到人民政府把她教育得这样好。请放心，我会对她好的，比过去更好。寄上我们的全家福照片一张，再次向所长、队长，向人民政府致以深深的谢意。”

二十六岁的胡纪玲，抗日战争时期由于生活所迫，当过女招待。后来被一个资本家买去作小老婆。这个资本家嫌她出身低微，横加歧视虐待，最后遗弃了她，使胡纪玲沦为暗娼。收容进所后，通过阶级教育，治好性病，表现很好。教养所在调查中得知胡纪玲有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在上海某公司任经理，生活比较富裕，便动员她哥哥来把纪玲领回家去。哪知胡纪玲回家不久，嫂嫂开口闭口骂她“婊子”，对她百般虐待。让她干最重最脏的活，不准她迈出家门一步，不准她和兄嫂同桌吃饭，不准孩子叫她姑姑。有客人来时把她关起来，免得坍了胡家的台。胡纪玲实在无法忍受这样的虐待，只得写信要求回所。所领导在查明情况属实之后接受了她的要求，把她接回教养所，另行安排到甘肃参加农业生产。胡纪玲万分感激，临走时一再保证到了新岗位一定好好干。

胡纪玲的安置,使教养所感到,对保释回家的,一定要对她们的家庭进行反复分析研究,既要确保她们出所有可靠的生活来源,又要考虑她们回家后有良好的生活环境。因此作出规定:对那些回家回乡的姐妹,不仅要有亲人保释,还要同当地政府取得联系。对许多姐妹的安置环境,教养所还要派干部去实地了解,然后护送她们回家。

有个曾经做过下等妓女的姐妹,她本是舟山一个渔民的妻子,生过一男一女。抗日战争时期,丈夫被日本鬼子活活打死。这个姐妹只得忍痛送掉女儿,把儿子寄养在姐姐家里,自己到上海谋生,不幸沦落为娼。经教养所收容后,治好了她的病。她想回家和儿子一起生活,但又怕找不到工作,无法养活儿子,反遭人瞧不起,一时感到左右为难。工作人员发现了她的心事,专门派人去当地政府联系,安排她在渔业大队参加劳动,还请她姐姐带着她的儿子亲自来上海接她。教养所为她想得那么周到,使她感激得流泪。临走那天,她买了许多糖果分送给队里姐妹,还把院子和宿舍角角落落扫了一遍。几个月之后,所里接到了她的来信:

现在我已是渔业大队的社员了。初回到家乡时,我羞惭得头也抬不起来,除了埋头做生活,一天到晚怕说一句话。我担心别人翻我老账。好在我经过在所里的锻炼,身体结实,什么苦都吃得起。我和男社员一样能扛起百来斤重的渔箩,赤着脚在滩涂里做生活,在炎热的太阳下补网、晒网。乡亲们并没有看不起我,还让我跟男社员一起出海捕鱼。要知道过去我们这儿女人是不准上船的,说女人上船不吉利,会翻船。现在大家都说我能干。还说:到底是政府教育出来的人。我的活干得多,挣钱也多,很多人羡慕我。如今我的儿子也上学了,母子俩吃穿都不愁。……这封信是我自己写

的，在教养所里学习五年文化，今天派用场了……

我们建设边疆去

1955年，是妇女教养所安置出所人数最多的一年。这一年安置出所的共有1948人。其中最隆重最热烈的莫过于欢送翻身姐妹去新疆建设兵团的那一次了。

以前，教养所安置出所，一批最多百把人，这年四月，去新疆的竟有九百二十多人，整整齐齐地编了四个中队。

以前，姐妹们出去不是做工，就是务农，或做家庭妇女，可是这次，她们身穿绿军装，脚着军跑鞋，九百多人集体参加了建设兵团。

个把月前，去新疆参军的消息就开始在姐妹群中不胫而走。

“听说了吗？新疆要一大批人呢。”

“说是去参军的，和英雄的三五九旅一起。”

“三五九旅是做什么的？”

“啊，连三五九旅也不知道！我昨天刚教你唱过《南泥湾》你忘了吗？”

“花篮的花儿香

来到了南泥湾

……

三五九旅是模范”

这个唱歌的名单红韵。姐妹们都叫她“蛇腰”。她原是个秦淮歌女，被一个小开糟蹋后抛弃了。她伤心之余来到上海，不知是哀叹自己的身世，还是故意向听众调情，她每次唱歌时，总是斜着身子，伸长脖子，扭着腰肢，凄婉地唱着，久而

久之，就得了个外号——“蛇腰”。在上海滩上，没有靠山单靠卖唱是吃不开的，她只好下水了。只要有人捧，不管是谁，她就跟人家开旅馆。时间长了，她的身边围着一群老头子，名义上是干爹，实际上是嫖客。她就是这样从一名歌女进一步堕落成为私娼。刚进教养所时，她总是哼着似怨似诉的曲调。教养所的干部发现她有唱歌才能，安排她当歌唱教员，还让她领头组织了一支新生妇女合唱队。单红韵一改旧日郁郁寡欢的情调，变得爱唱爱笑。可是今天，她唱完《南泥湾》后却连连叹气。

“‘蛇腰’，你叹什么气啊？”

“你不知道，那是参军，要的是苦大仇深的人，像我这号当过歌女、私娼，关系复杂的，别想轮上！”

是的，那是去边疆，又是参军，带队人都是南征北战尚无妻室的老战士，去的人当然都要经过挑选。然而我们党强调的是现实表现。新疆来的首长明确宣布：只要能把过去的一切都讲清楚，只要符合安置就业的四条标准，只要本人和家属自愿，都可以报名。但有一条，新疆的条件目前还比较艰苦，想去的姐妹必须是35岁以下，治好一切疾病，身强力壮，吃得来苦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七个字，在这些翻身姐妹的眼中是多么崇高啊！教养所一声号召，当即有一千多人写了决心书、保证书。结果大部分人被批准了。到了新疆，她们被安排在各个岗位上。据1960年几个单位的不完全统计，她们中有六十多人经过考验，加入了共青团，有10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实践证明，对那些无家可归、无乡可回的收容人员，在她

们改造好了以后，进行集体安置，让她们的身心融化在轰轰烈烈的建设事业中，是安置的一种好形式。继 1955 年 4 月九百多名姐妹去新疆以后，同年五月又分两批安置了四百七十多人去甘肃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1956 年安置五百多人去苏北国营农场，六百多人去皖南国营农场。在边疆和农村，这批具有一定技术和文化的翻身妇女，受到当地人民的热烈欢迎，许多人成为建设骨干。满怀希望的单红韵成了新疆建设兵团一名活跃的文工团员，在当地成了婚，组织了美满的家庭。有个叫徐雪玉的姐妹，会扎金针，到了西北以后，不到一年时间医治了三百多人。还有一个名叫秦惠花的，进所四年从无亲人前来探望，悲观消沉。到了甘肃，她积极劳动，后来经人介绍，和当地一位农业劳动模范结了婚，生活过得十分幸福。

甘为新人择佳婿

在 7513 名收容教养的姐妹中，已婚的占 65.2%，其中因夫妻感情不和而分居或离婚的占 25.8%，因受丈夫虐待而离婚或被遗弃的占 5.1%。也就是说，在这批姐妹中，因婚姻不幸而走上娼妓道路的要占到 30% 以上。因此，帮助她们建立美满幸福的家庭，就成了安置这批姐妹的一项艰巨的特殊任务。

在解决姐妹们的婚姻问题中，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千方百计帮助她们寻找亲人，破镜重圆以外，对那些需要建立新家庭的姐妹，教养所特别注意尊重姐妹们的独立人格，帮助她们慎重地选择对象，以防这些刚刚修补好的破碎的心灵，再一次遭到损伤。

首先，教育她们必须主动与有妇之夫断绝关系。这些姐

妹过去没有正常的家庭生活，她们心目中没有一夫一妻制的法律观念。只要有男人要她，很少考虑对方有无妻室。旧社会那些“从良”者，也大多是去当人家的小老婆，所以她们觉得与有妇之夫往来并不奇怪。通过对她们进行婚姻法的教育，使她们逐步认识了与有妇之夫往来，既是破坏了人家的家庭的违法行为，也是把自己继续放在被玩弄的地位，是对自己的侮辱。于是，那些与有妇之夫保持往来的，纷纷主动断绝了关系。

有个叫高翠玉的姐妹，浙江诸暨人，四岁亡母，送给舅舅家做童养媳。后来舅父去世，不堪舅母虐待，跑回娘家，以帮佣和跑单帮维持生活。舅母知道后，把她强领回去，硬要她同生理有缺陷的丈夫圆房。翠玉拚死不从，干脆跑到上海，另嫁他人。谁知那个男人是流氓，只是看中翠玉年轻幼稚，又有几分姿色，玩弄了一阵后就把她遗弃了。高翠玉接连遭到多次沉重打击，气出一身病来，结果沦落为娼。在那备受摧残的日子里，有一个铜匠很同情翠玉的遭遇，一再表示要替她赎身，但筹不到钱，只好离她而去。1952年，高翠玉进了妇女教养所，心里一直忘不了那个铜匠，写信叫他来见见面。铜匠来了，他已是一个有孩子的父亲，翠玉悲痛欲绝，病也不想治了。甚至还想自杀。干部们一面用她自己遭人遗弃的事例启发她，告诉她：新社会不能允许让铜匠的妻子再做第二个高翠玉；一面让她请假去姨母家，通过姨母的关系，找到了一位老实的工人。从此，翠玉的心情开朗了。病愈之后，就同意她出所结婚。这个年纪已经三十六岁，遭受多次婚姻不幸的女子，终于过上了幸福的家庭生活。

毫无疑问，这些苦难姐妹在治好性病、提高了认识之后，

完全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意愿独立地选择对象,但在结婚之前,应该让对方了解本人过去的这一段经历并能取得谅解,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真正的爱情,在今后的生活道路上获得真正的幸福。1981年,原教养所干部对现在居住上海的原收容对象抽样500人进行了调查分析。了解到出所结婚时本人曾向男方介绍情况的那些家庭,绝大部分都很和睦。有个叫邢宝珠的姐妹,她原先的丈夫是个老嫖客,染上性病吸毒死去,她自己 also 染上了性病。邢宝珠先后生过两胎,一胎死在腹中,一胎是遗腹子,生下来就浑身溃烂,活到三岁也死去了。丈夫死后,她无以为生,堕落为娼。进了教养所,替她治好了性病。她经过了上述种种不幸遭遇,本不想再嫁人了,后来有个朋友替她介绍了一个比她大十多岁的高级职员,此人有子女十人,有六个已经成家。两人相识后,邢宝珠把自己的身世包括生过两个坏死孩子的情况全都告诉了他,那男人越发觉得她老实可靠,不会亏待前妻子女,高高兴兴地来教养所,把邢宝珠保释出去结了婚。婚后邢宝珠对老爱人十分体贴,对四个尚未成家的子女精心照料,其他六个子女对她也都十分尊敬。1978年,邢的丈夫病故了,留有存款一万多元,她把一半存款拿出来分给子女。然而,她那些子女大都是知识分子,有教师、工程师、银行职员,还有现役军官,他们都不肯接受父亲的遗产,对后母说:你跟随父亲二十多年,又为我们子女操劳了一辈子,现在又没有工作,这一万多元留给你用。邢宝珠说:二十多年来,你们当我是亲妈,我已感激不尽,我吃得起苦;何况我还有你们在,我担什么心啊。最后,开了个家庭会,十个子女同意各拿二百元遗产,以后每人每月给邢宝珠五元赡养费。现在,邢宝珠有子孙几十人,逢年过节欢聚一堂,“奶奶”“外婆”叫得亲亲热热,

而且快做太婆了。人人都说她子孙满堂福气好。

人民政府把一大批妓女收容起来,教育改造成新人。一件件生动的事迹在报刊陆续发表之后,震动了整个社会。人们对这些已经选择光明大道的翻身姐妹毫不歧视。当时,上海妇女劳动教养所还收到不少人民来信,要求为他们介绍对象。下面是一部分来信的摘录:

教养所负责同志:

我看到1956年《新观察》24期《她们为什么会堕落》一文后,使我感到祖国的伟大。当我看到她们从腐化堕落、好逸恶劳的邪路上转变过来,成为热爱劳动的社会主义的新妇女,我从心底赞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

负责同志,我是一个22岁的煤矿工人,我想请求你们帮助我介绍一个合适的对象,作为我终身的伴侣。如果可能的话,我可以带组织证明前来面谈。介绍认识后,我们可以先做朋友,通讯联系,彼此进一步了解和培养感情,然后希望能来我处共同工作,共同生活,建立美满家庭。望回信。

兰州×××

1957. 3. 6

上海妇女教养所负责同志:

我是浙江××百货公司门市部营业员,前据《文汇报》介绍,知道在我们党和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下,在教育改造来自旧社会的翻身妇女的工作,获得了巨大的成绩。我相信,任何犯过错误的人,只要肯改,都能变为有用的好人。所以我很想在你所找个适当的对象。我已35岁,曾爱过两个人,因家贫无力结婚,所以一直拖到今天还是过着单身生活。我的要求是:(1)确已悔改前非,现能出所的;(2)年龄相仿;(3)能有劳动生产技能,出来后能参加工作。

对旧社会造成的恶果,有些人脑子里还存在着一些看法,但我认为这不是她本人的过错,而是旧社会的毒害。我不嫌弃她们,也不会看不起她们。请放心。

×××

1957年6月2日

上海妇女教养所负责同志:

我是复员军人,今年35岁,浙江湖州人,初中文化程度,参加抗美援朝时,前妻死亡,现欲找一个配偶。

我家现有人口五人……(下面详细介绍父母、兄弟情况,从略)我本人在本市某医院工作,今拟请你所代为介绍一女伴,要求年龄在25岁左右,无宿疾隐毒,身体健康,五官端正,性情善良,具有一定工作能力,略有文化。

关于我的具体情况,可请贵所向本院人事股联系调查。

×××

1957.8.30

对这些来信,教养所首先通过组织调查,情况确实时,再征求那些希望组织为之介绍对象的姐妹的意见,然后让双方逐渐增进了解。像这样通过人民来信、由组织牵线而建立家庭的,仅1957年一年就有十几对。

1957年9月,教养所收到了武汉某照相馆职工周某的信。信中说,他今年已三十岁,尚未成婚,希望教养所为他介绍一个对象。他说,他对女方没有什么特别要求,他自己是单位里的先进工作者,又是工会组织委员,希望她思想作风正派,能勤俭理家。

教养所接到周某来信后,一面给他回信,希望他谈谈具体要求,一面给武汉市人民政府民政科去函,希望协助了解周某

所写情况是否属实，并希将周某的生活作风、健康状况、为何至今未曾结婚等详细情况迅速赐函告知。

不久，周某的回信来了。信中说：

感谢你们认真负责地处理我的来信。兹再提出我征求对象的具体要求于下：

- (1) 年龄以不超过二十五岁为好；
- (2) 不考虑文化程度，结婚后，我可以让她参加市民夜校学习；
- (3) 外貌不要有麻子、瞎子等突出的缺陷；
- (4) 思想要求进步，结婚后要做到互敬互爱，互相帮助，勤俭理家，孝敬长辈。

随信附上我的家庭介绍一件，相片二张（希望能寄来对方相片）。如对象确定后，请告诉胞弟××（住上海××路×号）。

武汉市人民政府的复函也来了。信中称：“周某今年卅岁，背有一点驼，但不太影响美观，确未结婚，其余家庭成员、服务地点、工资待遇等均与本人所说相符。”

为了对周某和所介绍的姐妹负责，教养所又派一位分队长约请周某胞弟面谈，详细询问情况。在那姐妹和周某通了一段时间的信后，又让周某来上海与她见面谈心，最后双方都觉得满意后，才同意他们结婚回家。

国际友人谈上海娼妓改造

娼妓改造是个世界性的问题。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个国家能真正消灭娼妓。解放才几年的新中国，新中国的上海——

这个曾经是世界娼妓人数最多的国际大都市，却这么快地铲除了娼妓制度，并把七千多名娼妓改造成新人。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引起了世界各国的瞩目。参观上海妇女劳动教养所，成了各国来宾了解上海社会改造工作的窗口之一，成为他们要求参观访问的热点。尽管他们参观访问的目的不尽相同，有的是想实地了解一下是否是真事实；有的是出于善意，想要学习改造妓女的途径；有的是满腹疑虑，认为取缔娼妓是不可能的事；还有少数则带着挑衅的眼光，想来收集新中国的阴暗面的。参观以后，几乎一致公认：你们的经验很成功，为全世界作出了榜样，世界各国都要向你们学习。

教养所接待外宾的工作开始于1954年。据不完全统计，前来这里参观访问的外宾来自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所内有几十个翻身姐妹接受过外国记者的采访。仅1956年一年，就接待了来自朝鲜、印度、日本、新西兰、新加坡、挪威、澳大利亚、埃及、丹麦、瑞士、英国、美国、民主德国、联邦德国、波兰、冰岛、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巴西、苏联、法国、阿根廷、突尼斯、乌拉圭、伊拉克、加拿大、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土耳其、荷兰等31个国家的110多位外宾。

外宾们说，取缔娼妓，改造妓女，是很多国家叫了多少年却始终没有做到的事，想不到上海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却做到了，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法中友协代表团团长塞里需埃说：法国妓女问题很严重，几十年没有解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些城市就关闭了妓院，但由于没有替她们找到出路，这些妓女仍然在马路旁做暗娼。他认为中国改造妓女的做法，不仅对法国，对整个欧洲都有借鉴作用。临走时，塞里需埃热

情题词：“我们衷心的感谢和赞美你们，希望法国也能建立这种教养所。”

阿根廷和平代表团在参观妇女教养所时热情致词：“我们到过不少国家，听到过各种各样对于妓女的议论，有的主张开妓院，有的主张封妓院，大家讨论了很多，写了很多书。赫尔辛基是个很美的城市，但我们也还看到不少妓女。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件很简单很具体的事实，我们不知道你们是怎么讨论的，但我们看到了事实、使人感动的事实——我们看到小孩在这里唱歌，在别的地方，他们可能变成小罪犯；我们看到很多妇女，她们眼中闪着过去没有的亮光，脸上带着过去没有过的笑容，显示出她们要参加建设新社会的工作。我们要感谢，感谢给我们参观这样一个单位。我们祝教养所的工作成功，这是和平的工作，和平也鼓励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国家内从事这项工作。”

在前来参观访问的外宾中，日本外宾占的比重很大。据说日本国内娼妓问题相当严重。日本教职员代表团团员香川正一参观教养所后说：“我在中国参观了好多地方，要算这次感受最深切，在这里使我深深感到新社会的优越和共产党的伟大。”他说，日本现在妓女很普遍，甚至我在担心我所教过的女学生，是否也会被生活所迫去当暗娼。日本六大城市代表团团员北神正认为，日本的妓女问题不好解决，妓女每月收入二万日元，如果做其他事情仅仅赚六千元；更重要的是，在日本嫖妓，受谴责的只是妓女，嫖客一点事都没有。他认为，归根到底还是社会制度问题。日本新闻广播界访华代表团团长说：你们这样的做法在日本是不可想像的，目前在日本虽然还做不到，但我们可以去宣传，可以告诉全世界，中国已经这样做

了。日本拥护宪法访华团一位团员是国会议员，回国后正好赶上第二十二届国会开会，会上要提出取缔娼妓的法案。他说，今天的参观是我带回国的最好礼物，我可以用活生生的材料告诉议员们，娼妓是可以消灭的，妓女是可以改造的。

参观中，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外宾说，他们那儿革命胜利了，但娼妓问题却还没有完全得到解决，中国的经验对他们非常有用。越南记者、作家代表团一位副团长说：越南刚解放不久，河内的娼妓还很严重，我们要向中国学习，加紧做好对娼妓的改造工作。南斯拉夫记者米利奇在妇女教养所看了工场、医务室、病房、宿舍后说：“简洁干净”，“真不简单”，对我们的改造妓女工作，表示十分钦佩。苏联一批代表团成员感慨地说：“我国解放这么多年，对社会改造还没有一套完整切实的办法。你们解放才几年，政府就把这个问题放到重要议事日程上来，予以彻底解决了，真可以成为世界的典范。”民主德国汉学家艾尔克斯夫人参观了妇女教养所和新入习艺场（以改造乞丐、扒手等游民为主）以后说：新社会不仅要改革上层统治，而且要清除下层流氓，这对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很有用。她还说回去后就要向本国政府反映。

外宾们印象最深的是教养所对人的尊重，以及把这些曾经作过妓女的人，真正改造成对社会有用的人，还周到地安置就业。许多国家的朋友说，世界上也有一些国家设有关押管教妓女的机构，那里不仅要有高高的围墙，铁门紧闭，还有瞭望台，手持枪杆的卫兵，尽管如此，还常会有人越狱。你们这儿既没有铁丝网，又没有高围墙，甚至没有一个武装警卫，你们采用的完全是以心换心、医治心灵创伤的做法，这是最人道的做法，也是最有效的做法。缅甸工会代表团一个叫杜理枝

的团员说：在我们缅甸，也有妓女教养所，妓女在那里就是做苦力。你们这儿完全不同，这儿已不像教养所，而更像一个工厂，她们专心地工作，既学技术，又治疾病。英国友好访华代表团的代表认为，只要按这个办法做下去，再经过两三年时间，这种教养机关就可以不必要了，对这样的成功经验，世界各国都可以向中国学习。

1956年，妇女教养所接待了一位美国记者，他在所内足足停留了四个小时，不仅对环境陈设、各个工场、宿舍、学习场所、饭厅、娱乐室等一无遗漏地仔细察看，把“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铲除旧社会侮辱女性的制度，树立新时代重新做人的精神”等标语一一抄下，还随手指着正在摇纱头的一个姐妹要和她谈谈。这个姐妹叫诸玉英，是个生得清秀的二十出头的姑娘。美国记者问她：“这纱头是政府让你摇的吗？你觉得这活儿苦吗？”

诸玉英文静地回答，她原来分配的活儿是用手理纱头，做了几天，她发现理过的纱头堆在那儿烂掉，卖不起钱，多可惜啊。她向队长建议，何不把碎纱头摇成鞋底线，也是一种废物利用呢。队长问她，你会摇吗？她答应试试看。试试结果，一两纱头可摇30根线，卖一角八分钱呢。所里于是派了好些人让她教授摇线。

“啊，你真聪明！可那摇鞋底线换来的钱并不归你所有，你这样积极，是想早点出去吧？”

诸玉英老实地告诉那个美国记者，她是想早点出去，因为她已经有了一个对象，她想出去跟他结婚。但那摇鞋底线倒不是为了早出去。她原来有肺病，政府为她治病花了好多好多钱，她要用自己的劳动来报答政府——“哪怕只有一角八

分，也是我的一番心意啊，再说，眼看一堆烂纱头在自己手里变成了有用的东西，你说我能不高兴？”

这位美国记者心悦诚服了。他坦率地说：我原来以为，宣传和现实总是有距离的。从诸玉英身上，我感到“新社会把鬼变成人”这句话，你们真正做到了。

外国朋友对妇女教养所几乎全是年轻女干部，对我们用青年妇女教育青年妇女的做法也非常感兴趣，当他们得知这些女干部全是志愿从事这项工作时，更觉钦佩。印度法律工作者代表团团长说，我真没想到从事这项世界难度最大的工作的，竟都是这么年轻的女性。他说，光这一点就值得世界各国来学习。乌拉圭一对作家夫妇得知一位女干部在1952年“九条龙”闹事时，曾被一些人又抓又打，身上怀的孩子都因此流了产，他们钦佩地说：“你是个很坚强的人，你做这工作很有意义的。”说着一定要拉着这位女干部一起照相。意大利一位女记者拉着三十多岁的女所长的手，不解地问了好多问题：“是组织派你来的吗？还是志愿来的？”当她得知所长在大学学的就是社会学，当即翘起了大拇指：“哦，一个社会学系毕业的女大学生，亲自从事改造社会，解放妇女的事业，没有什么工作比这更合适，更有意义了。”

外国朋友访问妇女教养所，既把上海改造娼妓的成功经验带向全世界，反过来也促进了教养所的教育改造工作。

1955年夏天，一位波兰记者听到二十岁的郎莲娣改邪归正的故事以后，把自己胸前的一枚共青团证章取下来送给了她，满怀深情地说：“姑娘，请你收下吧！这是波兰先进青年的标志。你真是一个好姑娘，能从歧途上转变过来。我们波兰也有一些青年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我要把你的转

变情况写成厚厚一本书，告诉那些波兰青年，让他们向你学习。”

这个郎莲娣原是某工厂的艺徒，三年前被一个流氓集团引诱，走上了邪路。她整天和一些阿飞一起，公然在公园里进行卖淫活动，收容进教养所后，还与个别阿飞保持联系，成了所内的重点教育对象。经过队干部数十次谈心帮助，指出她年轻幼稚，上当受骗，贻误了自己的前途，终于觉悟过来。她痛哭流涕地说：我受坏人引诱，堕落到这种地步，我母亲为了我这个不争气的女儿，气得病倒在床，可我过去毫不动心。现在想想真对不起父母的养育，对不起工人老师傅的教导，更对不起人民政府对我的挽救。她主动揭发了阿飞头子项某某的罪恶，协助政府破获了一个罪恶昭著的流氓集团，受到教养所的大会表扬。这一天，郎莲娣得到波兰记者的共青团证章后，更是激动万分。早先她在烘袜车间工作时，一不小心就会把袜烘焦，她就开动脑筋，搞出了一项掌握火候的小革新，成了教养所的生产能手。不久便被介绍到一家袜厂工作，还真的加入了共青团。

四 十个苦难姐妹的辛酸泪

律师之女的沦落和新生

朱雪珍的父亲是个律师，可是她根本不相信人间还有正义、公理和尊严……

1934年，扬州的乡下，愁云惨淡，民生凋敝。三十七岁的朱律师一口鲜血，一口浓痰，断断续续给女儿留下了最后几个字：“珍儿，做人……要站得正，立得直……处处自重……”

朱律师一生正直，爱为穷人打不平。一次，为了给一家农户写状子，告地主强占他的土地。那地主先是送礼，不收；又派打手上门，逼着撤回诉状，他始终不依。还有一次，一个异乡农民被人骗去了五十元钱，一路号哭，正要投河自尽，被他碰见，接到家里住了好几天，还把妻子的手镯卖了，给他做路费。

如今，律师撇下寡妻孤女，溘然长逝。没有留下一亩地，一块钱。当时朱雪珍才十岁，随娘投奔乡下舅舅家，舅舅是个佃户，苏北农村，连年灾荒，日子也不好过，雪珍娘托人让雪珍到附近尼姑庵帮忙砍柴、烧火，自己跑到扬州城里当佣人去了。

雪珍十七岁那年，一场大旱，颗粒无收，舅舅作主把她嫁

给一个叫刘大林的长工。大林没爹没娘，更没有丝毫积蓄，为了娶亲，欠了一百元债，后来利滚利，滚成了三百多元，眼看坐困乡下，永无还清之日，便抛下妻子到上海杨树浦寻他姐姐。那时，雪珍怀孕八月，生下个女孩，刚满月，连孩子的名还没起，为了躲债，只得把孩子寄养在邻居家，到上海去找大林。

大林在上海码头上打零工，没工做就靠拾垃圾、菜皮过日子，连自己都养不活，哪顾得上妻子！可那个债主得知雪珍来上海找大林，就派人暗中跟踪，找到大林后，限他三天之内还清债务，过期就要拖到巡捕房去。大林慌慌张张逃出上海，去向不明。

一个刚生孩子的产妇，一路上已够劳顿了，哪受得了这等打击！雪珍病了，但一想到她那还没起名的孩子，硬撑着赶回乡下，可怜那出世不久的女孩也死了。

她走投无路，只得去扬州找娘。不想扬州的姨妈告诉她，娘去上海找女儿了。雪珍一听慌了，急着又要返回上海寻娘，但想到大林出走后回去也是无依无靠，左右为难。正巧，姨妈家隔壁有个小姐妹，名叫阿兰，能说会道，愿意介绍雪珍到上海做工。阿兰说，没有路费，她可以代买船票；没有衣服，她可以借几件，等将来挣了钱再还。看到她这般好心肠，绝望中的雪珍一把拉住阿兰的手，号啕大哭。

农历九月十八日清晨，雪珍跟着阿兰坐轮船到了上海，走进了一幢石库门房子。阿兰指着一间小房间，让雪珍先睡一觉，中午喊她起来吃饭。令人奇怪的是，她看见吃饭的都是青年妇女，穿着睡衣、拖鞋，头发烫得蓬蓬松松的。午饭后，阿兰又让她睡，她不想睡，阿兰说：“傻瓜，有福不享！快睡吧，这里要做夜工的。”到了吃晚饭的时候，雪珍发现这些女人抹粉的

抹粉，梳头的梳头，一个个打扮得油头粉脸的，男人接二连三地进来了。她越看越觉得不对头，忙去找阿兰，谁知阿兰早已溜之大吉，一个胖女人皮笑肉不笑地问她：“你就是雪珍吧，东张西望找谁？”雪珍胆怯地说，她是阿兰介绍来做工的，娘在上海，想先去看看娘。

“看娘？嘿嘿！”胖女人拉长了脸，“你来上海的路费是谁给的？身上穿的衣服是谁做的？都是我的！”她见雪珍愣住了，又厉声说：“明白告诉你吧，这儿是上海有名的夜都会，懂吗？进得来，出不去！”

雪珍慌了，再三央告：“我是好人家的女儿，爹做过律师，我有娘，有男人，我宁可讨饭，也不愿做缺德事，求求您放了我吧……”

胖女人冷笑一声，丢下一件旗袍，扬长而去。两个粗手大脚的梳头娘姨，把雪珍死活拉进房间，按着梳头、扑粉……

雪珍泪流满面，想到明天就是九月十九，观世音菩萨的生日，心中默念着：“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您能救救我吗？”然而，残酷的现实使她失望，苦命的雪珍就这样跌进了十八层地狱。

“夜都会”在上海滩中、下等妓院中小有名气。老板陆大霖是北海路一霸，拜过老头子，他有枪，有自备汽车。先后被拐骗到“夜都会”的姑娘不下百余人。朱雪珍被骗后改名“李莉”。她来自乡间，从小跟父亲读书识字，知书达礼，在妓院老板的心目中，她可能成为一棵摇钱树。有个国民党政府的处长在糟蹋了李莉之后，扬言愿以重金娶她为妻，陆大霖自然得意，但李莉一心记挂着丈夫大林，说什么也不愿意，狠毒的陆老板

把她关起来，跪碎玻璃，百般折磨。李莉出身律师之家，懂得一点法律常识，曾跑到老闸捕房控告陆大霖和那个处长的非法行为，谁知老闸捕房皂白不分，反把李莉的衣物首饰搜括一空，关进捕房，肆意拷打，最后放回了事。

李莉被捕房放回不久，上海即将解放。一天夜里，“夜都会”突然涌进一大群国民党伤兵，吓得妓女们躲的躲，藏的藏。那领头的军官指名要李莉接客，李莉从容上前说：“这里不是战场，何用荷枪实弹。把我们这些弱女子的衣饰一抢而光，也算是英勇行为吗？”反动军官恼羞成怒，飞起一脚把李莉从四楼楼梯一直踢到二楼……

在姐妹们的照看下，李莉身上的创伤慢慢地愈合了，但李莉心头的创伤更深：她想此身既入娼门，永无出头之日，谁都可以踢你，关你，糟蹋你。何时才能挺起胸来，做个堂堂正正，像模像样的人啊？

1949年5月，上海终于解放了。不久，上海市人民法院发布了支持妓院自动停业，妓女自行脱离卖淫生涯的有关规定。“夜都会”的姐妹们正要到有关部门去登记转业，反动的老板陆大霖却无理阻挠，并造谣威胁说：“共产党的话千万信不得。你们看，街上来来往往的大兵全是没老婆的，只要你们去登记，就要把你们关起来，实行共产共妻。”姐妹们不明真相，听了这种谣言之后，一些胆小怕事的就不免犹豫起来。受尽苦难的朱雪珍决心跳出火坑，追求新的生活。上海一解放，她就恢复原名，不再接客。有一天，她和大阿姐黄阿金从东方饭店门前经过，她们过去曾在此被人蹂躏，这里如今成了工人文化宫，进去的人大都身着列宁装，手拿一张“红派司”，去里

面看书，打球，唱歌，看戏。她们羡慕极了。一打听，方知“红派司”是工会会员证，只有在工厂做工的人才有。打那以后，雪珍一心想做工。她把这主意对姐妹们讲开了，一个叫张玉英的姐妹说，她认识一个摇袜厂的师傅，可以托他买摇袜机。于是，十二个志同道合的姐妹凑了些钱，买来了摇袜机，兴致勃勃地学起摇袜来。

雪珍想做工，还有一层意思。原来她进“夜都会”四年多来，每次给娘写信，总是说自己在工厂做工，却不写地址，深怕娘来上海找她。现在真的摇袜做工了，很想让苦命的娘来看看女儿了。她高高兴兴地给娘写了一封信。娘按着地址找到上海一看，想不到女儿竟在这号地方做工，一气之下打了女儿一记耳光。为娘的不听女儿哭诉申辩，哭着回老家去了。这件事深深触动了雪珍，她发誓这辈子一定要走进一家像样的工厂做工，领到工会会员证，把娘接来同住。

上海解放两年多了，可是“夜都会”的大部分姐妹在老板的胁迫下，依旧时断时续地操着卖笑生涯。1951年11月第一次大收容时，雪珍和姐妹们一起全部被送进了教养所。

雪珍对自己被送进教养所很不理解，一再争辩说，上海一解放她就不干了，早已是个摇袜女工了，为什么还要把她关起来？在这样一次大的行动中，人们当然没有时间听她分辩，只是催促她拿好行李，集中学习……

一进教养所，她突然歇斯底里大发作。这个律师的女儿不理解党的政策，错误地认为：送她进教养所就是把她关起来；共产党所说的既往不究、集中学习、跳出火坑、翻身解放等等，可能统统都是骗人的。她越想越怕，越想越恨。狂笑一阵后，坐在床上，不吃不睡，整整三天三夜。

可是，眼前的事实使雪珍很快发现，这里没有像老闸捕房那样抄她的身，更没有吊她，打她。在她不吃不睡的日日夜夜，常常有人端来面条鸡蛋，为她叠被铺床。她不再绝食了。每天从早到晚，埋着头，抿着嘴，不声不响，拚命用摇袜来消除心头的烦恼。这样，在教养所里，她的产量超过定额一倍，得到了所里的表扬，还领得了奖金。尽管如此，可她心病未除，学习时依然不发言。

一年后，包括大阿姐黄阿金在内的十九名姐妹首批安置就业了。通州路教养所敲锣打鼓，一片欢腾，安置就业的人一个个胸佩大红花，手中拿着鲜红的工会会员证。朱雪珍眼睛发亮了，共产党没有骗人，真的要把我们这些人瞧不起的下贱人改造过来，扬眉吐气作主人呢。不久，所里把她从摇袜间调到仓库，经常派她押着一车一车货，带着几百几千元的支票，进进出出搞业务。所里的干部对她如此信任，使她内心感到无比温暖。有一次，她到黄阿金的工厂，看到黄阿金已当了袜厂组长，容光焕发，更加感触万分。

第二批安置就业，朱雪珍戴上了大红花，她穿着一身新的列宁装，手捧一只大信封（里面装的是她自己的档案），到某福利机构报到。

1985年10月，两位芬兰记者专程来沪进行上海解决娼妓问题的专题采访。当年妇女教养所的几位干部陪同朱雪珍一起来到锦江饭店，接受采访。

年满花甲的朱雪珍，还是当年的瓜子脸，洁白的牙齿，激动时发亮的眼睛，只是眼角挂上了鱼尾纹。面对着迢迢万里前来采访的外国记者，不禁感慨万千。

她解开一个小包袱，啊！各式各样的奖章、奖旗、奖状：1956年，民政局机关工作积极分子；1960年，局先进工作者；1963年，上海市五好职工；1964年，上海市“三八”红旗手；1965年，市五好职工；1966年，上海市“三八”红旗手……

这个在人生道路上备受屈辱，沾满污点的人，竟取得了这么多的荣誉，岂非奇迹！

是啊，朱雪珍在教养所期间和参加工作后的表现，说来确实相当动人。

在福利院里，三岁的小良良没爹没娘，先天拐脚，这几天又得了肺炎，医生刚给他打过针，有事出去了。突然，小良良又没命地咳嗽起来，咳着，咳着，一口痰噎住，顿时脸色发青，两眼发直，昏死过去。到福利院工作不久的朱雪珍一听是痰噎住了，猛一把抢过小孩，口对口就吸起来，吸着吸着，“吐噜”一声，一口浓痰从良良喉头吸了出来。

良良得救了，雪珍也就此学会了人工呼吸急救法。

在福利院工作期间，她不顾自己会不会传染，用口对口的人工呼吸抢救了十几个病孩。一个叫盛盛的痴呆小儿，寄养在福利院，半夜突然昏厥过去，朱雪珍用人工呼吸把他救了过来。还有一个男孩叫敏敏，因先天性心脏病导致痴呆。父亲是科研人员，母亲是医生，可是都因工作太忙，只好把孩子送到福利院治疗。雪珍为敏敏喂饭、理发、洗尿洗屎，孩子昏厥三次，被她救过来三次。孩子的父母拉着雪珍的手，感激得什么似的。雪珍说：“我不过是个普通的保育员，你们这样相信我，尊重我，叫我老师，叫我同志，我从心底里感谢你们。”

在福利院，朱雪珍一个人要带二十几个残疾儿童。她是

那样地喜爱孩子，就像自己亲生的一样。

朱雪珍参加工作的头一晚，就给她娘写信，盼望她来看看亲生女儿。可是，这些年来娘得了一身毛病，叫她一个年迈之人怎么独自来上海呢？朱雪珍几次想请假去接，可又不愿离开身边的孩子，假期一推再推。突然来了电报，说是“母亲病危速回”，她匆匆赶到扬州，娘摸着女儿发亮的“红派司”，居然奇迹般地坐了起来，病情减轻了，还支撑着一针一针地把一双鞋底纳完，交给雪珍说：“穿着娘做的鞋，像你父临终说的，要站得正，立得直。”雪珍接过鞋底，泪如雨下，临别时对娘说：“等您硬朗些，我再回家接您。”谁知雪珍回上海才三天，接到一个长途电话，娘于清晨五点四十分去世。雪珍百感交集，抱着不懂事的残疾孩子，放声大哭……

“对不起，您这么喜爱孩子，不知您自己可有孩子？”芬兰记者打断了朱雪珍的沉思。

“我有孩子，还有个幸福的家。”

“啊，那位大林回来了？”

“是的，大林回来了。可是我现在的爱人不是大林，而是另一位离休干部。”

朱雪珍告诉记者，大林一解放就回乡了，土改那年入了党，当了干部。她那时感到配不上他，坚持着同他离了婚。她参加工作后，一位亲密的大姐替她介绍了一个对象，她一听对方是转业军人，共产党员，未婚，吓得直摇头。那位大姐叫她打消顾虑，硬拉着她到复兴公园与对方见面。那一晚，她一句话也没有说，回来后翻来覆去睡不着。次日一大早，她打电话给他：“我的情况大姐全对你说了吗？”对方回答：“我全知道了，你别自卑。我以前也要过饭，这些都是旧社会造成的。明晚我

在复兴公园等你，你一定要来！”

朱雪珍和那位转业军人结婚了，很快有了一个可爱的孩子。1962年，朱雪珍光荣地入了党。现在，夫妻俩退休的退休，离休的离休，过着晚年的幸福生活。雪珍平时劳动成了习惯，退休以后还担任了居委会党支部书记。

一位女大夫的遭遇

她来了。穿着白大褂，挂着听筒，白晰的面庞上戴着一副秀朗架眼镜，微笑着向我们走来。

“这就是我们居委文教委员张翠琴同志。”居委主任向我们介绍：“她是我们地段医院的老医生，前年就退休了，可老闲不住，病人一多，就穿上白大褂，走进门诊间，给人义务看病……这不，我转了几圈都没找到，一到医院就给抓来了。”

她的脸上洋溢着满意的笑，眼中露出慈爱的光。她以一个人民医生特有的仁爱之心，解除了千百病人的痛苦。有谁想得到，她曾在冷酷的地狱中受尽磨难呢！

张翠琴的父亲是个大学毕业生，可她十岁那年，父亲就生病去世了。母亲把她和八岁的妹妹寄在上海外婆家读书，自己回了山东老家。外婆家开了家小印刷厂，起先两年，姐妹俩日子过得还不错。后来，外婆不知怎么吃上了白粉，家里越吃越穷，做老板的舅舅钱卡得紧了，外婆就往两个外孙女身上出气，不是骂“小克星，把你爹克死了”，就是骂“小败家精，把我家的败光了。”小翠琴自懂事起就不知道什么是家庭的温暖。十三岁那年，翠琴一气之下辍了学，跑出去唱越剧小生。她从小聪明，学一样像一样，很快就能登台演出。过了些时，妹妹

也嫁了人，姐妹俩谁也不白吃外婆的了。可吃白粉的外婆瘾头越来越大，动不动就向翠琴要钱，翠琴给的钱越多，外婆越觉得她好欺负。翠琴由于缺行头，很少登台机会。这些天正想积几个钱置两套行头，外婆要钱没有给，她便气呼呼嚷开了：“小赤佬，你翅膀硬了，就想飞了，没这么便当！等着吧，总有一天看我好好收拾你！”翠琴没有理她。奇怪的是，一向没好眉眼的外婆突然变和善了，有什么好吃的总是给翠琴留一点，偶尔还让舅舅给她买几尺花布做新旗袍。

那天一大早，外婆家里来了一个油头粉面的女人，说是为翠琴找到了一家好人家，家中房子大，钱又多，还送来了好多时新衣裳。外婆笑嘻嘻地挑了一件粉红色旗袍，让翠琴穿上，将“喜事”告诉了翠琴。翠琴一听，呼拉呼拉脱下旗袍，断然拒绝：“不认识的人，我谁也不嫁。”外婆一听，也火了：“小赤佬，不听我的话，不要进我的门！”

翠琴以为外婆只是说说气话，哪知她夜里演完戏回家，大门真的关上了，怎么敲也敲不开。可怜的翠琴，除了外婆家，在上海再也没有第二个落脚点了，况且时已深夜，叫一个姑娘家上哪儿去呢？

“咣咣咣……”不知哪家的钟敲响了十二点。秋夜的寒气越发使人感到冷入骨髓，翠琴孤零零地倚在外婆家的屋檐下，她想妈妈、想妹妹，泪水唰唰地流了下来。

突然，门开了，出来一个女人，那不是经常给外婆梳头的林妈吗！走投无路之时遇见熟人，真是赛似亲人。翠琴诉说了一切，林妈连声说：“作孽啊作孽，深更半夜，把一个姑娘家关在门外，出了事怎么办？这样吧，你外婆今夜有气，你就先到我那里住一夜，明天我去跟她说，让她来接你！”翠琴还有什么

话说呢？亲妈远在千里之外，此时的林妈，比亲妈还亲啊！

三转两转，到了浙江路上的一条弄堂，笃底两间小屋里，还亮着灯，不时传出男女的嘻笑。林妈和里面一个叫周四妈的打了招呼，对翠琴说：“我家还有一段路，你姑娘家走夜路不方便，周四妈是我的老姐妹，先在这里住一夜吧，不要紧的。”说完就走了。

翠琴怎么也没有想到，已经是1951年9月了，上海解放已两年多了，这儿竟还开着一家地下妓院！父亲死了，母亲走了，妹妹嫁了，吃白粉的外婆和人设下圈套，真的把她给卖了。

外婆这种摧残骨肉的冷酷行径，使翠琴从头顶冷到脚下，她自暴自弃地留了下来，当上了“野鸡”，并且很快也吸上了白粉，染上花柳病。11月25日夜，正当她伸出苍白的手，勾住一个男人穿进一条弄堂时，她被收容了。人们先把她送进汇司捕房（现向东中学）登记，又送到闸北分局集中上车，她吓呆了。“我的命好苦啊，世上没有一个人疼我，捕房，公安局，教养所，这些吓人的名字，等着我的又将是什么呀？”两天下来，她一言不发，粒米未进。

班长给她端来了病号饭，一碗汤面，两只鸡蛋，慢声细语：“吃吧，看你这么瘦，又没爹娘来看你，饿出病来，怎么好！”

“哇”地一声，翠琴终于哭出声来了，泪水掉在面汤里，她一古脑儿全吃了下去。

吃完面，她说：“好人，救救我吧，别送我回去，这里比我家好啊！”她带头戒了毒（白粉），治好了性病。所里看她有文化，办事认真，让她在医务室学习打针、开药方，几个月下来，俨然成了个小护士。

每到姐妹们的家属来教养所接见时，翠琴就像个主人，总

是打扫好接见的场所，抹好桌椅，可是，她已“父母双亡”（她恨她的亲娘，在填写“父母”一栏时，写了个“父母双亡”），从没有亲属来“接见”。

一次接见日，班长突然喊她：“张翠琴，接见！”

“班长，你叫错人了吧，我哪有人接见？”

“没错，你出去看看就会明白了。”

站在接见台前的，竟是翠琴的亲娘和亲妹妹。

翠琴别转头，只轻轻地喊了一声“妹妹”。

“娘没照看好你，娘害了你……”翠琴的娘泪如泉涌，泣不成声。

“我没有娘！”女儿却依然别转头，“要说娘，班长她们，人民政府，才是我的亲娘！”

在班长的开导下，翠琴终究还是认了娘，可是她的感情深处，救她教她的共产党，比生她的亲娘亲过千倍！

1954年，上海卫生系统来教养所挑选一些医务人员，选中了翠琴，所里知道翠琴早就想当一个真正的白衣战士了，高兴地把这好消息告诉她。翠琴却认真地表示：“报上登的建设大西北的消息我都读了，我是个青年，我做梦都想到那儿去创业。在医务室学习的陈根娣年龄比我大，身边又有孩子，家庭条件困难，让她早点到上海医院报到去吧！”不久，翠琴主动报名来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兵团病房工作，年年评为先进，还当上了工会组长和学习组长。一次，她在护理一个重病人时几天几夜不睡，当场昏倒在地。经检查，确诊她有心脏病等多种疾病。1958年组织上又将她调回上海工作。

翠琴成了上海某区一家地段医院的医生，独自一人住在一间小楼上，白天黑夜，埋头工作。许多好心人劝她找个对象

成家，她嘴上婉言谢绝，心里却无论如何平静不下来。

翠琴才二十九岁，她渴望得到爱。这辈子她还没有被爱过——没有母爱，也没有性爱。她觉得要爱，就要找个了解她、同情她、尊重她的人，这样的人能找到吗？那伤心的过去……现在，在自己周围，左邻右舍、同事、病人，谁都不知道她过去是教养所出来的！算了，把爱深埋在心底，把它升华给救死扶伤的崇高事业吧。

然而，爱偏偏来叩门了。他是个教师，带了个小囡在弄堂等她，一连等了三天。翠琴终于去了。啊，冬天的弄堂风，吹在孩子发抖的身子上，毛衣袖口都破了。翠琴鼻子一酸。孩子的冷，使她忆起当年自己的冷，更激起此时心头的热。她把自己的过去，一古脑儿全告诉了对方……

从小被人卖掉的翠琴，终于找到了知痛知痒更知心的亲人。翠琴的公婆都是大学毕业生，叔伯婶婶，除了翠琴，也都有大学、高中文凭。可一家人全都尊重她，什么事都同她商量。

这会，张翠琴正在幸福地向我们描述她的家庭：

“我有五个子女，三个大的是我丈夫的前妻生的，我们母子相处很好，前年我退休，把顶替名额给了老三，我自己生的老四还留在农场工作，最小的阿五今年也大专毕业了，分配在航天工业部所属的一家工厂，他在学校时就是个三好学生。我的公婆都还健在，我们和老大住在一起，去年添了个可爱的小孙女，我的家庭是四世同堂了。”

“舞国皇后”的今与昔

“站起来！站起来……”

“好！好！再加把劲……”

“加油，加油……”

“啊！——”

“哈哈……”

“呜呜……”

鼓励声、惋惜声、笑声、哭声融成一团，一阵一阵从教养所大厨房传向四方。大厨房门前走道上围着一大群人，原来是陆丽萍又在练习扛饭桶了。

分配在大厨房工作的陆丽萍，进所后一直不安心改造，天天想离所回家。老姐妹们对她开玩笑说：在大厨房工作的人，如果能把一桶饭扛起，送到队里去，就成为一个劳动者了，那时就可以出去了。陆丽萍天真地跑来问分队长，分队长和大家相处熟了，一时高兴，随口附和着老姐妹“嗯”了一声。陆丽萍信以为真，从此她一有空就拉着别人同她搭挡，锻炼扛饭桶。先在饭桶里装小半桶饭试着扛，慢慢增加。今天桶内的饭已加到大半桶了，她多高兴啊！可是她刚想站起来迈步，一个踉跄，屁股重重地坐到地上，险些把饭桶也打翻了。陆丽萍再也抑制不住自己，扑在饭桶上，失声痛哭。

陆丽萍是怎样的人？姐妹们为什么要同她开这样的玩笑？

原来她就是当年哄动上海滩的“舞国皇后”。柳腰细腿，袅袅婷婷，走起路来总是习惯性地扭着腰肢，踏着碎步。她上工时虽然勉强穿着劳动衣裤，可一歇工，常常跑回宿舍换上高跟皮鞋，珠花丝绒旗袍，披上纱巾，一边踏着舞步来回旋转，一边拿着一面小镜子，眉目含情，顾影自怜。

陆丽萍是个藏不住话的人。不出几天，姐妹们就从她那半是炫耀半是叹息的语调中，知道了她的身世和她一生中最辉

煌灿烂的一页。

陆丽萍出身在四川一个普通职员的家庭。她有一张俊秀的鹅蛋脸，眉儿弯弯，眼睛黑亮。还在重庆念中学时就能歌善舞，是学校里有名的校花。谁知念到高中一年级，父亲生肺病失业，一家人只好依靠出嫁的姐姐补贴生活，陆丽萍中途辍学了。但她怎么也忘不了旋转的舞厅，忘不了这充满诗意的旋转的生活，忘不了被捧为校花时那令人目眩心醉的旋转的整个世界！这一切难道就这样一去不复返了吗？不，她还是十六岁的少女，明眸皓齿，豆蔻年华，她要用她那少女的特有魅力，去重新夺回那个旋转的世界！

她的跳舞朋友向她建议：岷江边上有一家舞厅正在招雇舞女，不妨一试。对于她这样的漂亮姑娘，跳舞是出人头地的捷径。每天晚上，穿着最时新的舞装到舞厅一坐，保险有许多男人围着她转，收入不会低的。跳出了名，那就什么都有了。

她就这样下了海。

可是她很快发现，这不过是一家三等舞厅，生意倒是不坏，却没有她想像中的轻歌曼舞的旖旎风光。时而还遇到白相人的争吵，酒客的颠狂，失意文人的长吁短叹，以及警察的敲竹杠。翩翩君子，不啻凤毛麟角，而且自有相好。她黯然了，大有明珠蒙尘之感。

两个月以后，一个西装革履的男子来到她的身边。他对她说，他是某洋行的买办，过去从来不光顾这三等舞厅的，但当他得知这儿有这样一位才貌双全的校花，他就天天晚上来这儿了。他天天晚上来，可又天天都不敢邀请她伴舞。他觉得她的舞姿实在太美了，他这么个普通的男人都配不上她。但他有一颗黄金般的心，他打听过了，他可以帮助她父亲治病，可以帮助

她复学，可以使她成为重庆城最出众最有风度的美人——噢，不，她本来就是最出众的！说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叠钱。

陆丽萍其实并不相信他真有那么大的本事，因为他每次出手的票子并不像他许诺的那么多。但她欢喜他，她需要他，她需要的不光是他的钱（她认为如果他用大把的钱买到她的心，那么她的少女之心也就太世俗太低贱了），更是他的热辣辣的甜言蜜语。她从陶然欲醉的校花，一下子跌入三元钱伴舞一小时的舞女生涯以后，她是多么希望有人重新发现“她本来就是最出众的”啊，现在终于有人说出了她的心里话，他是她的心上人，她离不开他了。

终于，她跟他走进了旅馆。

终于，她怀上了他的孩子。

一直到她生下孩子，她还没有问过他有没有妻室。她觉得这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他对她的赞美和崇拜。可是，他的妻室终于找上门来了，污言秽语，大打出手，气死了她的父亲，也夺走了她的迷人的梦。

那是1943年，在抗战陪都重庆，一件经过渲染的桃色新闻，既可以置正人君子于死地，更可以挑逗得那些洋场阔少如痴如狂，蜂涌而来。陆丽萍经过小报的一番宣扬，反而名声倍增。人们赞美她“本来就是最出众的”，唱赞歌的不只是一个洋行买办，还有成群的达官富商，军界要人……

抗战胜利，陆丽萍把孩子寄养在重庆姐姐家中，跟随一批接收大员来到上海，自己租了房子，雇了保姆，出入在官场和老板之间，成了交际花。当时美国军人横行上海，陆丽萍专门请来一名英语家庭教师，闭门谢客几个月，学得一口流利英语。她又改租了迈而西爱路（今茂名南路）的高级公寓，添

置了许多华丽家具和古玩洋货，以维纳斯舞厅(今大华书场)为基地，给美国军官和国民党政府要员伴舞。解放前夕，上海舞女选举舞国皇后，在政界财界再加“盟国”友人的一致吹捧下，一身洋装洋裙、一口流利英语的维纳斯舞星陆丽萍荣获桂冠。

陆丽萍忘不了“皇后”加冕那天的豪华排场，富丽堂皇的大厅，前来祝贺的中外人士不下千数，送她的花篮从大门口、长长的走廊、扶梯，一直摆到她的脚下。她头戴彩缎和珍珠缀成底板的、镶嵌着各色宝石的“皇冠”，身着妃色长裙礼服，肩披飘逸拖地的白纱，在众舞女的簇拥下登上皇后宝座，有多少崇拜者向她献媚，有多少记者为她照相……

然而，陆丽萍刚登上“皇后”宝座，寂寞之感也随之而来。什么“举世无双”“绝代艳后”之类的赞扬，初听确实甜滋滋的，听多了也就乏味了。她慢慢发觉，热情的赞扬后面隐藏着可怕的冷漠。不久，美国军队撤离中国，一批官员和老板也纷纷逃离大陆。一个铜厂老板说，他可以带她去美国，让她成为世界舞星。她便和那铜厂老板结了婚。哪知婚后三天，那铜厂老板就抽掉资金瞒着她逃去香港，铜厂倒闭，欠债累累，她被债主控告，坐牢三月。出狱以后，重操旧业，卖笑又卖身，一直到1953年被人民政府收容。

.....

在那些嘻嘻哈哈的姐妹们看来，让柳腰纤步的“舞国皇后”去扛饭桶，不过是个带有点滑稽味的玩笑。可是，对扛了几百次还是没能扛起(因而也不能出所)的陆丽萍来说，却是个重大的打击。原来，陆丽萍进所四个月，光公寓房子的房租就要400元，保姆工资也没付，“我这样一月一月的改造下去，

房租、工资月月积欠如何得了？现在还有三套家具和一点细软物品，尚可作抵；如果长期下去，不仅要破产，又要坐牢了。”她想起解放前无端被“债主”控告的三个月的铁窗风味，心有余悸：“分队长，谢谢你，放我出去吧！”

分队长耐心地听她说完，爽快地说：“你何不早说呢，这些实际问题，所里完全可以让你请假出去处理的。”

第二天，分队长就陪陆丽萍回家，果然有三间房子，保姆闷坐在家，一见陆丽萍忙着告诉她房东来催租，四川的姐姐来信要孩子的生活费。分队长帮她找来寄卖商店的人，卖掉家具，付清房租，辞了保姆，寄出汇款，一一料理完毕。把剩下的细软物品和古玩打成一包，带回教养所，接着就造册入库，代为保存起来。

这个从未办过这类琐事的交际花，在一旁默默地看着，当分队长最后把一式三份库楼存物单的一份交到她手中时，她的眼圈发红了。她说，以前听很多人发誓赌咒地对她说，为她效劳是最大的幸运，可是从未有人为她办过一件实事。今天，想不到政府的人会这样真心实意地对待她，她似乎开始分辨出了，什么叫虚荣，什么叫实在，什么是假意，什么是真心。

打这以后，孤芳自赏的陆丽萍似乎换了个人儿。在一次小组会上，她悔恨交加地咒骂了自己的过去，她责备自己对不起死去的爸爸，对不起从小抚养她长大的姐姐，对不起那些希望她走正路的人，然后坚决表示，像她这样的人中毒极深，得在教养所改造一辈子。

一年、二年，同陆丽萍一起进所的姐妹一批一批地离所安置了。陆丽萍劳动、学习都不错，她本来就没有性病，又有文

化，按说出所安置的四条标准都已具备，可是当分队长同她提起出去的事，她就斩钉截铁地说：“分队长，我说过的，像我这样的人得在教养所改造一辈子。”

她有孩子，有姐姐，她是那么想念她们，可她为什么偏偏不愿回去？这个当初爱蹦爱跳，心里藏不住一句话的人，为什么变得越来越沉默寡言？显然，她的心头还隐藏着更深的创伤。教养所的干部意识到，我们不仅要帮助她们治好性病，更要帮助她们治好心病。

细心的分队长终于从一张泪迹斑斑的照片中，发现了深埋在陆丽萍心底的苦痛——这是一张中年男子的半身像。

她告诉队长，他就是那个教她英语的家庭教师。他们本是朋友，当他得知陆丽萍闭门谢客，决心自修英语的时候，他真以为她要向过去彻底告别了。他认真教，她悉心学，两个月后的一天深夜，当她已能操得一口流利的英语时，他握着她的手，深情地说：“丽萍，和我一起去当个穷教员吧，趁你还年轻，赶快从泥坑里跳出来吧，否则，你会后悔一辈子的！”她笑了，笑他的迂腐，笑他不知道她两个月闭门学习的“深谋远见”。

她当选为“舞国皇后”后，他再没有来看过她；可她因铜厂老板而锒铛入狱时，他来探监了。还是那句话：“出来以后，让我来教你点什么，你会学得很好的。”说着，深情地递过一张照片。

陆丽萍痛心地说，我这辈子吃够了爱慕虚荣之苦。我把假的拿来，把真的推开。当初，是我拒绝了他，可现在，姐姐来信说，人家已是受人尊敬的工程师了。我真是如他所说，要后悔一辈子了。

没想到，教养所一封言辞恳切的信，再一次把那工程师召

唤到了陆丽萍的身边。当工程师在她面前出现时，她不禁泣不成声。工程师说：“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我们还有长长的未来。”是的，“舞国皇后”不过是一场噩梦，她决心用双手去创造美好的生活。当教养所批准陆丽萍出所和工程师结婚时，她却一本正经地说：“我还扛不动一桶饭呢。”

队长告诉她，这仅仅是个玩笑。陆丽萍却严肃地说：“我知道是玩笑，然而别人能做到的事，我为什么不行呢？我要成为一个合格的劳动者，我要达到这个目的才出所。”

她说到做到，饭桶里的饭一点点地往上加，她要用劳动的汗水，洗刷掉一辈子的悔恨，她要用劳动的果实，获得同她心爱的工程师共同生活的资格。白天黑夜，她弯腰起肩，发疯地练，终于有一天，陆丽萍扛着满满一桶饭，从大厨房送到队里去了，中间相隔头二百米路呢。虽然她涨红着脸，走路摇摇晃晃，但从她的眼神里却透露出内心的喜悦。

陆丽萍“自我考试”及格了。消息不胫而走，当那位工程师领着陆丽萍的孩子前来接她出所时，一个爱说快板的姐妹的笃作响，送给她一首新快板：

末代皇帝扛粪桶，
自我服务成新人；
舞国皇后扛饭桶，
寄生虫成了为人民服务的女劳工。

大汉奸之妾自述身世

在同是沦落风尘的姐妹们面前，她处处显露出自己是那

样地与众不同。

她有修长的身材，白晰的面庞，薄薄的小嘴，乌亮的卷发，然而，她的嘴唇总是紧闭着，眼皮也几乎老是耷拉着，偶尔飞快地看你一眼，眼中会透出一股冷气。

清晨，教养所起床铃一响，别人都飞快地从床上跳起，洗脸，铺床，等待着点名、吃饭、上工，可她不，睡眼惺忪地伸了一个懒腰，推开被子，拿出眉笔唇膏，精心地打扮起来了。

人们打了早饭回来，她已焕然一新。淡紫色的裙装，领口衬着雪白的印度绸纱巾，胸前别着一枚耀眼的红宝石胸针，身上披着黑亮的丝绒斗蓬，手挽一只奶黄色的小皮包，——好一个装扮入时的贵妇人！

“你这是干什么呀？”分队长发话了：“这里是教养所，不是舞厅、交际场，你是来接受教育改造的，不是从前的交际花！”

她耷拉着眼皮不作声。突然，飞快地狠狠瞪分队长一眼，“哗啦啦——”拉开披风，撕坏裙套，扔掉胸针，又猛地抢过一把剪子，姐妹们以为她要自杀，一齐喊着扑过来要抢剪子，她一声冷笑，“咔嚓”一声，把披肩的卷发铰下来了。她故意把头发弄得散乱散乱的，套上一件肥大的旧人民装，下面一条旧中式大腰裤，一双木屐，双眼直直地在教养所大院内走来走去。

妇女教养所轰动了。大家都知道，所里来了一个美貌的怪人。

她的名字叫裴婵。

“她有神经病？”不，经精神科医生详细检查，裴婵的神志完全正常。

“她抗拒改造？”也不能那么说。裴婵不哭，不吵，不骂人，从那一天大闹一场以后，她每天准时起床，准时学习上工。她

聪明能干，在毛巾工场工作，每天都完成定额，但从不多做。

她嘴角露出蔑视，眼神带着嘲讽，从早到晚难得说一句话。她的用具，别人不能动一动；她的床铺，别人不能坐一坐。尽管自那天以后，她已卷起了她的丝光床单和鸭绒被子，换上了教养所统一发放的白床单，她还是觉得在这乌鸦群中，唯有她才是真正的凤凰。

她真是一只“凤凰”。慢慢地，人们开始打听到了她的来历：裴婵是教养所收容人员中唯一读过大学的女子，琴棋书画样样来得，被大汉奸周佛海看中，在淮海路为她买了一幢洋房，成了他的外室。周佛海垮台后，她专挑政界、商界的大亨来往、同居，玩腻了再换一个……成了陈白露式的高级交际花。

她俨然傲视一切。

每当一批新进所的姐妹检查出患有各种性病时，裴婵总是嗤之以鼻：“贱货，为了几个钱，什么臭男人都要，什么异样怪病都生，活该！”是的，她身上没有病，然而，纸醉金迷的生活却严重地吞噬着她的灵魂，她心中的创伤和毒害比谁都深。

阶级教育会上，台上的姐妹声泪俱下地诉说着妓女的血泪生活，台下的姐妹泣不成声，裴婵却木然坐着，有时嘴角还露出一丝嘲笑。小组讨论时，别人情绪激昂，她一言不发。小组长几次要她发言，她冷冷一句：“你们说的那些苦头，我都没尝过，让我说什么？”私下里，她对几个讲得来一点的姐妹说：“不信，你们到淮海坊看看，光客厅就有三间，一间的家具全是红木的，另一间全是上等藤器，第三间全是西式的。”

有人表示羡慕：“那还用说，周佛海是财政部长嘛，谁有你这样的福气！”

“财政部长有什么了不起！”裴婵面露得意之色，话开始多

了：“他那个财政部长还不如我呢！那时节，走我的门路求我的人可多了，什么金银首饰，看得中我就留下；看不中，我就朝窗口一扔，来人只好灰溜溜地走开。”

“周佛海这么听你的话，他死后，你哭过他吗？”

“哭周佛海？去年，我亲爸爸去世，我都没落一滴眼泪呢。我最瞧不起哭哭啼啼的脓包货。我哭他作啥？那些玩我的达官贵人，还有现在教养所的干部也都一样，别看他说得好听，什么‘关心你们，救出火坑’，我活了二十七八年，还没有看到世界上有谁真正关心过别人呢。”在裴婵看来，世界上本来就没有情感这个东西，有的只是利益，互相交换的利益。周佛海对她那么百依百顺，还不是因为她年轻漂亮，有她相伴，周佛海就格外有光彩，有场面，就会有更多的人奉承他；而她呢，也需要从他那儿得到金钱、地位和种种赞誉。周佛海死了，她从他身上再也得不到什么利益了，她当然不会去哭他。

裴婵不承认人与人之间真有情感。足见她根本没有领略过人间的温暖。在被利己的冰水淹没的所谓上流社会中，这是何等地惨痛，却又何等地天经地义！

然而，就在她进妇女教养所不久，一件件出乎她意料之外的事情，强烈地撞击着她的心灵。一天，她和姐妹们一起集体参观教养所的“库楼”，她看到了她的私人财产都好好地保存着，连那件撕坏的裙套都缝补好了。她的合法权益得到了人民政府的保障——这社会有公理。她感冒了，头重、发热，抬不起身子，曾经严肃地批评过她的分队长，为她请来医生，给她打针退热；队长又亲自端来热气腾腾的鸡蛋挂面，热情地叮嘱她：“吃下去，发发汗，就好了。”姐妹们不断问寒问暖，拿出从家里带来的好吃东西请她吃。她不禁想起过去她当交际花

时，大醉、大吐、大病一场，除了催讨账单的人，又有谁来问过一句？——这社会有情意。她身边那些曾被她看不起的姐妹，一个个戒了毒，治好了病，敲锣打鼓地走向新生活。她哥哥来看她，口口声声：“妹妹，你工作忙吗？我的工作是很忙的。”他问的是她的工作，他日思夜想地盼望她早日找到工作，而且相信她一定能找到一个抬起头、挺起胸的工作！——这社会有希望。她像变了另一个人，姐妹们亲热地叫她一声“阿婵”，都会使她泪流满面。深藏在她心底的，曾经决心彻底遗忘的哀痛被满腔真情所激起了——

她也有过温暖的家，那是介于小康和富裕之间的家。父亲是个工商业者，母亲是个贤良的家庭妇女，家中就兄妹二人，哥哥继承了家业，她在上海一家相当有名的中学读书，成绩优良，能歌善舞。十六岁那年，上海沦陷，一次，她正在台上表演，五十岁的周佛海看上了十六岁的她。周佛海那时是南京日伪政府财政部长兼上海市市长，出于半是畏惧半是讨好的心理，父母同意了周佛海的要求。周佛海为她买了公馆，请人教她做诗、写字、画画、弹琴、下棋，还让她到上海一家名牌大学听课。年轻的裴婵不是没有反抗过，她和学校里一位男同学约好私奔，被周佛海得知，竟然拿起刀子威吓。她害怕了，慢慢适应了寄生的金丝鸟生活。抗战胜利后，周佛海入狱，她徬徨过，但她不愿意放弃已成为习惯的华灯美酒，轻歌曼舞，仍然不能自拔。

今天，裴婵到底觉醒了。她主动提出，要以自己的身世和姐妹们的遭遇为题材，写一个剧本，自己写，自己演。当台上演到公审妓院恶霸和后台老板的时候，台下喊起了震天的口号，许多人哭了。裴婵，这个过去根本不相信人有什么情感，

连她父亲死了都不掉一滴眼泪的人，这时情不自禁地把父亲临死前的遗言编进了台词。她泪流满面地念道：“父亲，您临终前曾说，有朝一日，只要女儿生活能够恢复正常，您死了也就瞑目了。今天，我已经能织电机毛巾了，我成了个真正的人了！我仿佛觉得，我又回到了十六岁，我又回到了您的身边，父亲，您看见了吗，您看见了您争气的女儿了吗？……”

裴婵成了中外记者和作家、艺术家的采访对象。1956年9月19日，上海一家报纸以《她在转变中》为题，刊登了关于她的通讯。阿根廷和平代表团的一位记者紧紧地握着裴婵的手说：“在你眼里，我看到了新生活的闪光。在你脸上，我看到了新人的笑容。谢谢你，祝你永远幸运。”

1958年7月，经过四年教育改造的裴婵终于回到了母亲和哥哥的身边，她是以一个毛巾工人的身份回家去的。

从暗娼到保育员

她曾当过国民党军官的姨太太，逢人就爱摆当年的威风：“那时节，我要什么有什么，连珍珠都用筛子筛，大的留下，小的就扔了！”是不是真有其事，人们不得而知；但她一说到这里，眼珠便像珍珠般发出光亮，手不住地摇动，仿佛眼前真有很多珍珠让她筛，让她挑……

其实，宋亚芬的历史非没有什么值得夸耀和留恋，而是一部被别人当作货物那样辗转相送的血泪史。她把耻辱当作荣耀，恰恰说明，她的心窍完全被血泪换来的珍珠迷住了。

宋亚芬十五岁便成了江西一家土财主的小老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她的家乡是红军和白军拉锯战的地区。当地不

少财主都养有一批私人兵勇。宋亚芬的男人家产不多，却很会算计，他嫌养兵勇吃用太大，不知怎么，巴结上了一个国民党军官，便把宋亚芬假充千金小姐，梳装打扮，送上门去，博得那个军官的欢心，他的部队便成了土财主的义务保镖，抗日战争爆发了，那军官投降日寇作了伪军，又故伎重演，把宋亚芬转送给一个日本军官，日本军官玩厌了，把她送给部属，成了军妓。抗战胜利后，宋亚芬就来到上海，先跑黑市，买卖股票，后来钱花光了，成了无照舞女，跳黑灯舞，坐鸳鸯座，变相卖淫，还经常带客来家，成为暗娼，染上一身性病，一身流气。解放后积习不改，继续在公共场所勾引男性，腐蚀青年，终于进了妇女教养所。

那时宋亚芬三十五六岁，鹅蛋脸，大眼睛，弯眉毛，一口金牙。平时不哭不闹，看见干部走来，便垂着双手，站在一旁，开口满脸堆笑，浑身风骚。特别是见了教养所的少数男干部，更是低着头，扭着腰，眼皮暗转，搔首弄姿。一天午后，别人都在休息，她偷偷地溜到一个搞财务的男干部办公室，露出一口金牙：“我来找您汇报思想……”

“我不是队长，你汇报思想找你们队长去！”这位男干部严正地挥了挥手，把门关上了。

可是宋亚芬并不有所收敛。一见男性过来，便迎上前去，有时轻咳一声，人家看一看她，便飞一个媚眼；有时还故意挨挨挤挤地硬擦着别人身体走过去。姐妹们批评她“不要脸”，叫她“下作坯”，她反而朝人家一个媚笑。1952年9月，以“九条龙”为首的一伙流氓闹事，宋亚芬欣喜若狂，拍手拍脚地大喊：“冲出去啊！冲出去找男人啊！冲出去寻相好啊！”

“九条龙”闹事很快被粉碎了，宋亚芬理所当然地受到了

严正的批评。晚上回到宿舍，她一个人盘着腿，托着脸，似哭似笑，呆坐在床上。坐到半夜，突然一阵狂笑，光着身子冲到院子里怪叫起来……

宋亚芬给关禁闭了。

教养所的干部寻思着，她怎么会这样不知廉耻呢？

一天，教养所给姐妹们上“人格”课。教员在讲台上说：“世界上万事万物中，人是最高贵的。任何东西都可以当作一件物品，一件商品，一件礼品，给人吃，给人用，给人玩，唯有人不能这样。人不是玩物，人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头脑，自己的独立人格。在座的许多姐妹，过去除了肉体上受摧残欺凌以外，最大的不幸是丧失了人格，丧失了人的尊严。”宋亚芬一边听，一边轻蔑地耸耸肩，听完课后，她带着三分疑问和七分挑剔，来到队长办公室，劈头就问：“什么叫人格？”

“人格就是人的尊严，人的权利。譬如说，按自己的心愿嫁一个称心的丈夫，这是一个女人起码的权利，我们姐妹过去就被剥夺了这个权利，你说是吗？”

“我就没有被剥夺，我也明媒正娶地嫁过人。”

“你嫁过几个男人？”

“正式的三个，都是堂堂正正坐轿去的。”

“是些什么人，都是你愿意的吗？怎么没有一个白头偕老？”

“……”

宋亚芬不说话了。愿意？白头偕老？这三个男人有哪一个是她愿意嫁的？有哪一个会同她白头偕老？她十五岁那年，家里穷得揭不开锅，被逼着卖给了比她大三十多岁的地主作小，是她愿意的吗？在地主家两年，她都有身孕了，为了送

人，硬逼着打胎，还没满月就给了那流氓军官，是她愿意的吗？跟军官三年，怀孕之后，说是要保护苗条身段，每次都强迫打胎，又去送给那连话都听不懂的东洋人，是她愿意的吗？然而，这些事还提它作啥？她只知道，她嫁的主子一个比一个有钱，一个比一个威风，有什么愿意不愿意的？做一个女人就是要找一个有财有势的男人，顺他的心，讨他的欢喜，就会要什么有什么，成把的珍珠任自己拣。只有傻瓜才守着没有一点油水的木头疙瘩过一辈子呢。现在，地主、国民党、日本军官都已倒台，共产党得势了，宋亚芬想去讨共产党的喜欢，可他们偏偏软硬不吃。哎，当今世道变了，她那一套吃不开了。而且，她已三十多岁，人老珠黄不值钱了，她宋亚芬再也不能找到一个威风凛凛的主子了。

她叹着气走了。

复杂的经历，糜烂的生活，使宋亚芬从头到脚灌满了“今朝有酒今朝醉”、“有奶便是娘”的人生哲学，要唤醒她的良知，她的廉耻，是多么地不易啊！

从此以后，她收起一身风骚，显出满腹委屈。别人有亲属接见，她举目无亲；别人商量着结婚成家，高高兴兴地出去，她因多次堕胎，恐已不会生育，谁还会要她？她暗暗叹息：当初有那么多钱，要是不滥吃滥用，积下一点多好！或者能生下一个孩子，也算有了精神依靠。现在她无依无靠，无家无业，下半辈子怎么过呀！难道真在教养所了此一生吗？她越发呆了，木了，见老了，常常一个人呆呆地坐上一两个钟头。

队长看透了她的心思，告诉她，女人不是男人的附属品，一个女人要在社会上立足，决不能靠卖弄色相，而要靠自尊自爱，自立自强。不久，折磨了她多年的性病治愈了，在她面前

显出一片曙光。接着，队里正式通知她，根据她欢喜孩子、又会弹风琴的特点，决定调她到托儿所当保育员。

她吃惊了，她这个养不出孩子的“晦气星”，居然可以和这么多孩子在一起生活！她这个被人叫作“下作坯”的女人，居然能去培育祖国的花朵！她的眼珠重新发出了光亮，不过她看到的已不再是成把的珍珠，而是比珍珠更为珍贵、更为可爱的孩子。托儿所有八九十个孩子，小的正在哺乳期，大的快要入小学了，比较混杂，当时正在整顿。她跟着干部分班分室、订制度、编教材忙个不停。忙，填补了自己精神的空虚，显示了生活的价值。她不会带孩子，孩子哭了，她怎么哄也哄不好，还常常把奶糕烧糊，有时忘了换尿布，弄得自己一身尿屎，她全然不管。她一面学，一面说：看我没生孩子的福气，可我有带孩子的福气。她最爱教孩子们唱《阿姨像妈妈……》这支歌曲，她不仅教孩子们唱“阿姨像妈妈”，还让大一点的孩子叫她“妈妈”。一有空，她就为孩子们做鞋缝衣。她喃喃地说，我为孩子们做一件好事，就是为我过去堕胎赎一次罪啊。

所里订出了回家探亲制度，没有家的宋亚芬却一再要求请假外出。干部问她出去干什么，她不肯说，问得急了，她郑重地说：“我以我的人格担保，请假一天，保证准时回来。”说着，当场歪歪扭扭地写下了“宋亚芬以人格担保请假一天”的保证书。干部见她说得真切，给她一天假，谁知宋亚芬出去半天就回来了。她没有上馆子吃饭，也没有去买什么零食，而是抱了一大包玩具回来了。一边分给孩子们，一边说，“五元钱是我第一次用劳动换来的奖金，还有十元是我变卖了妈妈早年给我的一个镯子，这些全是干净钱。把我心爱的东西送给心爱的孩子们，我高兴。”

她终于在天真无邪的孩子们中间发现了自己的纯真和良知，她终于懂得了什么叫自尊自爱、自立自强。她变得年轻热情了。三个月后，宋亚芬被提拔为托儿所班长。从此，她更是积极开动脑筋，为孩子们改善伙食，制作时新衣裳。她编了好多舞蹈节目，自编自导，又教孩子们做各种假面具，举办化装舞会。外宾来参观时，宋亚芬带着孩子们载歌载舞，欢迎来宾。孩子们稚气地唱着跳着，参观者拍着手，照着相，宋亚芬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热泪。

通过一位出所姐妹的介绍，又经过组织调查，年近不惑的宋亚芬遇上了一位理想的对象，出所结婚了。一年多以后，夫妻双双抱着孩子回“娘家”探亲来了。她丈夫欢欢喜喜拿出一大包红蛋分给大家，宋亚芬抱着孩子瞧着、笑着。姐妹们向她道喜，她笑着笑着，一股热泪不禁夺眶而出。她说：“我终于把罪赎回来了。要不是人民政府挽救我，我宋亚芬不知要落到什么地步啊；要不是人民政府治好了我的病，我哪有做妈的福份！现在我总算有了自己的家，有了白头偕老的丈夫，有了孩子。我终于找回了人格，找回了人的尊严，从今往后，我算是个真正的人了！”

她为什么四次自杀

1954年春节刚过，妇女教养所收容了一个黄脸黄牙的暗娼。她怒气冲冲，披头散发，一进门就捶胸顿足，大哭大闹：“我没有犯罪！我要吃饭！你们为什么抓我，为什么不让我活下去啊？”

她叫蔡玉华，二十八岁，可看上去足有四十出头。她大哭

大闹，一味撒泼。工作人员给她讲政策，发衣物，好言相劝带她去宿舍，她把耳朵紧紧捂起来，死活不走。工作人员无可奈何，猛地抓起电话听筒：“再不走，打电话叫警察啦！”

“你打吧！叫警察来吧！往老娘身上开枪吧！老娘不想活了，和你们拚啦！”

就这样，蔡玉华从下午一直闹到夜深，自己也闹累了，放下蚊帐，倒头睡了下去。

谁知半夜三更，同房姐妹匆匆来报：“蔡玉华不见啦！”人们打着电筒四处寻找，她正躬着身急匆匆朝边门奔去呢。

进所头一天就想逃跑，蔡玉华被关进了禁闭室。时隔不久，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她乘人不备，摘下手上的金戒指往嘴里吞……

干部们警觉起来了，这可是个非同寻常的暗娼！一翻档案，她的丈夫沈某是个刚刚逮捕判刑的反革命分子。连沈某在内，蔡玉华先后嫁过四个男人，两个有严重问题，一个是国民党反动军官，一个是反革命分子，还有一个是有妇之夫，政治反动，道德败坏，五毒俱全，对新社会怀有刻骨仇恨。

大多数人主张严加看管，速报材料，送劳改所。理由很简单，妇女教养所是教育受压迫、受摧残的姐妹的。蔡玉华不属此类对象，她不配。

蔡玉华真的不是受压迫受摧残的姐妹吗？不，她心灵上受到的摧残分外地多，她的身世分外地惨。

她出生在浙江兰溪农村一个小康之家，家里有薄田十几亩，父母亲连她三人，按说生活是过得下去的。可她父母的结合是包办婚姻，并无感情可言。她父亲是个农夫，斗大的字不

识一筐。母亲比父亲整整小十岁，念过几年书，长得也很端庄。平时爱看绍兴戏，自己也能哼几句。有人对玉华父亲说：“爱唱戏的女人多半水性杨花，可要提防着点。”他本来夫权思想就重，对妻子说一不二。一听这话，忙把妻子关在家里，别说看戏，连娘家也难得让她回一次。她稍有不服，他就骂，就打。有时她半夜里暗自抽泣，他便把她从床上拉到冷冰冰的地上，边打边骂：“哭什么，想你的野汉子啦？老子今天打死你！”玉华五岁那年，她母亲受不了丈夫的虐待，跟一个青年农民私奔了。

可怜的玉华从小失去了母爱，父亲再娶之后，她成了后母的眼中钉，父亲的出气筒。小玉华跟邻家小孩口角时，对方学着大人的口气，骂她“婊子生的”，“烂货”，“骚货”，倔强的玉华不服，想要申辩时，连大人们也会把她母亲私奔的事，添油加醋地向她编排。她在家里没有温暖，在外面又备受凌辱，日子实在难挨。待到后母生下一个弟弟，玉华更成了家里的奴婢。十三岁那年，玉华一气之下，拿了家里一点钱，独自投奔金华表姨家去了。

表姨不愿收留这“下作种子”，又不忍把孩子重新送回家挨打，便把她荐给一家地主当了小佣人。

玉华在地主家一耽三年。她牢记表姨的告诫：“端人家的碗，服人家的管。到了东家，骂不能还口，打不能还手，无论碰到什么，都得忍耐着点。”可是，随着年岁的增长，这个从小受尽欺凌的姑娘，心底却升起一个越来越强的声音：“我哪一点比人差？凭什么要处处矮人一头？”她期待着，有朝一日能成为一个自由自在的人，不遭打骂，不受欺凌。更为理想的是，能找到一个强有力的男子，把她带到一个天堂般的世界中去……

她的“天堂”与现实距离是如此遥远，而现实却似乎提供了一个一步登天的机会：

一天，玉华带着东家的小孩上街，遇见一个姚老板，是金华街上的殷实富户，他先是连声夸奖玉华长得漂亮，当小佣人可惜了。接着自告奋勇地表示：他有门路让她出去见见大世面，做个摩登女郎。她不懂什么是摩登女郎，姚老板向她解释，摩登女郎就是快活人，成天和上等人一起看看戏，打打牌，叉叉麻将，日脚顶顶开心。玉华问：“做摩登女郎有工钱吗？”姚老板扬扬手上那只嵌宝戒指说：“做得好，一个月就给你一只戒指。”

姚老板的一派花言巧语，使玉华动心了。她鬼迷心窍，一脚踏进了姚老板开的向导社。小佣人被打扮得像个漂亮的公主，再也不用辛辛苦苦带孩子了。一连三天，陪着阔气的男客人看戏打牌，两耳听到的尽是恭维话，有一个客人还真的送了她一只金戒指，她真有说不出的高兴，似乎真的来到了天堂的门口。可是，第四天夜里，这个送戒指客人就闯进了她的房间……

一心想当上等人的蔡玉华竟成了最下贱的娼妓，她彻底失望了。她喝酒、吸烟、抽鸦片，使劲地糟蹋自己。日子一天天过去，她成了金华城里有名的喜怒无常的“辣美人”。

二十岁那年，她结识了一个军官，据说是个团副，戎装毕挺，威风凛凛，相见三天，就攒出一条大黄鱼为她赎身，玉华一下子成了官太太。当她带着侍从，坐着吉普车到表姨家作客时，她是多么得意啊！可是好景不长，不到半年，那“团副”借口部队奉命调防，丢下玉华“太太”扬长而去，杳无音讯。从此她失去了依靠，在谋生乏术的处境下，被迫重操旧业，当了私娼。

才二十出头的蔡玉华，不相信她的命运就这样乖戾，她还要寻找机会。不久，她结识了一位年轻的火车司机曹某，小伙子十分同情她的身世，深深地爱上了她，两情相投，他俩同居了。可是，亲密的日子没过多久，曹某收到父亲拍来的一封急电：“母病危速归”。曹某匆匆起程还乡，谁知这匆匆一别之后却再没见他返回。原来，曹家父母已为儿子订下一门亲事，两老听说儿子在金华城里与“辣美人”相好，便要了个花招，电促曹某回家，提早成亲。曹某不敢违命，只得与“辣美人”断绝往来。

蔡玉华一次次遭到了“爱”的愚弄，变得憔悴了，多情的心也磨得冷酷了。她恨，恨周围的一切，想方设法寻找机会采取报复行动。她施展手段，勾引上了家业颇丰的有妇之夫金某，跟他同进同出，双宿双飞。要金某为她置这置那，百般排场，发誓要把他的家产荡尽，让他的妻子发疯上吊才罢休。金妻得知此事后，带着子女闯进玉华住所，拉回了男人，还把玉华打得三天三夜不能起床。可叹的玉华，本想捉弄别人，结果却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金华城看来耽不下去了。玉华想到上海滩碰碰运气。

蔡玉华养好伤，来到上海，住在一个远房亲戚家。那时上海刚解放，到处张灯结彩，喜气洋洋。在一个偶然的场合，玉华结识了一位风度翩翩的男子。他姓沈，是一名会计师，年纪比她大十多岁，但看来此人学问，有风度，据说尚未结婚。玉华心想机会难逢，就心满意足地做了他的妻子，把全部的爱倾注到会计师身上。为了和会计师厮守在一起，她甚至放弃了上夜校的打算。

苦命的蔡玉华哪里知道，自己把全部身心都交给他的那个“会计师”，原来是个长期作恶的反革命分子。1953年

镇反运动中，被人民政府逮捕法办。这一次次的悲惨遭遇，使蔡玉华除了自叹命薄之外，毫无他法。她何尝不想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女子，可她一嫁再嫁，一再落空，她无限失望，无比愤懑，自暴自弃，再度沦为上海滩上一名暗娼。

人们知道了蔡玉华的身世，也就对她那种种反常举动有所谅解。队里把她从禁闭室领出来，专门安排她与一位身世相仿而觉悟较早的姐妹同住一室，上下铺相处，当她性子上来时，那姐妹总是和颜悦色地好言相劝。“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姐妹俩平时互诉身世，各吐衷肠，讲到辛酸之处，默默地流下了同情之泪。

一天晚饭后，姐妹俩正坐在床沿上谈心，分队长进来了。

“你们真心诚意地把人家当人，而那些玩弄你们的男人为什么一次又一次地欺骗你们呢？”分队长随意地问。

“我们没本事呗！”玉华对管教干部还怀有戒心，没好气地顶了一句，就背转身去。

“玉华说得对，”分队长说，“我们许多姐妹吃亏就吃亏在没有学会做生活的本事。没有一技之长，总以为女人非得靠男人才有好日子过，所以到头来老是受罪。我们女人一定要看重自己，这叫自重。女人也有两只手，同样可以靠劳动过日子，为什么非靠男人不可呢？最近，所里决定挑选十四个姐妹去学织毛巾，你们俩都给选上了，明天就可以去上班，学成后当一名毛巾工人，愿意吗？”

“愿意！”那位姐妹高兴得拍起手来。玉华没有吱声，转过身来瞧了瞧。

第二天，毛巾工场车间主任宣布：新来的十四个姐妹组成

一个班。十二名操作工，任务是织毛巾，每人都有定额；两名预备工，任务是摇大纆子，为操作工提供毛巾纱。玉华听完分工名单，听到和她同进同出的那个姐妹担任操作工，自己却是预备工，心中不悦，脸立刻沉了下来。待到姐妹们全部进入各自的岗位，玉华却不见了。人们四处寻找，发现她躲在车间一角，手里拿着碎玻璃片正要往嘴里送。大家赶紧上去夺下，她又解下裤腰带，使劲往自己脖子上勒，威胁似地大喊：“你们为什么看不起我？不让我当操作工，我就去死！”

车间主任给蔡玉华端上一杯水，严肃地问她：

“你说摇大纆子，当预备工，就是看不起你？”

“……”

“你知道我这个车间主任干什么？你问问那些先来的姐妹，我也是摇大纆子，做预备工。”

蔡玉华将信将疑。上工哨子一吹，车间主任果真和她一样，摇起大纆子来了。一边教她如何摇法，一边告诉她：“工厂是一个整体，织毛巾是流水作业，没有摇大纆子的提供毛巾纱，谁也别想织出毛巾来。毛巾工场有许多工种，操作工、预备工、电工、机修工、勤杂工，缺少哪一种都不成。你瞧瞧这么多姐妹，哪个像你这样寻死觅活的！你现在刚开始学本事，从最基本的摇大纆子开始，有啥不好？”一番话说得玉华口服心服，高高兴兴地学着摇大纆子。

过了几天，队里宣布准许请假外出的姐妹名单，其中没有她的名字。蔡玉华情绪又一次剧烈波动，牙关咬得格格响，脸也发白了。姐妹们请假出去那天，她就开始绝食，谁劝也不听。那个和她同睡上下铺的姐妹把家中带来的糕饼给她吃，她以为是故意气她，夺过糕饼，狠狠地扔在脚下乱踩乱踏。分

队长多次同她谈心，劝她进食，她全然不听，绝食到第五天乘人不备，竟跑到井边，扑通一声跳了下去。

人们七手八脚把她打捞上来，医生满头大汗为她做人工呼吸；分队长为了救她，一脚踏空，踝关节骨折，上着石膏还一拐一拐为她端来一碗热气腾腾的大米粥。看着这一切，蔡玉华羞愧万分，和着泪水一口气把粥喝了下去。

打这以后，蔡玉华变得安静多了。不久，她那最要好的姐妹有了对象，来接她出所结婚。玉华送她离所时，在她耳边说了几句悄悄话。约摸一个月以后，玉华收到了进教养所后的第一封来信。写信人就是那最要好的姐妹。

那是个初秋的晚上，怕热的姐妹们把席子铺在门外水门汀地上乘凉，九点多后，都卷起席子陆续回房了。这时，蔡玉华独自一人留在外面，又一次拿出了那封信细读：“玉华，我给你打听过了，你那个姓沈的，罪行很重，判了十年，已经解到福建劳改去了，你不用再指望他了……”

读着读着，蔡玉华一身冷汗，双眼模糊了。

“不用指望他，那指望谁呢？”“没指望，没指望了！”“人人都有指望，我没有。我活着没指望了！”她喃喃自语，一下子躺倒在凉席上。正好大队长巡夜走过，见她一人睡在地上，怕她着凉，轻轻地拍拍她的肩膀。玉华睁眼一看，见是大队长，就如见了仇人一般，扑上去，狠狠抓住她的衣服，阴沉地吼道：“你们把我送到提篮桥去吧，我要死！你为什么不让我死？”

一阵阵吼声惊醒了早已入睡的姐妹，人们赶来把她拖进房去，她手抓脚踢，死命挣扎，凄惨地大喊：“我没有家！我没有亲人！我要死，我要死啊！”七八个姐妹被她抓破了脸和手，她自己因为用力过度，下巴骨落了下来，大家把她急送第五人

民医院。出院后，她继续大吼大叫，冲到大厨房，见什么往嘴里塞什么，发疯般地狼吞虎咽起来……

看来，玉华这次所受的刺激实在太大了。

蔡玉华进所二年，四次自杀，接二连三地大吼大闹。她的这些反常举动，震动了整个妇女教养所。她那渴望得到爱、得到家庭温暖的凄凉呼喊，震撼着教养所全体干部的心。

是的，她自幼失去母亲，又遭父亲毒打，父母之爱没有了。她上无兄姐，下无弟妹，又没有手足之谊。她嫁过四个男人，却四次遭到遗弃，夫妻之情没有了。这颗破碎的心，到哪儿去寻找慰藉！

教养所专门派人到她家乡了解，打听到她后母已经去世，但生父尚在，还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弟弟，干部向他们说明玉华还在人间，她渴望见到亲人，渴望得到家庭温暖的种种失常举动时，她那六十多岁的老父亲连连打着自己的头说：“是我害苦了我的女儿！”

1956年深秋，蔡玉华的弟弟千里迢迢来上海看望姐姐，接姐姐回家。

他递上满满一篮子姐姐从小最爱吃的家乡蜜橘，告诉她这全是父亲一颗一颗从自家的橘树上采橘下来的。还递上一块崭新的印花蓝布，说那是弟媳连夜赶着织出来，送给姐姐做新衣裳的。

老父亲特地托人代笔写了一封信，嘱她早些回家，高高兴兴地共享天伦之乐。

蔡玉华要回家了。临别那天夜里，她拉着分队长的手依依不舍，欲言又止。分队长一再动问，她才吞吞吐吐地说：“请

分队长在户口迁移证上不要写上‘私娼’两个字。”

“放心吧，”分队长指指她手中金色的蜜橘：“过去的一切让它过去，你往后的前程就像这金色的橘子那样金光灿烂。”

半年以后，蔡玉华给分队长寄来了农业生产合作社颁发给她的金色奖状，她已被评为社里的积极分子。再以后，她又写信给教养所报喜，她有了一位称心如意的丈夫。她所日思夜想的真正的爱情，终于被她找到了。

沉沦四十载 老妓庆新生

在 7513 名被收容的苦难女子中，她是年龄最大、为娼时间最长的一个，1955 年 1 月，她被带进来时已经 51 岁了。从 13 岁开始卖淫，为娼时间竟达 38 年之久。

她叫齐文蓉，有儿子，还有媳妇，儿子愿意赡养，也有能力赡养她。可是，这个年过半百的老妇居然抛弃这一切，在解放后的上海城偷偷摸摸当暗娼，过着凄惨的卖淫生活。这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我们来看看她的全部经历吧。

苏州城里的小美人

1904 年，苏州城里一家姓齐的绸布庄老板，成亲已十年，在年近四十的当口生下一位千金。有人说“姑苏城里出美人”，一点不假，这女孩粉嫩的瓜子脸，白里透红，长长的睫毛下闪烁着一对水灵灵的大眼睛，毕挺的鼻梁下配上一张樱桃小口，相貌着实出众。齐老板夫妇中年喜得千金，自然高兴，为她取名文蓉，从小娇生惯养。说来也巧，自生下这女孩后，绸

布庄生意一年好似一年。亲友们都说，这全是文蓉小姐带来的大吉大利，齐老板夫妇更把她当成了掌上明珠。

其实，老板娘自己就是个美人儿。她原是汉口人，娘家开着一爿饭馆，齐太太从小坐在账柜上掌管财务。坐账台的姑娘总是惹人注目的，何况她又长得俊秀，人们进进出出总要对她看上一眼。那时节齐老板正在汉口地界做掮客生意，三天两头到这家饭馆吃饭谈生意，眉目传情，两人就此结下良缘，汉口饭馆的账柜姑娘跟着丈夫来到了苏州。

绸布庄老板娘眼看自己的女儿长得俊秀，自然十分喜爱。从小为她挑选最好的料子，裁剪时新款式的服装，把她打扮得像小天使一般。文蓉六七岁时，母女俩便常常雇着一辆黄包车，招摇过市，领受着过往行人艳羡的眼色和啧啧的赞美声。七岁那年，齐老板把女儿送进苏州一所小学堂，可文蓉不喜读书，只爱跟一班男女同学打打闹闹，还常常缠着母亲带同学一起兜风，齐太太自然百依百顺。

然而好景不长，文蓉十岁那年，齐老板的绸布庄亏本倒闭，老板娘又得了伤寒症，一病不起，于是，小文蓉的境遇顿时一落千丈。次年，齐老板不得不把爱女送到汉口，投靠外婆家生活。

小文蓉的外婆年老多病，舅舅忙于店务。到了汉口之后，文蓉已不再上学，生活更加散漫。从小养成兜风玩乐的她，吃了饭干脆在马路上闲逛，常常逛到天黑才回家。

有一天，直到深夜文蓉还没有回家，外婆焦急万分，合家四处寻找，杳无踪迹。外婆点上火烛，在观音菩萨面前跪了又拜，拜了又跪，祈求菩萨保佑没娘的外孙女早日回家。然而，文蓉再也回不来了。

汉口堂子 一代名妓

文蓉的外婆家有个邻居，人称“李妈”，特别喜欢文蓉。当文蓉第一次到李妈家玩时，她便亲亲热热地搂着文蓉问长问短：“读过《红楼梦》吗？”小文蓉说：“没有。”于是，李妈就细声细气地把林黛玉的故事讲给她听。她说，林妹妹也是个苏州姑娘，和你一样小小年纪死了亲娘，投靠外婆家，你们俩一样是苦命人啊！可你比林黛玉长得标致，命也更苦。说着又拿出手绢擦泪，说得小文蓉心里热乎乎的，李妈拿出糖果给她吃，时而还买上戏票，带她坐上黄包车出去看戏。在小文蓉的眼里，这位热心的李妈比外婆更疼她，她也把李妈当作第二个亲娘看待，有时干脆叫起“妈妈”来了。

一天，李妈家来了个打扮入时的贵妇人。文蓉刚好去玩，进门就被李妈一把拉过去向客人介绍：“你看，我的女儿比林姑娘还漂亮吧！”一面让文蓉叫“张姨”，一面就眼泪汪汪地对客人诉说起文蓉的身世来。

客人摆出一副慈祥和蔼的姿态，边赞叹，边安慰：

“别难过，好孩子，妈妈死了，有李妈妈疼你，张姨也疼你。走，我们上馆子吃饭去！”

就这样，十三岁的小文蓉乖乖地跟着张姨上饭店吃饭，去糖果店买糖。有一天，张姨说要带她到戏院看戏，文蓉跟着去了。那“戏院”说来古怪，两开间的一幢三进房屋，里面有好多小房间，全布置得花花绿绿，有十多个年青姑娘在室内来来往往，张姨教文蓉称她们“姐姐”。

“张姨，今晚看什么戏啊？”文蓉问。

“看戏？这孩子！我啥时候说过看戏？我是说带你来学唱

戏。像你这么漂亮的姑娘，学会唱戏，一上场准是名角儿。到那时要什么有什么。快，到里面去打扮打扮！”说着，一个女人把她带进里间，替她涂脂抹粉，烫头发，穿上花绸衣，脚蹬高跟鞋。紧接着又教她学扭腰迈步，弹琴唱曲。天真的文蓉真以为是在学唱戏呢。哪里知道这原来是一场大骗局！表面上面善心恶的“张姨”，其实是个人贩子，她跟李妈串通，把文蓉卖给了汉口一家长三堂子“惜春”。从那天起，小文蓉一脚跌进了火坑。不久，一个富商用三根“小黄鱼”认文蓉作了“过房囡”。十三岁的孩子，哪里想到“过房爷”会用禽兽般的行为糟贱“过房囡”！她想哭喊，声音太细；她想反抗，力气太小。懵懵懂懂的孩子，懵懵懂懂地认命了。

“过房爷”有的是钱，绫罗绸缎，金银首饰，替文蓉买了一身又一身，添了一件又一件。文蓉喜欢坐车兜风，他干脆包了一部汽车，把这小东西搞得神魂颠倒。堂子老板给她起了个艺名叫“春红”，一到夜间，霓虹灯广告映着春红娇媚的放大照片，勾引着汉口城里的游手好闲之徒，蜂涌而至。一时间，小小的春红成了汉口堂子里的一代名妓。

曹二爷买作小妾 宋子文金屋藏娇

文蓉十九岁那年，汉口城里来了个有财有势的曹二爷，他便是北洋军阀首领曹锟之弟曹某。那一年（1923年），曹锟以五千金元一票的价格，收买国会议员590人，当上了“大总统”。俗话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曹二爷自然更加不可一世。年近五十的曹二爷在汉口打听得春红的“艳名”，立刻派人去“请”。回说姑娘身子不适，又亲自上门问病。谁知正碰上春红与一个青年军官打得火热。曹二爷一见怒火中烧，回

到寓所，一个电话把那军官打发走了。原来这春红一见那军官就产生了感情，暗订终身。她厌倦了灯红酒绿的卖笑生涯，沉浸在青年军官的绵绵情意之中。为了他，她回绝了所有玩客，一心想过两个月清静悠闲的生活，然后正式作他的妻子。

可是不到半个月，她所钟爱的青年军官竟突然离她而去了。没有一个电话，没有一句口信，没有留下一件信物，简直使她难以理解。春红真的病了，不吃不喝，整天以泪洗面。

忽然有一天，曹二爷自掀帘子进门了。他装出一副彬彬有礼的模样，吹嘘自己的权势。然后轻声细语向春红问寒问暖。他说，他已打听到那军官的下落，为了春红，他一定运用他的权势，让他早日返回，玉成她俩的好事。

开始几天，春红将信将疑。慢慢地觉得曹二爷出手大方，一会儿送她几克拉的大钻戒，一会儿陪她坐华丽的小轿车，吃喝玩乐，倒也开心。再想想他是“大总统”的老弟，更激起了她的虚荣心。为了无止境地追求物质享受，她心甘情愿做曹二爷的姨太太。那时她刚满十九岁，当上了曹老二的姨太太，自以为成了“皇后”！家里要什么有什么，看戏叉麻将将是生活的主要内容，请客赴宴是自我炫耀的最好时机。她疯狂地享受，尽情地挥霍。她学会了各种媚态，成了汉口“上流社会”最耀眼的女人。

曹锟的“贿选总统”当了不到一年，就被囚禁。接着，荒淫无度的曹二爷在汉口一命呜呼。作为曹二爷的姨太太的齐文蓉，再次以春红姑娘的名字回到惜春堂子。她见过大世面，学会了一套诱惑异性的手段，在交际场中鬼混。她所结交的全是富商权贵和反动官场中的人物。有一次，当地官场大开宴席，

请一位贵人，指名要春红姑娘去唱戏陪席。她被带到“贵人”跟前，颇受赏识。原来那“贵人”就是国民党财政部长宋子文。1926年，她被宋子文带到上海，住进了宋子文专门为她买下的小公馆。

重返会乐里 合伙当老鸨

宋子文把文蓉送进公馆后，开始还常到她那儿消遣消遣，以后就借口“赴京公干”或“出国访问”，把她冷落在一边。在旧社会，像宋子文这样的逢场作戏本不足为奇，可齐文蓉却过不惯那种金屋藏娇的寂寞生活。她要吃喝玩乐，她要过放荡不羁的生活。眼看宋子文不来管她，她便经常带些客人来唱曲、叉麻将、过夜。久而久之，那公馆成了行乐场，齐文蓉又俨然成了交际花。1937年抗战爆发，宋子文与三十三岁的齐文蓉彻底断了关系，断了供给。当她与宋子文这个大靠山告吹不久，便和一个阔佬逃往香港，过起花天酒地的日子来。

那阔佬一到香港，很快又迷上了比文蓉更年轻、更美貌的女子。齐文蓉一气之下，卷带一笔钱又跑回上海，闯进了会乐里。半辈子的漂泊浪荡，一而再、再而三的受人玩弄欺骗，使齐文蓉变得更怪僻，更自私，更玩世不恭。她要玩乐，她要不择手段挣钱，她要把尽可能勾引到的男人拖下水，以图报复，发泄胸中之恨。一到会乐里，她就和一个叫“林妹妹”的老妓女共同商量，租一幢房子开妓院。通过人贩子买几个小女孩充当妓女，帮她们挣钱，她自己则既当老鸨，又当妓女亲自接客。

文蓉有一个儿子，跟着母姓齐，这孩子从小看不惯母亲的所作所为，特别是在上学读书以后，每当放学回家，总要向母

亲发一通脾气：“你还干这个，叫我在学校怎么做人！”

“不干这个，吃的、用的、穿的、戴的，你上学的学费、车钱，这一大笔花销从哪里来？”

日子久了，齐文蓉被儿子吵得心烦，干脆让他住读。中学毕业后，又草草为他娶了媳妇，远远住开了事。

上海解放以后，人民政府发出布告要取缔娼妓。此时齐文蓉已步入老年，理应革心洗面，重做新人，可是，过惯了三十多年不劳而获生活的她，并没有回心转意。表面上她关闭了妓院，背地里却又转入地下，经常去咖啡馆、游乐场搭客，带回家中卖淫。直到被邻居揭发，公安部门把她送进了教养所。

一生遭冷眼 晚年得温暖

齐文蓉毕竟是一个老油子，进所后不哭不闹，彬彬有礼地向审查干部一鞠躬：“我有罪，我曾经危害过社会，危害过人民，但我早已改邪归正了，请同志调查……”

“证据确凿，公安局才收容你的。”

“这是邻居捏造的……”嘴里虽然这么说，心中可着实有点发慌，她还是乖乖地跟着工作人员进了大队。她知道自己的历史复杂，当过妓女，还当过老鸨，因而不敢过份强横。她早就听说，前两年有的老鸨、妓院主被抓到这里来批斗，后来经过公审被枪毙了的。

教养所里有一个花园，四周围着整齐的冬青，里面布置成各种图案的花坛，时值寒冬，红梅盛开。齐文蓉进所后，见没人禁止她自由活动，便独自徘徊在花园里，从这边踱到那边，从那边踱到这边。时而拿着一本书，故意高声朗读，时而吊嗓子唱京戏，时而默默地呆坐一旁若有所思。教养所里的姐妹

们见此情景，私下里纷纷议论开了。

“听说新来一个老太婆，来头不小啊，每天在花园里煞有介事地做作，像个神经病。”

“走，看看去！”

散工后，姐妹们向花园涌去，像看猴戏似的。

“喂，你叫什么名字？家住哪里？”

齐文蓉连眼皮也不抬一抬，仍旧搓着手，摇着脑袋读她的书。在她的眼里，这些人不值得她启口。

她是在用读书、唱戏掩饰内心的慌张，等待着不知哪一天会落到她头上的严厉惩罚。

等呀，等呀！却等来了一位白衣护士，通知她去医务室检查身体。

她一边让护士给她抽血，一边若无其事地说：“我过去有私人医生，各方面都保养得很好，我不会有病，用不着费心了。”护士向她笑了笑，“抽血检查性病是所里的制度……”“检查性病？太可笑了，你们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我会有性病？”

经过血液培养化验，医生又把她找去，告诉她：“齐文蓉，你染上了性病。”

“不要瞎说，这不可能。我过去是有地位的人。早就告诉过你们，我有私人医生。”

“久闻了。可解放后这几年你干了些什么？”

“反正我不信，这是圈套，你们用‘性病’坑害我，我不承认是妓女。我不治疗！”

医务人员要她相信科学。并严正地告诉她，收容人员不治好性病是不准出所的。齐文蓉一听楞住了。她痴痴呆呆地想

了一会，忽而转忧为喜。“这么说，像我这样的人，将来也还有可能被放出去啊！”“可我出去以后又能干点什么呢？”心中患得患失，可她没说什么，开始老实地接受治疗。

在治病过程中，她了解到在教养所里，像她这样同反动统治阶级的上层分子打过交道的不止她一人，她们中也有人改造好了，有回家的，也有介绍就业的。她的心头开始闪现出一线光明。

病治好了。齐文蓉想，“这下子上面可要来点辣的了。”果然，她被找去。工作干部对她进行了一场严肃的谈话，把她的老底一五一十全都抖了出来，最后说：“你做过不少坏事、丑事。但是说到底，你还是个受害者。是旧社会害得你幼年丧母，是旧社会把你骗进娼门，使你失去了幸福，但是，只要你改造得好，完全可以有个幸福的晚年。”说着，递给她一封她儿子的来信。听着听着，她的两眼开始湿润起来。她用颤抖的双手接过信来，怀着惊讶不安的心情默默展读起来。

妈妈，抚养我长大的妈妈！我知道你为我花费了许多心血，可是，每当别人问我，听说你妈妈在上海，怎么不跟你住在一起，我怎么回答？你的孙子已会叫奶奶了，他常问我，奶奶什么时候来看我，我又该怎么回答？

妈妈！我多么希望，我能有个值得自豪的、和我同住在一起的妈妈啊！

齐文蓉被儿子的信深深地刺痛了。

教养所在分配劳动时，考虑到她年老体弱，安排她在棉花工场整理包皮袋。这活儿轻，但灰尘大，这样的活对她的改造有好处，她接受了。使她感受最深的，是所里几次安排她出

外参观，让她看看过去的娱乐场所，看看解放后里弄里的变化，原来的卖淫场所变了样。她明白如果要想重操旧业已是幻想。她羡慕那些白天参加工作、晚上抱儿抱孙的里弄大姐。

人，谁不想有个温暖的家！她进所将近两年，从未有亲人来看望过她。可是，她连做梦也未想到，她的儿子、媳妇带着孙子一起看她来了。看到她穿着一身工装衣裤，儿子和媳妇欣慰地笑了。她掸掸身上的灰尘，也不好意思地笑了。

从此，齐文蓉对人变得真诚坦率了，劳动积极性也高了。一天的定额半天就能完成（她的定额本来就低），她主动要求增加定额。所里根据她的年龄，完成劳动定额后让她抄抄记记、写写黑板报。在这期间，她写了好多日记，忏悔自己的过去。

经过两年多的学习改造，齐文蓉变了。完完全全地变了。她从旧社会没落阶级的牺牲品变成了能够劳动、能过正常生活的人。她从十三岁开始就失去了家庭温暖，四十年后终于又重新回到了自己家人的身边。她高高兴兴地跟着儿子、媳妇，抱着小孙子，向教养所的工作同志们和日夜相处的姐妹们依依告别，回到了自己的家。

她使马小彦堕落 又随马小彦奋起

1955年，上海各报曾刊登过一则十八岁中学生马小彦受流氓阿飞勾引，走上犯罪道路的通讯报道，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震动。

马小彦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美国留学生，母亲毕业于光华大学，是一家私营厂的厂长。马小彦自幼聪敏好

学，常常受到家长和学校老师的表扬。可是由于过分宠爱，缺少应有的管教，终于逐步走上了犯罪的道路。自从他结识了大流氓周瑞富以后，不仅把家里的地毯、汽车轮胎、电扇、银餐具，统统送上了赌台，而且和流氓一起，拦路抢劫，调戏妇女，嫖妓宿娼，简直是无恶不作。马小彦案件一时轰动上海，许多中老年人至今还是记忆犹新。

把马小彦拖下水的罪魁祸首是大流氓周瑞富；而周瑞富手中则掌握着一枚诱饵，他用这诱饵把年纪轻轻的马小彦牢牢缠住，这诱饵就是金宝宝。

1955年2月1日的《解放日报》上有这样一段记载：

大路舞厅，淫靡的音乐在混浊的空气中荡漾，马小彦又和周瑞富一帮流氓坐在一张台子上来了。……帷屏一动，一个漂亮的姑娘探进头来，眼睛向四面张望，像寻找什么人似的。

“这个妹妹蛮灵，喊她进来跳舞好吗？”

“你认识她吗？”

“不用管，只要你乐意……”

姑娘叫金宝宝，舞跳得真好，马小彦和她从上午一直跳到黄昏，想回家吃晚饭了。

“小弟，怎么不识相？第一次见面……走，上馆子聚聚去！”

马小彦身不由己地跟着金宝宝，吃喝以后，又一起荡马路，荡到孟渊旅社门口——

“我回去了。”马小彦迟疑地停住脚。

“上去，上去，花了钱不玩玩，洋盘！”

“……”

“孺种，怕什么！”周瑞富拉着他，就这样，马小彦和金宝宝一齐走进了旅馆。

第二天，周瑞富便怂恿金宝宝拉马小彦去开房间。马小彦毕竟

还只有十几岁，想起昨晚一幕，好似做了一场恶梦，吓得跪下来求宝宝。

周瑞富从另一扇门进来了。

“你玩了十六岁姑娘就想不管啦！金宝宝的娘要告你了……”

周瑞富使出了威吓手段，马小彦又一次陷进了魔窟。

这个金宝宝，在马小彦案发的第二年，也进了妇女教养所。她不仅害了马小彦，还害过许多像马小彦一样的青年。可是，就像马小彦是从受害者变成了罪犯一样，金宝宝自己也曾是个受害者。

她出生在一个小康之家，自幼聪敏伶俐，眉目清秀，一对含笑的酒涡，说起话来清脆动人。金宝宝是学校里的一个活跃分子，上台朗诵、唱歌、演话剧，都少不了她。学习成绩也不错，能写一手秀丽的钢笔楷书。家里人疼她，老师也喜欢她，读到初中二年级，已是学校里的一支“校花”了。

活泼好动的金宝宝，常常与几个同学到溜冰场去溜冰。一天，在延安溜冰场碰到一个温文尔雅的青年，他很有礼貌地同她攀谈，还以同路之便送她回家。从此，金宝宝一到溜冰场，那青年就掏钱为她买票，两人一起溜冰跳舞，一起在月光下漫步回家。宝宝怎么也没想到，这个文质彬彬的青年，竟是大流氓周瑞富的头号弟子施某某（后来判了十年徒刑）。

金宝宝结识了施某某，也就陷入了周瑞富的罗网。

说起周瑞富，50年代住在虹口一带的人几乎无人不知晓。他绰号“财虎”，解放前拜过流氓头子“独臂财宝”为老头子，当过银元贩子，还倒卖火车票，赌假牌。解放后，又做戏票黄牛。后来公安局查得严了，就和一批流氓打手收买几个

青年女子，专门勾引小开，勾引上了就“敲”一大笔“竹杠”。“五层楼”“大都会”“四姐妹”等处的酒家舞厅，是他们经常出没的场所。

一天晚上，施某某挽着金宝宝踏进“五层楼”，只见一个三十开外的男子，舞步潇洒，引得舞厅里的女子频频回首：“哟，好一个舞会王子！”谁都以能作他的舞伴为荣，可那男子跳了一回，却向金宝宝走来，施某某一把推她过去：“去跟王子跳跳吧，他叫周瑞富，和他跳舞才是真正的享受呢。”

金宝宝踏着轻快的舞步，听着他甜蜜的赞语：“你是我见过的姑娘中最漂亮的一个。”不由她整个身心都陶醉了。夜深跳乏了，周瑞富请客，一桌丰盛的夜宵。十五岁的金宝宝第一次喝醉了酒，终于成了周瑞富的猎物。

金宝宝不是没有苦恼，但是纸醉金迷的诱惑压倒了羞恶之心，还是个中学生的她。穿上了小裤脚管，做起了时新奇特的发式，每天玩到深更半夜才回家，早上睡懒觉，上课天天迟到。老师见她与从前大不一样，心中不免有些担忧，劝她把头发梳平，换掉小裤脚管，今后别再迟到。可她只当耳边风，一句也听不进，反而在教室里拿出镜子，当着老师的面把头发梳得更高。以后发展到经常旷课，白天装病睡大觉，接着就干脆不上学了。她母亲没有办法，趁她睡觉的时候把门反锁起来。她住的亭子间窗子对着弄堂，只要听到弄堂里口哨一响，马上从窗口用绳子吊着爬下去跑掉，家里的人也找不到她。可怜作父母的哪里知道自已的爱女深深陷入了大流氓的圈套！她成了周瑞富收买的女子中最年轻、最漂亮的一个，把她“保护”起来当摇钱树，去勾引花花公子，陪着他们跳舞，溜冰，吃酒，看戏，开旅馆过夜。这些花花公子钱用完了，就去偷，从家里

的钱偷起，直到别人的财物，只要能到手的样样都偷。他们成群结队，有钱时大吃大喝，没钱时甚至撬开人家的牛奶箱偷牛奶喝。他们经常出入“大路沙龙”“高士满”“四姐妹”“大都会”等舞厅，起哄打架，连酒家舞厅的老板也怕他们三分，附近老百姓称这些场所为“飞机场”（“阿飞”成群之意），没到天黑就裹足不前。许多市民写信给报社和政府机关，要求严肃处理。

1954年7月，为非作歹的周瑞富一伙十三名流氓终于落入法网，被人民法院依法判刑。大流氓周瑞富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刚满十八岁的马小彦判刑三年，到鹰厦铁路工地劳动改造。十七岁的金宝宝和一批地下舞女被妇女教养所收容了。

这些长期过惯放荡生活的女阿飞，进所以以后若无其事，吃吃晒晒，哼哼唱唱，东游西荡不服管教，还发牢骚说怪话吵着要出去。三天两头写信给自己的“相好”讨吃的。

在收容教养的过程中，所里的干部们通过长期观察，发现金宝宝进所以后的性格、情绪、举止都与其他流氓阿飞很不相同。她一副学生装束，齐耳短发，冷天青年装，热天西装短裤、白跑鞋，衬衫领扣扣得紧紧的，对人彬彬有礼，从不口吐粗话。将近一年，她没有给家里和其他人写过一封信，也没有人来看望她或带东西给她。但是，所里的女阿飞大多认识她，有好吃的都分一点给她，碰到什么疑难都和她商量。她聪敏伶俐，又有文化，时常帮别人写信、出主意，人家也很感激她。因此，她对姐妹们的思想举动了解很多，谁想逃跑，谁在与流氓、嫖客继续联系她也大体有数；但她只是把这些藏在心里，从不向干部反映。

她的工作岗位是袜工场的收发员，有很多机会可外出买

东西、传信作，但她从不做这些事，看上去本份守法。听形势报告时她认真记录，有时默默沉思，若有所悟，但在小组讨论时却从不发言。

她看不起那些在马路上拉客的“野鸡”。在她心目中，那些“野鸡”为了几个钱到马路上去拉客太低贱了。她认为自己的手段比起这些“野鸡”来要高明得多。她主张人要享受，但不愿为图享受而去求别人。照她自己的话说，“要让人家来求你，才算是真正的享受。”几年来的流氓生涯使她把社会看成漆黑一团。她背地里对姐妹们说：“奸刁人享富贵，正直人受欺侮。”为了贪图享受，她可以不择手段。“钞票是跟手段来的，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良心卖几钱一斤？”这些话成了她的口头禅。

怎样打开她的心灵窗户，改变她那一套没落阶级的人生哲学，成了所里工作人员共同思考的大问题。

周瑞富被处决，马小彦被判刑的消息见报了，教养所干部拿给她看，要她联系自己认真阅读。她强作镇静，辩解说报上提到的金宝宝不是她，她也根本不认识马小彦。随后，一篇篇关于大流氓周瑞富如何施展哄、吓、拐、骗种种手段，把马小彦、金宝宝等一个个好青年拉下水的详尽报道纷纷见报，其中包括学校、家长、社会各界对这一案件的反映，她读着读着，“哇”的一声哭出来了。

干部们劝慰她：你是一个受害者，只要好好改造自己，相信政府相信党，今后还有美好的前途。她点点头，咬咬嘴唇。开始写信给母亲，承认自己失足。母亲带着弟弟哭着来看她，她却没有任何眼泪。

她开始回答干部的问话，但很少谈思想。工作态度则越

来越积极，常常干得满头大汗，但就是不见笑容，空下来老是一个人怔怔地坐着。她本来跳舞跳得很好，现在即使碰上节日舞会也很少参加。

1956年7月21日，《中国青年报》刊登了马小彦在鹰厦铁路工地立功的消息。报道说，马小彦在劳动中处处带头，有良好表现，还自学俄文，立了三等功。共青团上海市委、民主青年联合会写信给马小彦，祝贺他新生命的良好开端。信中称呼他“亲爱的马小彦”，热情向他指出：“在我们的社会里，犯过错误的青年不要一蹶不振，悲观失望，处处低头；时时流泪；应该满怀信心地克服缺点，继续勇敢前进。教训是从错误中总结出来的，任何人的进步必将受到各方面的欢迎与扶持。”马小彦在激动之余，写信给父母道：“这次立功是我劳动的结果，我很宝贵它，我一定把它发扬下去，等着我的好消息吧。”

好消息果真来了。1956年10月，马小彦被提前释放，安排到上海第二纺机厂当艺徒，带马小彦的师傅是厂里一位先进生产者。马小彦上工前，共青团上海市委书记李琦涛特地去看望他，勉励他努力学习，争取进步。

这一连串的报道像一股股和煦的春风，使金宝宝的内心受到激荡。

小组读报时，金宝宝表面上仍是不露声色，背地里却独自拿着报纸，边读边流泪。分队长看出了她的心事，轻轻地走进房间，深情地对她说：“哭吧，痛痛快快地哭出声来吧！年纪轻轻的再闷下去，要闷出病来的。”

“分队长，我对不起你啊。”金宝宝回过头来，像个泪人儿似的，一边哭，一边忏悔：“我害了马小彦！他头一次打群架，已经关了半年。出来后，他曾咬破手指，写下血书，保证重新做

人；可是，周瑞富跑去对他说，‘五层楼’的妹妹等着你呢。马小彦经不住我的引诱，又干坏事了。是我害得他二次被捕，外出改造，我自己也被收容。我总觉得这是我应得的报应。尽管您一再开导我，要我联系思想，好好学习，争取好前途，可我一再当作耳边风。我想，共产党能把别人教育好，但总不能把我这样全国出名的坏人教育好吧。想想自己年纪轻轻，难道就这样一辈子老死在这里？！我越想越恼，我恨政府，恨你们干部。我真没有想到，共产党说话算数，居然把马小彦教育好了。他马小彦能立功赎罪，提前释放，当上了工人，我为什么就不能改造好，争取个好前途？”

从此以后，金宝宝真的像变了一个人。她不再消沉，不再流泪，性情也开朗了，队里经常可以听到她的琴声、歌声，黑板报上登出了她的文章，碰到节日舞会，她也跟别的姐妹一起翩翩起舞了。

不久，教养所完成了历史使命，姐妹们有的进厂当了工人，有的到农村务农，有的回家与亲人团聚。金宝宝本来有家可回，但她选择了参加建设大西北的光明大道，跟着所里的干部和翻身姐妹踏上了征程。几年之后，她成了西北某地一家针织厂的会计师。她曾写信、寄照片给帮助过她的分队长，说她对目前所担任的工作感到自豪，而且已经找到了一位如意郎君，生活过得很美满。

逃跑十二次 一朝喜回头

1955年秋天，黄浦公安分局治安科一辆吉普车开到妇女教养所，里面坐着刚被收容的一名私娼。

她慢慢跨出车门，神情漠然地走进教养所办公室。她面前那位女干部正待询问，这个私娼突然倒地一滚，两眼发白，佯装死去……

年青的女干部虽只二十多岁，但她已同收容人员打了四年交道，对于如何对付教养对象的各种花招，经验着实丰富。只见她镇定自若地拿起话筒，通知医务室：

“这里有人昏倒了，送点阿摩尼亚来！”

那私娼受不了阿摩尼亚的刺人味，只好乖乖地站起来，听候女干部的询问：

“你叫什么名字？”

“殷秀春。”

“今年几岁？”

“二十四岁。”

“原籍？”

“上海。”

“住址？”

“没有固定住址，借住在小姐妹家中。”

“做了几年‘生意’（指卖淫勾当）？”

“刚刚开始。”

她回答得不慌不忙，可大半都是撒谎。根据公安部门提供的材料，殷秀春是苏北一个地主的女儿，在上海有一间专供卖淫的房间，已经鬼混四年了。

殷秀春被送进了管教大队^①。

殷秀春，高高的个子，微黑的脸，身体素质很好。来到管

^① 新收容的人员送管教大队。待情况基本审查清楚后，再根据具体条件分别送各劳动大队。

教大队后，她每天抢着为大家扛饭、挑水，不到一个月，教养所内的地形她全记熟了。一天，她利用到大厨房扛饭的机会，偷偷从厨房后墙翻了出去，逃之夭夭。

过了一星期，她被嵩山公安分局治安科送回。这次，她的态度“老实”多了。怕关禁闭，怕送“提篮桥”，只得点头哈腰，满嘴认错。

回到管教大队，开始两天她规规矩矩，处处火烛小心。过了一阵子，她感到干部并没有特别注意她，又渐渐地活跃起来。她拉拢了一个与她搭挡劳动的谢金月，两人一起串通好，趁着去厨房扛洗脚水的机会，双双翻墙逃跑了。

第三天晚上，谢金月正在西藏中路皇后大戏院（今和平电影院）门口搭客，被前去执行任务的教养所干部当场捉住，送回所内。

谢金月痛哭流涕交代说，她是受了殷秀春的唆使才逃跑的。殷秀春多次同她讲：“外面生意很好做，要想法子逃出去。政府把我们这号人都捉了进来，外面那些白相人找不到户头，我们正好趁这个机会逃出去赚一笔大钱，然后到外码头好好玩乐。”殷秀春还指使谢，逃出去以后两人先分手干，过几天等风声一过，再在先施乐园碰头，然后搭挡去做大生意。

教养所派了两名干部在先施乐园守候，一连三个晚上毫无动静。直到第四天晚上九点来钟，果然看见殷秀春打扮得花枝招展，右手勾着一个男人的膀子，嘻嘻哈哈走了进来。她一扭头正好碰上两位干部锐利的目光，她狠狠瞪了瞪眼，情知滑不过去，只好甩开男人，阴沉着脸跟干部回到了教养所。

工作人员看到殷秀春进所才一月，已经逃跑两次，不得不对她的行动加以限制。明确地告诉她，无事不得到大队院子

以外乱走。

可她得意洋洋，丝毫不知羞愧。队长指定两个觉悟较高的姐妹帮助她，让她在宿舍写检查，她却躺在床上悠然自得地唱唱越剧、滩黄，哼哼流行歌曲，有时还来几句黄色小调。一有机会，就宣扬她那一套“白相经”：溜冰呀，喝咖啡呀，鸳鸯座呀，跳黑灯舞呀……表示对种种糜烂生活的留恋。她估计到自己逃不出去，就拚命唆使别人逃跑。在她的鼓动下，确实又有几个人陆续逃跑了。

一天半夜，殷秀春突然大喊大叫“肚子痛”，一边嚷嚷，一边在地上打滚。分队长起身陪她去医务室治病。医生替她作了初步检查，还要替她抽血化验。正当值班医生进去拿抽血器械时，她却趁人不备，越过医务室后面的矮墙逃跑了。

殷秀春每逃跑一次，教养所就对她加强管教一次。检查写过，集体帮助帮过，“禁闭”关过，凡是教养所能采取的管教手段都采取过，但都无济于事。她一次次变换着手法逃跑，却又一次次被抓回来。就这样，从1955年秋天到1956年上半年，她要尽花招先后逃跑过十二次，也被工作人员抓回来十二次。

殷秀春多次逃跑，屡教不改，人们要求对她从严惩处的呼声越来越高。是的，从她的出身和进所后的表现来看，完全可以送去强制劳改。像她这样一个私娼，被送进教养所不到一年，竟连续逃跑十二次，逃跑出去后又总是重操旧业，此人不送强劳，谁送强劳！

但是，教养所的工作人员在分析问题和处理问题时，一向持谨慎态度，尤其是在教育人、改造人的问题上，总要认真考虑是否符合党的方针政策，决不草率从事。

教养所的干部认为，即使要把殷秀春送去强劳，也要对她的全部历史和思想演变的脉络了解清楚。因为她毕竟还只有二十四岁，还有长长的未来，即使送去劳改，党和政府还是要让她走上自新之路的。

通过细致的调查分析，与人为善、不加歧视的促膝谈心，人们终于弄清了殷秀春的身世，弄清了她的“顽固不化”的前因后果。

殷秀春的地主父亲是个花天酒地、醉生梦死的浪荡子，先后讨过三个老婆。大老婆是地主的女儿，结婚后不会生育，所以又讨了一个农民的女儿作偏房，这就是殷秀春的生母。后来，这个地主又从扬州的堂子里赎出一名妓女作为他的三姨太。这三姨太面盘长得标致，过门后为他生了个男孩，所以深得地主欢心。自从三姨太一进门，殷秀春的生母就开始失宠，她在大老婆的虐待和三姨太的排挤下感到无法忍受，一气之下，竟上吊自杀了。当时秀春还只有十三岁，自从亲生母亲一死，就再没有人疼爱她了。

不久，大老婆病死，地主带着三姨太母子和秀春一起来到上海，在建国路上买了一幢房子，做起寓公来。上海是个花花世界，秀春的父亲本来是个浪荡子，这下更是如鱼得水，他结交了一批酒肉朋友，在家又麻将、打沙蟹，出外寻花问柳，吸鸦片，哪里还顾得上花钱供秀春上中学。上海解放那年，秀春十八岁，农村实行土地改革，地主父亲不能再靠收租剥削为生，私下里变卖黄金首饰继续吸毒，不久也就一命呜呼。

秀春父亲一死，继母就把房子卖掉，只留下一个小小亭子间，然后把家中剩下的一点财物收拾停当，冷冰冰地对秀春说：“你父亲一死，我没钱养活你。反正你已长大成人，可以自

己想办法过日子。”说完，带着弟弟和家中财物扬长而去。

这一年，殷秀春已十九岁，又多少读过几年书，按说她可以到失业登记处登记要求做工，自食其力了。可她没有。她从懂事起就生活在不劳而获的剥削家庭里，自己不会劳动，也瞧不起劳动人民。她清清楚楚地记得，在这个家庭里，母亲是唯一能劳动干活的人，所有洗衣、挑水、喂猪等苦差使都由她包了，可她过的日子最苦，下场也最惨。而大娘和三姨太百事不干，反而过得舒适。特别是后娘三姨太，她是堂子里出身，啥事也不能干，单凭漂亮的脸蛋，照样嫁给了像爸爸这样的财主，日子过得比苦命的妈妈好上千百倍。考虑来考虑去，她还是不愿意走劳动就业之路，她想，凭着自己的年轻美貌，兴许能找个好丈夫。

就这样，殷秀春成天忙于轧朋友，找对象。起初只是叫人请客吃吃喝喝，骗几张钞票外出玩乐；后来发展到干脆把男人带回家中胡来，或是去外面旅馆开房间淫乐。为了贪图享受，她不顾廉耻，不择手段，学会了各种各样的花招，把她勾引到手的一个个男人身上的钱骗得精光。就这样，她在外面鬼混了整整四个年头，直至被收容进教养所。

殷秀春在叙述她自己的身世时，一点也没有意识到卖淫是件可耻的事。在她看来，这比做工、种田、卖苦力要惬意得多。

她就是这样自甘堕落。

殷秀春的堕落，她自己固然负有很大责任，但是，导致她走上歧途的种种外来因素也不容忽视。道德败坏的父母，乌烟瘴气的家庭环境，以及旧社会残留下来的不良风气等等都有可能导致少数意志不坚者的堕落。

殷秀春是自甘堕落的典型，是多次逃跑的典型，如何教育好这样一个典型对象，使她成为能够自食其力的新人，已经引起教养所工作人员的高度重视。她们一面对殷秀春本人进行耐心的观察和帮助，一面派出许多干部，进行了大量的内查外调。

去上海某区调查殷秀春继母情况的干部给殷秀春带回了继母被捕、弟弟进少教所的消息。原来，她继母离家之后，到别处另租了房子，诱骗了两个姑娘暗中卖淫，自己又当老鸨又充暗娼，重操旧业，结果被邻居告发，逮捕法办。读小学的弟弟得不到家庭温暖，被一个盗窃集团利用，当了小扒手。继母的下场使殷秀春又喜又怕。喜的是恶毒的继母终于进了提篮桥监狱，殷秀春认为这是她应得的报应，正如俗语所说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怕的是她想到自己也跟继母一样不愿劳动，一心想靠出卖色相过享乐的日子，被送进教养所后又一再逃跑，说不定会落得个像继母同样的下场。

去苏北调查她生母的干部也回来了，还带来了她的亲舅舅。一声“接见”，把她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自从她进所以来，从未有一个亲人来探望过她。她做梦也不曾想到能在此时此地见到亲舅舅。舅舅老泪纵横地告诉她，当她母亲自尽时，外婆悲痛欲绝，每天念叨着要把苦命的小秀春接回来，可那时家里连锅都揭不开，想把外孙女接回来也是力不从心。后来得知她爸爸死了，后母走了，她又学了后母的样走上了歪路，外婆差一点儿气死过去，从此就不愿再提起她的名字了。“今天，要不是人民政府的干部千里迢迢赶到我们家，一再说你已回心转意，改邪归正，你八十岁的外婆也不会重新认你这

个外孙女儿。秀春啊秀春，我们今天还能见面，可不能忘了人民政府的恩情。”

还有什么比事实更有说服力呢？在万恶的旧社会，殷秀春的亲生母亲被活活害死，她自己也由于好逸恶劳，贪图享受而丧尽良知，走上了堕落之路。今天，新社会能够不咎既往，想尽办法要把坏人引上正路，如果再执迷不悟，那还像个人吗？……想着想着，殷秀春那颗被扭曲的心开始得到了校正。

从进教养所以来，殷秀春第一次放声大哭。她哀求舅舅回家告诉外婆，她发誓不再丢她老人家的脸。她诚恳要求队里处分她。队长认真地对她说：“知错能改就好。你第一次是在大厨房后面逃跑的，现在分配你到大厨房劳动，让你自己考验自己吧。”

殷秀春点点头，扛起水桶，向大厨房走去。她坚定地表示，从哪里栽跟斗，就从哪里爬起来。过去因为害怕劳动，贪图享受，走上了邪路、死路，今天一定要通过劳动，用汗水来洗刷浑身的污垢和耻辱；沿着人民政府指引的光明大道，坚定地走下去。

再苦再累 决不重操旧业

1952年严冬的一个深夜，天下着蒙蒙细雨，十六铺码头边，一个三十几岁的女人，脸上涂着厚厚的脂粉，拉着一个着工作服的中年男子，苦苦哀求他到她“家”里过夜。那男子怒目相视，两人争吵起来。公安人员闻声赶来，把她带到了公安局。

她是最低贱的“跑堂口”，名叫曹桂香，大饼脸，阔肩膀，粗手粗脚，满脸雀斑。一进门就直着嗓子嚎叫：“你们让我回去，

行行好，放我回去吧……”

工作人员给她端来一把椅子，按她坐下，让她慢慢交代身份。谁知她刚刚着椅，就疼得呲牙咧嘴，双腿抽筋，满头冷汗，像僵尸般直挺挺蹦了起来。原来她患一种严重的性病——横痃，两腿间已烂出两个深深的洞，脓血直流，两团黑污污的浸过盐水的烂棉花塞在腐烂的肉洞里，为了不擦着腐肉，不敢弯腰不敢坐，连走路都得直挺挺地挨。刚才因为害怕，坐下去时猛一下碰着伤口，疼得她差点昏死过去……

她被送进了妇女教养所。

医务人员给她洗伤口换药，她苦苦哀求：“你们让我回家吧，抓我一个不要紧，可我上有瞎眼婆婆，下有五岁丫头，一老一小等着我回去，给她们吃，侍候她们穿，要让她们的活下去啊……”

两天两夜，她一阵抽搐，一阵痛哭。

第三天上午，工作人员把她的女儿抱来了。她眼睛一亮，女儿穿着一件新花布衫，开心地告诉妈妈：“阿姨给我穿新衣裳，还给阿奶送钱，送棉衣棉裤。”

工作人员和气地告诉她，人民政府已作好妥善安排。她婆婆已由社会救济，街道邻居帮助照顾；她女儿可以跟她一起生活，放进托儿所，让她安心在所里治病。

她抱起女儿从头瞧到脚，擦擦泪眼。一面认真真倾听着工作人员的讲话，时而又抬起头来，欲言又止。等到工作人员要她安心治病时，她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恨不得一口气把满腹苦水统统倒出来。

她承认，她是世界上最最低贱的“跑堂口”。

“跑堂口”这种行当，实在不是人过的日子！为了争口饭

吃，为了养活全家老小，她要厚着脸皮每天坐在下等旅馆招引嫖客。不论什么时候，不管来了什么客人，只要茶房一声叫唤“陪客”，就得赶紧跑过去笑脸“侍候”，鬼混个把小时，碰到“大方”一点的客人，赏你几个角子；碰到小气一点的，分文不给。因为照娼家“规矩”，“跑堂口”的人身是受老板捆着的，嫖客花钱统统归老鸨和旅馆所有，“粉头”是无份的。所以，客人给点外快，只能算是极少数的例外。就这样，她白天黑夜卖身卖命，有时一天要接一二十个客人，简直连猪狗都不如啊！那些来下等旅馆嫖妓的人，三教九流、阿狗阿猫各色俱全，流氓、乞丐、强盗、贼骨头、吸白粉的、疔疮、痢疾、痲病鬼，谁来都得侍候，都不能怠慢。当了“跑堂口”，用不了多久，全身什么病都染上了。

她说，她也并不是生来就这样贱，她也是良家妇女，上有公婆，下有一子一女，她也有过温暖的家。五年前丈夫失业，只好挑个担子，走街穿巷，给人补盆修锅，收点破烂；她和婆婆两人帮人家洗衣服，一家六口苦苦挣扎，还是可以勉强糊口。全家老少安守本分，不图荣华富贵，只求把日子过得和和美美，也就心满意足了。

谁知屋漏偏逢连夜雨，严霜专打衰草根。婆婆的眼睛越来越不中用，无法再靠洗衣挣钱；公公得了肺气肿，突然喘咳不止，两眼发直，双手乱抓，眼看命在旦夕，偏偏丈夫又到苏北收破烂去了。她吓得六神无主，急忙去找隔壁金妈商量。

“得送医院，赶快……”

“可我们哪来的钱啊？”

金妈掏出几张钞票，塞到桂香手里，慷慨地说：“拿着吧，救人要紧！”

刚把公公送进医院，老人一口气上不来，呜呼哀哉。

公公的后事尚未料理，儿子又得了麻疹。桂香万般无奈，开口向金妈再借点钱为儿子治病，谁知金妈铁脸一板，不但不借，还逼着桂香把前债还清。

“可我哪来的钱啊！”她惊呆了，只得苦苦哀求。

“嘿嘿！上海滩上，还怕没地方弄钱？”金妈乘人之危，抛出了一条鬼主意，把桂香拖进了火坑。

在金妈的催逼下，她瞒着婆婆，来到了桃源路花烟间，做起拆账的生活。

曹桂香的丈夫回到上海料理父亲后事，听说妻子进了花烟间当妓女，一气之下离家出走，不知去向。没过几天她儿子也死了，家中只剩下不满周岁的孩子和卧床不起的瞎眼婆婆。为了照顾这一老一小，她是既不能走，又不能死，只得咬掉了牙往肚里吞，继续她那卖淫生涯。

尽管她平日里拚命地做，但是花烟间嫌她长相不好，年纪又大，还是被一脚踢出。只得来到下等旅馆“跑堂口”，当起上海滩上最低贱的妓女，任人蹂躏，任人辱骂。上海解放以后，对旅馆业实行整顿，取缔了“跑堂口”，她又沦为暗娼。

教养所在曹桂香的“为娼原因”一栏中写上了：“生活所逼，沦落为娼”。这八个字包含着她苦难生活中多少血泪啊！

一年以后，人民政府为曹桂香治好了性病；为了照顾她的女儿，特意分配她到托儿所工作。她粗手大脚，做事利索。为了报答人民政府对她的恩典，她全力以赴，把托儿所洗尿布、拖地板等重活全都包下来了，从而多次受到表扬。

在一次次个别谈心中，曹桂香向工作人员吐露了一件事：她很想念出走的丈夫。教养所很重视，到处发函打听她丈夫的

下落，终于了解到她丈夫在苏北当码头工人，前些时曾悄悄跑回来看望过母亲，只因为不愿与卖淫的妻子继续见面相处，才不肯重返上海。为此，干部们几次专程去苏北做他的工作，告诉他，桂香是为了跟他共同分担侍奉双亲和孩子的重担，不幸受人欺诈，陷入了火坑，这主要是万恶的旧社会造成的。现在，人民政府为她治好了疾病，经过学习摘掉了文盲帽子，思想觉悟有了显著提高，在托儿所里工作也很积极，多次受到领导表扬。她看到女儿一天天长大，心里也很高兴，就是一天到晚念着你的名字……

弄清了事情的真相，桂香的丈夫不再一味埋怨妻子，反而产生了同情。过不多久，他亲自到教养所来接桂香母女回家。这时，桂香百感交集，扒在丈夫肩上失声痛哭，不敢相信这会是真的。

尽管丈夫工资低，婆婆瞎，住房又挤，曹桂香还是感到了家庭的温暖。只要能和美地过一辈子，她就称心如意了。

曹桂香回家两年后，又一次沉重的打击落在了她身上。那一年，原在苏北码头上工作的丈夫中风瘫痪被送回上海。这么一来，她不仅要照顾瞎眼婆婆，还要侍候瘫痪的丈夫，单靠丈夫那点微薄的病假工资，更难维持全家生计。一天天地挨下去，平时省吃俭用留下的一点点积蓄花光了，家里能够变卖的东西也一样一样卖光了。全家几乎陷入绝境。

一天，一个曾做过她的搭客娘姨的女人来家劝她：“阿香，你这样下去总不是事情。家里月月亏空，寅吃卯粮，如何得了！你女儿都十几岁了，身上补丁加补丁，像个垃圾瘪三。我看你还是去弄一个小姑娘，陪她外面兜兜，你熟门熟路的，赚两钿有啥难呢？”

曹桂香一听火冒三丈。“你是存心要我好看！”

“唉！我好心……”

“好心？当年的苦日子我可没忘。那些‘好心’把我弄得浑身是病，全身是疮。是人民政府花了一千多元医药费才把我从死人堆里拉出来。是干部们苦口婆心开导我，教育我，才使我看清了老鸨的黑心肝，我在旧社会被老鸨害得走投无路，今天我就是全家饿死冻死，也决不去当老鸨害人害己。”

那女人讨了一场没趣，溜了。

在解放了的新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大大改变了，出现了一人有难众人帮的新局面。居委会干部了解到曹桂香家境困难，特地介绍她帮几家人家代洗衣服、代倒马桶，让她挣几个辛苦钱补贴家用，曹桂香一一乐意接受。一有空还给四邻义务看管孩子，积极参加里弄大扫除，受到了街坊邻里的称赞。随后，她又高高兴兴地进了街道工厂。

十年动乱岁月，到处是戴高帽、坐喷气式、游街、罚跪。曹桂香所在的街道工厂虽小，也在揪“走资派”。

一天，厂里一个姓张的造反派头头找曹桂香谈话：

“桂香阿姨，别人都在贴党支部大字报，你怎么不写？”

“我识字不多，写不来。”

“那不要紧。你讲，我替你代笔。”

“我对党支部没意见，你让我说什么呢？”

“你啊，真是受蒙蔽太深。你吃了大半辈子苦，可到现在，还在替人家倒马桶，这不是那些党员硬派你干的吗？”

“前些年，我一家几口吃没吃的，喝没喝的，全靠倒马桶洗衣服贴补家用。这些年日子好过了，可不能好了疮疤忘了痛，一早起来倒几只马桶，我已习惯了，怎能说是硬派呢？”

“那你替他们领孩子呢？据我知道，有两户还是党员呢，钱也不给，这不是明摆着剥削人吗？”

“小张啊，”曹桂香失声笑了，“我不是也替你姐姐带过孩子吗，这又该怎么说呢？”

“……”对方傻眼了，他狠狠地吐了一口唾沫，抛出了最后一张王牌：“你是决心当铁杆老保，一保到底了？曹桂香，识相一点！你是什么人，大家心里有数，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第二天，“揭发”曹桂香的大字报铺天盖地，把她受人欺诈骗沦为娼的丑闻当作笑料，和盘托出，不少情节是添油加酱，颠倒黑白，语气十分下流。单单给她贴大字报还不过瘾，还给她准备了一顶花帽子、一件长旗袍，还有胭脂、口红，在大木牌上写着“娼妓”两个大字，要她穿戴起来，游街示众。

造反派的“英雄”们对批斗曹桂香兴趣十足，甚至为此而形成了两派，互争“批斗权”，几乎引起一场武斗。曹桂香眼看一场流血惨案迫在眉睫，自动站出来向群众交代：“我做过娼妓，出卖过肉体，这是万恶的旧社会逼我干的。解放以后，毛主席共产党取缔了娼妓制度，把我从火坑里救了出来。我有错，已经改了；我有臭，已经洗刷清爽了。你们要斗要批我都不在乎，但不要武斗，不要互相残杀！”她这么一阵高声喊叫，一些老年人默默地退去了，赶来看热闹的人也纷纷散开了。

十年过去了，我们再次见到曹桂香时，她丈夫已经去世，结了婚的女儿把她接到远离老家的新工房。提起十年前那次批斗，她连连摆手，“不要再提那些事，现在一切都很好。”

突然，她跑到里间，喜孜孜地拿出照相本：“这是我女婿，这是我女儿，这是我生日那天照的全家福……”她指指点点，边看边笑，笑得很真很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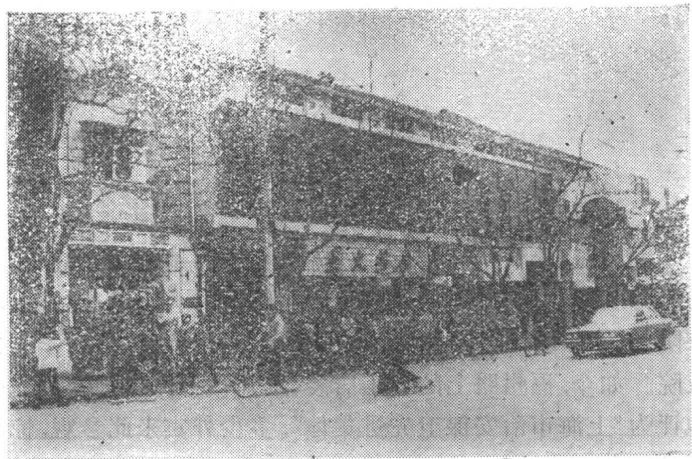
附:

会乐里今昔

四马路(福州路),是上海妓院最集中的地方,人们用“四马路野鸡”来统称上海的妓女。四马路上的会乐里,更是上海妓院的“大本营”,整条里弄,除了一家药材行,幢幢房子全是妓院。如今,福州路上的会乐居委会,却被上海市公安局光荣地评为“上海市治安保卫先进集体”。多少外宾来此参观,惊讶不已。

从娼妓出没、流氓横行,到治安保卫成绩优异,这个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是怎么得来的呢?

会乐里分新会乐里和老会乐里。现在的福州路726弄是新会乐里(人们所说的会乐里一般即指新会乐里),原先是上海高等妓院“长三堂子”的集中地,整条弄堂33幢房子,除了25号开着一家药材行以外,其余全部是妓院,每幢房子里少的两三家,多的六七家。据1948年底登记的户口册记载,在这块近19亩的土地上,当年有妓院151家,妓院主200人,妓女587人,依靠妓院为生的妓佣374人,总人数1161人。1949年1月,又作了一次较为详细的统计,当时有“长三堂子”31家,向导社15家,“咸水妹”10家,野鸡堂子24家,共171家妓院,约占当时全上海800多家妓院的五分之一。据周围的老居民回忆,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后,会乐里妓院发展到最高峰时,仅挂出牌子的就有三四百家,妓女在千人以上。老会乐里



今天的会乐里外景



今天的会乐里弄内

即现在的云南中路 265 弄、253 弄(两弄相通),那里的妓院数量也不少,但大都是向导社、野鸡堂子之类的低等妓院。

新会乐里原是劳动人民的住宅区,1924 年被一批妓院主相中,他们巴结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流氓头子和他们的徒子徒孙,买下这块位于上海繁华中心的“宝地”,对整条里弄房屋进行了翻造。从此,正派的住户吓得纷纷搬离,全市有名的“长三堂子”则一批一批地开张起来。从 1925 年到 1948 年这二十多年时间里,新会乐里整条弄堂几乎看不到一个小孩,一家正经住户,有的只是妓院主买来的小女孩。弄堂里进进出出的嫖客,大都开着汽车,起码也有自备三轮车。

每当华灯初上,会乐里幢幢房子门口就挂出一盏盏灯笼(后来改成霓虹灯),有圆的,有方的,有长的,有八角菱形的,上面都写着妓女的名字。抗战前后会乐里妓院最盛时,最红的名妓有 15 号“惠然老九”、12 号“小玲珑”、22 号“梁红玉”、10 号“筱双珠”、13 号“蝶精”、12 号“楚英”、26 号“克雷斯阿六”等。尽管都是“长三堂子”,她们又都是名妓,连院主老鸨都要让她三分,但几年后年老色衰,却很少有好下场的。那个叫克雷斯阿六的女人,会讲几国外文,自己还起了个洋名 *Classic*(意为第一流的),曾经门庭若市,红极一时。后来人老珠黄,又染上一身重病,结果惨死在街头。那些普通妓女的命运就更悲惨了。一个叫红媛的妓女,本是良家姑娘,被骗入院,一天强迫接待几个客人,染上了梅毒后被妓院主赶出门外。她一路乞讨,有一天正好讨到当年最“钟情”于她的一个嫖客家门口,那嫖客一见是她,竟一脚踢去,被活活踢死。还有一个叫“红宝”的,也是被骗卖到妓院,因受刺激生了精神病,院主就叫来两名流氓把她推入黄浦江活活淹死。

当时到会乐里来嫖妓的，大多是达官富商、流氓头子，也有不少嫖客，迷恋于灯红酒绿的荒淫生活，最后搞得身败名裂，家破人亡。如有一名罗店富商，从罗店运来几箱银元，到会乐里嫖妓。他把大把银元抛掷在地上，让一群妓女去抢夺，引以为乐。此人几年以后倾家荡产，沦为乞丐，倒毙街头。

随着会乐里妓院的兴盛，周围很快形成了适应这种糜烂生活的吃喝玩乐服务网。其中供吃的有：大西洋菜社、中央菜社、万寿山酒店、印度饭店、皇后咖啡馆；供玩的有扬子饭店（这里有很大的舞厅）、一品香、大中华饭店、皇后戏院、爵乐饭店（内有舞厅、弹子房、咖啡馆等）。此外，还有药房三家，花柳病医生诊所两家，专供妓院租用的出租木器店两家，当铺一家，汽车行一家，洗衣作、照相馆、理发店数家，还有贩卖毒品的十余家，按摩院两家。这些场所不仅为吃喝嫖赌花天酒地提供服务，有的还干反革命勾当。进出会乐里的流氓恶霸、反革命分子难以计数。

会乐里的妓院主中，不少人有反动的政治背景。解放前夕，许多人听到风声，逃到台湾、香港等地去了。解放以后，残存的妓院也大多改头换面，转入地下。两年来，妓院数目大大减少，到1951年11月25日，人民政府封闭妓院取缔娼妓时，新会乐里尚剩十几家妓院，五十多名无家可归的妓女由妇女教养所收容，还有一些解放前的妓女和老鸨留在当地改造^①。

留在会乐里的娼妓的社会改造又是怎样进行的呢？

^① 按当时的政策，1951年11月取缔娼妓时尚在开业的妓院，妓女和老鸨等大都要收容和教养；取缔娼妓时已经洗手不干的过去的妓女和老鸨一般留在当地改造。

首先,结合镇反肃反、禁烟禁毒等政治运动,大张旗鼓地镇压了一批地痞流氓、妓院恶霸、反革命分子和贩毒罪犯。据会乐居委会50年代的治保主任回忆,估计新老会乐里逮捕的妓院恶霸、流氓地痞和反革命分子等人数在三百左右,其中罪大恶极分子被执行枪决。这就连根铲除了娼妓制度得以生存的反动基地。

第二,设立临时集中教育地点,如会乐里和周围妓女曾短时期地(约两、三个月)集中在国恩寺内,开会学习,帮助她们提高思想,并学习一些简单的劳动技能,培养她们的劳动观念。对那些就地改造的老鸨,悔改态度较好的,也可与妓女一起学习劳动;悔改态度不好的,定为坏分子,管制改造。

第三,引导妓女参加各种政治运动和社会活动,经考察后表现好的由里弄介绍就业。如妓女李某,在参加里弄工作中提高了觉悟,揭发了还在暗中逼人卖淫的两个暗娼主,受到立功表扬,不久即被介绍到某合作社工作。妓女单某某,积极参加里弄夜校学文化,考进了初中,在中学里还加入了共青团,初中毕业后进某国营工厂当了工人。妓女陈某,担任里弄扫盲教员,包教包会,不管刮风下雨从不间断,受到群众赞扬,后来成了某小学的人民教师。这些妓女参加社会工作后,精神面貌起了很大变化,大多有了称心的对象,组织起美满的家庭。妓女张某,三岁丧父,由亲戚抚养到十三岁,卖给人家作童养媳,十七岁时丈夫被日寇抓去服劳役而死,她沦为乞丐,后来被骗到老会乐里一家野鸡堂子做妓女,怀孕后生下的孩子被院主活活闷死,产后一星期又被迫卖淫,被摧残得骨瘦如柴,不成人形。解放后政府替她治好了病,又吸收她参加里弄工作。同弄居民锅炉厂工人阮某见她翻身感强,为人热心,产生了爱

慕之情，不久即同她建立了美满的家庭，还生了两个孩子。

据 1958 年底会乐居委会统计，留在里弄里的 53 名当过妓女的女子中，一名暗中卖淫屡教不改被送去劳动改造，6 名在家做家务，24 名参加里弄生产组工作（后都成为街道工厂工人），22 名在工厂、商店、学校、医院等单位工作，其中 16 人是各个单位的工作骨干和生产能手。53 人中已有 46 人组建了家庭。那 44 名就地改造的老鸨，1 人重操旧业，送去劳动改造，18 人定为坏分子，7 人找到职业出外工作，9 人参加里弄生产组，还有 11 人在家做家务。（由于从会乐里收容进妇女教养所的都是公娼，会乐里并不是她们的家，因此，从教养所出来安置就业后，没有一个再回会乐里的。）

自 1951 年 11 月封闭妓院取缔娼妓以来，大批劳动人民搬进了会乐里，使会乐里的住户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据 1958 年底统计，新老会乐里 731 户居民中，工人、店员、摊贩、机关干部等劳动人民已达 543 户，占 74.3%；原工商业者 53 户，占 7.25%；地富反坏“四类分子” 53 户，占 7.25%；其他 82 户，占 11.2%。这个上海闻名的“风化区”再也找不到强颜卖笑的娼妓，再没有到处寻衅闹事、酗酒打架的流氓。劳动人民的勤劳俭朴，在会乐里蔚然成风。

1958 年 10 月，12 名职工家属凑了八台缝纫机，在曾经开过“梁红玉”妓院的新会乐里 22 号，办起了第一个里弄加工组，随着生产任务的增加，生产人员从 12 人扩大到 30 多人，加工组也从八台缝纫机扩大为拥有三十多台缝纫机、拷边机的缝纫工场。曾经开过“小玲珑”妓院的会乐里 12 号，1958 年办起了里弄文化站，现在一边是居委会办公室，一边是里弄

图书阅览室。新会乐里 15 号，解放前曾是第一号名妓“惠然老九”的卖淫场所，房内布置十分豪华，装饰得像个水晶宫，四壁是华贵的凹凸墙，家具全部饰有金色的龙头、龙尾，披着金灿灿的龙鳞。现在的住户是一名普通工人，15 号整幢房子是里弄里的文明楼。

会乐里在改造娼妓的历史事件中作出了重大贡献。50 年代起，会乐居委会就是区和市的治安先进集体。近几年来，会乐里一直是青少年犯罪比例最低的一条里弄，封闭妓院取缔娼妓三十多年以来，这里从未发生过一起恶性案件。

桃源路、柳林路、淮海路、西藏路一带（今卢湾区济南街道），是上海低等妓院的集中地，尤以桃源路（旧名爱来格路）为甚。

现在的桃源路 109 号——127 号，共十幢房子。在敌伪统治时期，里面全部开着妓院（也称“花烟间”），人称“十间头”。“十间头”出面的都是女当家，男的多是拜过老头子的流氓地痞，有伪警察局做靠山，胡作非为肆无忌惮。

“十间头”是沿马路房子，都是二层楼的砖木结构房屋。每到傍晚，“十间头”的妓女就坐在底层客堂间内的两排椅子上。楼上的房间全隔成 4 平方米左右的小间，内放一张床，一只马桶，一张比夜壶箱大一点的梳妆台，妓女就在这里卖淫。而如果生意不好，客人不上门来，妓女们就要出去拉人了。谁敢不拉，老板、老板娘就用藤条抽。

“十间头”对面，现在的桃源路 112 号，是一家白相人开的低等“咸肉庄”，再过去一点，桃源路 82 号则是一家高级一点的“咸肉庄”，里面放着红木家具，冷天还装有热水汀，有一年



当年的“桃源路十
间头”，现已成为居民
住宅



旧社会私娼满街的“桃源路十间头”附近的柳林路。
如今已成为闻名全市的小商品集贸市场

热水汀爆炸，炸死了两名妓女。82号和112号中间有一家茶馆店，那是妓院老板、白相人专吃“讲茶”的地方。如果有哪一个男人误踏进妓院之门，又不肯嫖妓，妓院老板就会“客客气气”地把他请到茶馆店，名曰请吃茶，实则敲竹杠。若不答应，台子踢翻，手枪匕首都会拔出来。至于其他大大小小半明半暗的妓院更是不计其数，把短短的一条桃源路搞得乌烟瘴气。居住在附近的居民，凡有办法的纷纷搬家；实在无法搬的，外出回家时就叫三轮车，而且不敢叫到爱来格路，只能叫到恩派亚大戏院（即现在的嵩山电影院），要不然女的会被误认是妓女，男的会被误认是嫖客。

解放后人民政府取缔了妓院，镇压了一批流氓恶霸，桃源路又回到了人民手中。现在，那十幢房子楼上住居民，楼下分别办起了托儿所、食堂、小百货店、杂货店。112号是文明楼。82号成了一家织带厂的厂房。管理这一带的朝阳居委会和曙光居委会，都是卢湾区的文明单位。

后 记

我的母亲曾是上海妇女教养所的一名干部，由于经常要住在所内，我很想念母亲，特别是节假日。我几次要到教养所去看望，可她总是不同意。我那时还不满十岁，隐隐约约地听说母亲管教的就是当年四马路上拉人的“野鸡”，越发激起了我的好奇心，母亲一回家，就缠着非去不可。终于有一天，她领着我去了。

母亲那时是分队长，管着一个分队五十六名“妓女”。她一到所里，就叮嘱我老老实实在办公室里看小人书，说完就去工作了。我哪里肯听，她前脚走开，我后脚就溜了出去。教养所好大好大。那天大概是休息日，这些女人有的对着镜子痴痴地照，头发梳了又梳；有的把窄窄的旗袍硬套在胖鼓鼓的身子上，扭着难看的屁股；有几个似乎是在谈男人，谈着谈着，有一个竟尖声怪叫起来：“没有男人，闷死我了！”

我捂着耳朵，赶紧跑开，心里失望透了。那些旧小说把妓女写得一个个貌似天仙，可这里的女人个个让人见了恶心。突然，广场一角传来一声呼救：“快来人啊，有人上吊了！”我跟着人群快步奔去，只见一个约摸三十多岁的女人，用布条子吊在双层高铺的木档上。听说是为了闹着要出去，达不到目的就上吊。大概人刚吊上去不久，舌头倒没有伸出来，可样子也怪怕人的。人们正不知如何是好时，猛然冲过来一个个子高高

的女干部，她指挥众人把那上吊的女人放下来，给她做人工呼吸，做着做着，这个女人终于得救了。

教养所的女干部还会救“吊死鬼”，我好佩服她们啊。但内心深处似乎总有点别扭：这种不要脸的女人，救活了有什么用呢？

以后，我又陆续跟妈妈去过几次教养所，发现这些女人一点一点地在变。她们不再疯疯癫癫地大谈男人，而是满头大汗地织袜、摇毛巾，一休息下来，便唱歌，读报。有一次，我亲眼看到一个女人捧着一张报纸大哭起来，原来报纸上刊登着记者采访她转变经过的报道。后来她那失散多年的丈夫按着报纸提供的线索找到教养所，和她夫妻相会了。

这是件多么有意义的工作啊。我当时就想，长大以后，我也要当记者，也要写这样的故事。我长大了，也真的当上了记者。三年前，我和母亲一起去看望她当年的老同事——原上海妇女教养所所长杨洁曾同志。这位两鬓斑白的离休老干部，说起那段往事，记忆犹新，情不自禁。杨同志以确凿的材料告诉我，上海的娼妓改造工作是全世界做得最好的，多少研究妇女问题的专家、学者来采访过她，都说这件事值得大书特书。遗憾的是，迄今还没有人写过。

“我们何不自己动手，把这段亲身经历的历史写下来呢。”于是杨洁曾所长和当年教养所的老同事徐惠清（即我的母亲）、杨秀琴等同志和我一起，查阅和整理了曾在上海妇女教养所收容过的7500多名妓女的基本档案材料，翻看了当年报章杂志的有关报道，她们还给我讲过当年亲身经历的许多生动故事，并提供了部分书面资料，我们又一起访问了当年不幸为娼现今度着幸福晚年的一些老姐妹，终于写成了这本

史话。除了书中提到的那些姐妹们的姓名以外，均系真人真事。我们真诚地希望，这本史话既是上海禁娼这一历史事件的真实记载，也能通过它对当代青年的理想和人生追求带来有益的启示。

在本书的采访写作过程中，原上海妇女教养所干部薛美娇、田芝芳、陈素馨、汪智瑾和驻所医师姚云文等同志提供了许多材料；《解放日报》摄影记者郭天中和《消费报》浦静中同志拍摄和翻拍了当年的有关照片；《解放日报》资料组曹宝庆、郑忠芳等同志帮助提供了许多资料。本书还得到了解放前曾实地采访过上海妓院的新闻界老前辈夏其言同志的指教，得到了上海市皮肤病防治所、黄浦区会乐居委会、汕头居委会等单位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贺 宛 男